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之研究



研 究 生：林君穎

指 導 教 授：陳章錫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六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之研究

研究生：林君穎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曾慶承  
高知遠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 論文摘要

作為中國第一部長篇的歷史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既是歷史的記載，是藝術性的小說，更是一部充滿智慧與謀略的兵法書。從其問世至今，不僅流傳廣泛，《三國演義》的影響力更是遠遠凌駕在正史《三國志》之上，使得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鮮明的活在每位讀者的心中，讓人讀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於不知不覺間便會沉溺其中、品味再三。

由此可見，羅貫中對於人物形象的刻劃可謂相當的成功，不僅將每位角色的性格描寫得十分具體，更將角色間的個性差異藉由對比手法，凸顯得淋漓盡致、毫不含糊，其中更是以「既生瑜，何生亮」的兩位主人翁最為深植人心，使得周瑜妒忌與諸葛亮神機妙算的人物形象，從此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鑒於其他著作中，並未全面的針對諸葛亮及周瑜這兩位人物，進行特定且全面性的探討，故筆者欲以此文來研究，從正史《三國志》以及《三國志平話》談起，進而延伸至《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與周瑜，去剖析兩人人物形象的演變過程。

本論文分為六章，茲分述各章摘要如下：第一章為緒論，扼要介紹筆者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相關文獻之探討。第二章則是以正史《三國志》以及《三國志平話》為重點，進而研究周瑜、諸葛亮在《三國演義》成書前的相關人物形象。第三章則是以周瑜在《三國演義》中的形象進行分析，從而瞭解小說中周瑜主要的性格特質。第四章則是針對《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人物形象，詳細分析諸葛亮在小說中的性格特色。第五章則是藉由比較《三國演義》中兩人的形象差異，從而延伸至小說與正史間的兩人形象演變歷程。第六章則為結論，用以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關鍵字：三國演義、周瑜、諸葛亮、人物形象

# 目次

摘要	I
目次	I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前人文獻探討	3
一、學位論文	4
二、期刊	6
三、相關專書	7
第三節 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步驟	9
一、研究範圍	9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10
<b>第二章 《三國演義》以外的周瑜與諸葛亮</b>	<b>13</b>
第一節 正史《三國志》的周瑜與諸葛亮	13
一、正史《三國志》的周瑜	14
二、正史《三國志》的諸葛亮	19
第二節 元代《三國志平話》的周瑜與諸葛亮	25
一、元代《三國志平話》的周瑜	27
二、元代《三國志平話》的諸葛亮	31
第三節 小結	35
<b>第三章 《三國演義》中周瑜人物形象分析</b>	<b>37</b>
第一節 消失殆盡的瀟灑大度	37
第二節 受君主所器重的東吳第一謀士	40
一、投效孫策，開始嶄露頭角	41
二、洞悉時局，勸孫權勿遣子為質	43
三、赤壁一戰，助東吳順利抗曹	44
第三節 「既生瑜，何生亮」的狹小氣度	51
一、三殺諸葛	52
二、三氣周瑜	55
第四節 小結	59

<b>第四章</b>	<b>《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人物形象分析</b>	<b>60</b>
第一節	以「隆中對」定調三分天下	60
一、	分析局勢，勉勵劉備	62
二、	如何建立根據地	62
三、	安定後方，外交盟友	62
四、	靜待時機，後圖中原	63
第二節	效忠蜀漢的堅定意志	63
第三節	神機妙算的非凡軍事才能	67
一、	草船借箭周瑜嘆	68
二、	布八陣圖退陸遜	70
三、	七擒孟獲破蠻兵	72
四、	空城計欺司馬懿	76
五、	木牛流馬運糧草	78
第四節	以法治國、賞罰分明的統御之術	80
一、	以法治國的堅定決心	80
二、	以信為本的治軍態度	82
三、	賞罰分明的公正不阿	84
第五節	小結	86
<b>第五章</b>	<b>《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比較</b>	<b>89</b>
第一節	周瑜與諸葛亮的相異處	89
一、	性格外放與謹慎小心	90
二、	自作聰明與深謀遠慮	93
三、	心胸狹隘與寬宏大度	97
第二節	周瑜與諸葛亮的相似處	100
一、	選擇君主的主動取向	100
二、	預判情勢的軍事眼光	102
三、	應用靈活的戰術策略	104
第三節	小結	109
<b>第六章</b>	<b>結論</b>	<b>111</b>
一、	從正史《三國志》到《三國演義》兩人的形象演變	111
二、	周瑜形象的構築與矮化	121
三、	諸葛亮形象的構築與神化	122
四、	未來展望	123
<b>參考書目</b>		<b>125</b>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是以寫作的緣由及概述為主軸，進而將內容分為三節進行分析描述，分別是「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及步驟」以及「文獻探討」，希冀能藉此一窺本論文寫作的核心思想，並呈現出在《三國演義》當中，與諸葛亮、周瑜相關的主題，進而了解兩人在書中所表現出的人物形象。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作為中國第一部長篇的歷史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它既是歷史的記載，是藝術性的小說，更是一部充滿智慧與謀略的兵法書。在黃人《小說小話》中，便曾有段如此的記載：

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眾皆烏合，差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玉帳唯一之秘本。<sup>1</sup>

清人劉鑾更曾於《五石瓠》中提到：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咸效之。<sup>2</sup>

雖然上述記載未可盡信，但也足以看出《三國演義》除了充滿娛樂性之外，也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而這樣的作品，歷經數百年的時間洗禮後，不但沒有隨著時間而湮滅、隕歿，反倒愈發的口耳相傳於大街小巷、老幼婦孺之間，隨著時間越陳越香、歷久彌新。從古代的史傳、戲劇、話本，到現代的表演藝術、流行歌曲、電視連續劇，甚至是電腦遊戲、手機遊戲等等，無處不見《三國演義》的蹤影。究竟是甚麼樣的因素促成世人如此鍾愛這部作品呢？胡適先生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答：

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裡得著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裡，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裡，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sup>3</sup>

<sup>1</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231。

<sup>2</sup> 王德毅編：《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2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551。

呈上所述，「通俗」為《三國演義》的一大特點，也才能使得無論是村夫婦孺，抑或是販夫走卒，皆能對其中情節朗朗上口、耳熟能詳。猶記國小時候的我，無意間在班級書櫃裡翻到了一本兒童版的《三國演義》，對於其中桃園三結義、三顧茅廬、草船借箭、周瑜打黃蓋、反間計殺二蔡等情節，饒富興趣，從此也種下與《三國演義》的不解之緣。直至今日，我對於這部作品的喜愛依舊不減當年，也因為三國的通俗，因此每每與人提及《三國演義》，都能夠引起一陣騷動與關注，這也才使我下定決心，決定重投《三國演義》的懷抱，試圖寫下與其有關的論文作品。

## 二、研究目的

《三國演義》全書共有一百二十回，而根據沈伯俊《三國漫談——人物·情節·名段》一書的統計結果，其間登場的人物更有一千兩百三十人之多<sup>4</sup>，堪稱是古代小說人物角色描寫最為詳盡的巨著。因此，要如何從這茫茫人海中去尋找研究主題，自然也就成了我一開始決定方向的難題所在。為此，在經過多方詢問及資料查找後，筆者發現到其中有兩位人物既是經世濟民的大才，更是軍事方面不可多得的人物領袖，而他們同樣都深受君主重用，但最後卻都不得善終。其中一位是集軍師、忠臣、賢相特色於一身的傳奇人物，郭瑞林先生便曾有過如此描述：

諸葛亮具有儒家匡世濟民，仁民愛物的情懷；兵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謀略；法家熟諳律令，依法治國的法術；道家羽扇綸巾，仙風道骨的風采；墨家運斤能風，工藝精湛的巧慧；縱橫家言辭無礙，舌戰群儒的雄辯；陰陽家精於奇門八卦，善曉六丁六甲之法的術數；農家躬耕隴田，諳於農藝的踐行；文學家錦心繡口，下筆成章的才華。他的學術雜而能精，他的才能博而能工，漢書·藝文志》所稱先秦諸子的九流十家，他無所不包，是一個真正的雜家。<sup>5</sup>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幾近是無所不能，兼通各家之所長，無論是儒家的匡世濟民、兵家的戰場決勝、法家的治國之道、道家的仙骨風采、墨家的精湛工藝等等，他幾乎無一不精，在《三國演義》中可說是貫穿全文的靈魂角色。而另一位則是同樣充滿傳奇色彩的東吳大都督：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

<sup>3</sup>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592。

<sup>4</sup> 沈伯俊：《三國漫談——人物·情節·名段》，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年，頁6。

<sup>5</sup> 郭瑞林：《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74。

亂石穿空，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sup>6</sup>

在上面兩段的描述，一位是舉世傳頌的千古賢相，另一位則是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當中為千古風流人物的少年英雄，這兩位之間的合作、交手，實力應當是在伯仲之間，為何在羅貫中的筆下，正史中戰果輝煌、為人豁達的周瑜，在《三國演義》中，卻變成打曹操尚且英姿煥發，然而每逢諸葛亮必輸，甚至最終要面臨「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慘命運呢？筆者有感於此，故而選定此二人作為本篇論文之焦點人物，希冀能夠透過本論文加以分析周瑜與諸葛亮在《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之間的人物形象差異，以期能夠更進一步的釐清兩人在小說中的形象關係。

本文的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考證《三國志》及《三國志平話》中兩人之形象，進而探究於《三國演義》成書前，周瑜與諸葛亮的形象概況以及相關演變。

二、闡述《三國演義》中，周瑜形象所呈現出的人格特質、智慧表現以及人品氣度。

三、闡述《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形象所呈現出的智慧、忠心、軍事才能以及治國策略。

四、比較《三國演義》中周瑜、諸葛亮的異同處，進而從中釐清兩人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間的形象演變軌跡。

希冀透過探討這些問題，能夠更加瞭解《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進而從中更系統性、更深入地去剖析兩人在歷史上與文學上的完整形象，以期能更清楚地呈現周瑜、諸葛亮兩人形象在《三國演義》成書前後的演變軌跡。

## 第二節 前人文獻探討

三國，曾是一個風雲莫測、群英匯聚的年代，在群雄爭霸的舞台上，曾經誕生過許多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然而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中，大部分的舞台燈光卻都聚焦在劉備集團身上。因此，在《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中，便曾提到這樣的一段話：

《三國演義》可以說是一部以安邦定國為宗旨的封建「治道」展示錄……，

<sup>6</sup> 見[北宋]蘇軾：《東坡樂府》，臺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頁9。



以全書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表現劉備集團為安邦定國所做的不懈努力。<sup>7</sup>

而在劉備集團的表現當中，又以諸葛亮最為備受矚目，其中大部分的篇幅幾近跟他有所關連，因此學界對於他的相關研究也相當豐碩。然而，如同曇花般的周瑜，他的出現與消失就有如流星劃過天際般的快速，相較於諸葛亮，在學界上對於他的關注程度似乎也就稍嫌遜色。而在本篇論文中，主要是以吳小林校注的《三國演義校注》作為底本，此書以早期的毛本作為基礎，並且有參照明嘉靖本和《三國志》、《後漢書》、《晉書》等通行本，進行相關的校勘工作，因此為相當不錯的參考資料。除此之外，以下將就諸葛亮與周瑜的部分，蒐羅各類型的學位論文、期刊以及相關專書進行分析與探討：

## 一、學位論文

在《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sup>8</sup>裡，羅永裕分別從人物肖像、語言藝術、心理、性格各方面，去探討羅貫中在小說內的敘事手法與描寫人物的相關技巧。次之，作者亦針對《三國演義》中不同的人物類型，以小說美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比較，從而將小說與史書中人物形象的演變歷程加以詳述、深究，進而總結出《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的營造上，有何優缺點及相關影響，這對於本篇論文來說，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三國演義研究》<sup>9</sup>一文中，洪淳孝將《三國演義》的版本以及成書歷程，蒐羅的相當完整，其內文概括了《三國演義》的情節結構、蘊含思想、人物表現手法以及後世的相關評價，可視為臺灣早期文獻中，研究《三國演義》較為全面且透徹的成果，因此對於本篇論文在研究周瑜以及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方面，甚有助益。

《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sup>10</sup>一文中，張谷良提到為求呈現出諸葛亮在民間的各種「文化現象」，作者使用了「質性」與「量化」這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試圖將諸葛亮藝術形象的生成，從淵源、發展到其流變，客觀地將各種情形爬梳整理，進而在民間對於諸葛亮外在形貌與內在品性的領域上，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並將諸葛亮的民間造型做進一步整理，因此，本論文可從這些民間資料，再進一步去梳理它們與正史之間的關係。

<sup>7</sup>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5-36。

<sup>8</sup> 羅永裕：《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sup>9</sup> 洪淳孝：《三國演義研究》，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2年。

<sup>10</sup> 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臺東，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在《三國演義之人物表現》<sup>11</sup>中，黃俊凱從《三國演義》最具典型的曹操、關羽、及諸葛亮，進行性格特徵方面的分析，並從書中加以舉例說明。此外，作者還從上述推演出三種不同的階級身分(君主、武將、謀士)，進而從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表現去討論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於敘事、情節以及語言上的呈現方式有何不同，最後進行歸納總結，進而羅列出《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方面有何可取與待改進之處，這對於本論文在研究諸葛亮方面，有著實質上的幫助。

《傳統小說中軍師類型之研究－以「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為代表》<sup>12</sup>一文中，林素吟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加以切入，並將傳統小說裡軍師方面的人物加以獨立，以作為其研究的對象，而其中又以諸葛亮為代表人物。藉此探討這些角色的由來、鮮明的形象特色以及他們所經歷的藝術形象之流變，從而探究傳統小說對於軍師類型的人物，是以何種表現手法進行刻劃與呈現，進而符合普羅大眾對於軍師角色的觀感及期待，而從中也可加以獲取諸葛亮人物形象的相關資訊。

《《三國演義》作者的價值意識－以謀士為中心的考察》<sup>13</sup>中，黃光庭主要著重在魏、蜀、吳三大割據勢力中，謀士價值態度之間的差異比較，進而從中探討作者在書寫過程中的文人意識與心理活動層面。次之，文中對於書中文人的政治思想、文字描繪、結構佈局上，有著極為深入的考究與探析，是近代文獻當中，對於作者創作意識這一方面，較具參考價值與見解的研究文獻，藉此本論文可進一步探討作者在創作諸葛亮及周瑜形象時的深層意識。

在《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研究》<sup>14</sup>裡，曾文男先對毛宗崗為《三國演義》所做的評點以及其生平做一介紹，進而聚焦到毛評本《三國演義》與古本之不同與修改之處。次之，作者針對毛評本《三國演義》在人物塑造、敘事結構以及行文的手法進行分析與解說，其中我們便可看到毛宗崗對於羅貫中在人物形象的營造上有著極具參考價值之見解，實可與《三國演義》的人物形象研究相結合，從而更加全面的分析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的敘事藝術與技法。

《古典小說虛實論研究－以《三國演義》為例》<sup>15</sup>的內文中，廖文麗以古典小說的虛實論作為其研究主軸，從各種不同類型的虛實論作為出發點，從而剖析、探討《三國演義》在虛實運用上的優劣之處，其研究成果對於本篇論文在探討小說的題材、人物、小說情節以及創作思想，有著一定的幫助。

<sup>11</sup> 黃俊凱：《三國演義之人物表現》，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sup>12</sup> 林素吟：《傳統小說中軍師類型之研究：以《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為代表》，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sup>13</sup> 黃光庭：《《三國演義》作者的價值意識－以謀士為中心的考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sup>14</sup> 曾文男：《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sup>15</sup> 廖文麗：《古典小說虛實論研究－以《三國演義》為例》，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 二、 期刊

在魏月琴的〈《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形象〉<sup>16</sup>一文中，作者從三方面去分析諸葛亮的人物形象，第一是「忠」，也就是對其國君及國家的忠貞不渝，以及他本身對於匡復漢室的理想鞠躬盡瘁；第二是「智」，也就是從睿智、機智和奇智等三方面去頗析諸葛亮的人物特質；第三是「勇」，多數人在探討諸葛亮時只提到他的智，作者這邊獨具匠心的點出了諸葛亮智慧中所蘊含的剛勇，而這種勇其實就是一種信心的展現，主要是通過他對信念的堅持與忠心而得來，而這對於本篇論文中描述諸葛亮中心的部分，有著不小的幫助。

在陳偉軍、孫愛春〈《三國演義》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一文中<sup>17</sup>，作者從比較人物形象的過程中，具體分析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中，曹操與諸葛亮兩人形象演變的歷程，對比小說中與歷史中的人物形象。而在諸葛亮的部分，如果只講謀略以及用兵，尚不能充分顯現諸葛亮的過人之處，因為像郭嘉、荀攸、龐統、周瑜等皆是才智出眾之輩，也皆有令人為之驚艷的計策、戰術。為了突顯諸葛亮的優異，羅貫中特意將一些別人的事蹟或野史中的故事安排進小說之中(如草船借箭、赤壁祭風、空城記等)，才完成了千古軍師的形象塑造。最後，作者從人物性格的分析延伸到藝術形象以及民間的審美觀念上，從而探究《三國演義》在人物典型觀念上所帶來的影響，而這對於本篇論文的諸葛亮之形象演變而言，實為不錯的參考資訊。

在申安的〈《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藝術〉<sup>18</sup>一文中，作者指出在《三國演義》中的主要人物皆有其主要的個性特徵，並透過小說中人物的行動、語言、表情加以具體與形象化。而為了讓人物間能有所區別，羅貫中採取的則是對比以及陪襯的手法，並藉此凸顯出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差異性，進而形塑出小說故事中的重點人物，而這對於本篇論文在諸葛亮與周瑜的人物比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梁大新的〈人性的扭曲—論羅貫中筆下的周瑜形象〉<sup>19</sup>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藉由比較，呈現出周瑜在《三國演義》與《三國志》中，性格與人物特質上有著極大的落差，而本篇論文便藉此延伸分析其中的現象及原因。

---

<sup>16</sup> 魏月琴：〈《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形象分析〉，《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38-39。

<sup>17</sup> 陳偉軍、孫愛春：〈《三國演義》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泰安師專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98 年，頁 15-21。

<sup>18</sup> 申安：〈《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藝術〉，《河北建築科技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2005 年。

<sup>19</sup> 梁大新：〈人性的扭曲—論羅貫中筆下的周瑜形象〉，《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 年。

在滕朝軍的〈《赤壁》還原歷史中真實的周瑜〉<sup>20</sup>一文中，作者以《赤壁》一劇作為出發點，透過史實的視角，去檢視與比較《三國志》、《三國演義》、《赤壁》中不同的周瑜形象，試圖去還原歷史中真實的周瑜形象。而這種以戲劇視角為主，文本分析為輔的相關文章，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也提供給本篇論文另一個不同的寫作觀點。

在胥惠民的〈從周瑜說起—略論《三國志演義》塑造典型的藝術辯證法〉<sup>21</sup>一文中，作者談到小說中的周瑜，是位個性分明、善惡兼具的個性化人物，並從周瑜的人物形象談到相關的藝術辯證手法，以釐清小說是怎樣去塑造一位典型的人物角色，對於本篇論文在敘寫人物形象上，能夠更為了解人物典型的整體塑造過程。

### 三、 相關專書

歷來針對《三國演義》的相關研究專書多如繁星，因此在本篇論文的專書選擇方面，筆者在此僅羅列出對本論文完成有所助益的專書著作，分別列舉如下：

在《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sup>22</sup>一書中，郭瑞林將此書區分為三個篇章，依次為觀念篇、事件篇以及人物篇。在觀念篇中，主要是以探討歷史、政治、道德、宗教，甚至是正統思想等各方面有關《三國演義》的思想觀；而事件篇則是從三國歷史中，重要的戰爭與事件作為切入點，並逐步且具體的進行相關分析與解讀；人物篇則是聚焦三國時代的重要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等君主，關羽、張飛、趙雲等武將，以及司馬懿、諸葛亮、荀彧、周瑜等謀士，而這對於本篇論文在整理諸葛亮與周瑜的人物形象時，有著不小的幫助。

在《三國演義源流研究》<sup>23</sup>一書中，關四平將此書分為三編，上邊主述《三國演義》的成書研究，著重在正史、講史、詩歌、戲劇甚至是傳說對《三國演義》的影響與關聯。中編主述《三國演義》的文本研究，從羅貫中的文本中去剖析作者的創作概念、人物美學、虛實技巧以及其意蘊內涵。下編主述《三國演義》的傳播研究，從《三國演義》在各種系統間(如文本、戲曲、說書等)的傳播途徑及方法，從而引申至《三國演義》對中國社會文化有何種巨大且深遠的影響，而這對於本篇論文在研究諸葛亮與周瑜的形象演變過程上，能夠更加了解其中緣由。

---

<sup>20</sup> 滕朝軍：〈《赤壁》還原歷史中真實的周瑜〉，《蘭臺世界》，2010年。

<sup>21</sup> 胥惠民：〈從周瑜說起—略論《三國志演義》塑造典型的藝術辯證法〉，《新疆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

<sup>22</sup> 郭瑞林：《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sup>23</sup>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

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sup>24</sup>一書中，朱一玄、劉毓忱將本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本事編，輯錄晉到元末之間，關於三國人物故事的各種記載以及相關文藝作品。第二編為作者編，輯錄有關作者生平、思想和著述的各種材料。第三編為版本編，主要是針對小說版本方面的材料進行相關的搜羅工作。第四編為評論編，主要是對於《三國演義》問世以後，進行各家評論的輯錄工作。第五編為影響編，主要是對於《三國演義》在各方面的影響所蒐集的相關材料。為了方便讀者查找，主編者又將其內容分為（一）詩文，（二）小說、筆記，（三）戲曲等部分，對於本篇論文在查找《三國演義》的各項資料的過程，實為一本不錯的資料檢索專書。

在《三國志演義縱論》<sup>25</sup>一書中，陳翔華先從《三國演義》的各項野史傳說談起，接下來再談到國外對於《三國演義》的相關研究以及毛宗崗對於《三國演義》的批評以及理論貢獻。後面有則是有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在探討諸葛亮，其中包含了其形象演變史、詠懷詩歌以及孔明的故事在少數民族間的傳播與影響，這對於本篇論文在探究諸葛亮在歷朝歷代，甚至是國外研究者眼中的人物形象上，有著不小的幫助。

在《解讀三國演義》<sup>26</sup>一書中，周積明意圖從論英雄的思路，挖掘古典小說中可供現代人感知、領悟，甚至是可以做為己用的相關內容，而這對於本篇論文在研究《三國演義》的同時，可以有意義的去綜合文化學、社會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視角，以各種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周瑜與諸葛亮。

在《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sup>27</sup>一書中，陳瑞秀從《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以及其創作思想與內容談起，進而衍伸至「反對分裂、嚮往統一」這歷久不衰的萬民心聲。而在這其間的過程，也創造出了許多英雄豪傑，因此作者也特別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拿出來論述(如曹操、劉備、關羽以及諸葛亮)，最後再從中分析羅貫中在小說中所表現的藝術結構之美。整體而言，對於本篇論文在研究《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的過程中，裡面的論述及探討實為不錯的參考資訊。

在《三國演義縱橫談》<sup>28</sup>一書中，丘振聲主要是介紹一些《三國演義》成書前一些有關的故事、軼事以及傳聞，並從中窺見《三國演義》中一些三國人物形象的演變情況。藉此方式，作者從側面論述這些人物的思想層面，進而探究《三國演義》在人物描寫、情節安排以及語言運用方面上的藝術特點以及相關成就，這對於本篇論文在研究諸葛亮與周瑜的人物形象上，有著一定的助益。

<sup>24</sup>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3年。

<sup>25</sup> 陳翔華：《三國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sup>26</sup> 周積明主編、傅隆基著：《三國演義縱論》，臺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

<sup>27</sup> 陳瑞秀：《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sup>28</sup> 丘振聲：《三國演義縱橫談》，臺北，曉園出版社，1991年。

在提筆寫下本篇論文之前，筆者無法完全蒐集到前人期刊、論文以及專書，從而全面的進行深入探究，實屬遺憾。但走在前人所開創出來的康莊大道上，筆者才能夠更加篤定此次的研究範圍以及內容，論文中雖有兼采前人的研究內容，但筆者仍期待透過本篇論文，在諸葛亮以及周瑜的研究領域中，能提出有別以往的獨特見解。

### 第三節 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研究範圍

從明清到現代，小說的創作與發展並沒有因為時間演進而停下腳步，中國歷史長篇小說界的濫觴—《三國演義》，更沒有因此而遭受淘汰與遺忘，相反的，它一次次以不同的形式(小說、電玩、電視劇等)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一次次的震撼著一代又一代讀者們的內心世界。由此可見，《三國演義》不管是在人物、情節、戰爭場面、修辭、語言等運用上，必定有其獨到之處，方能廣為流傳。然而，若是要將這所有的主題都納入一篇碩士論文，那必定是件不可能的任務。馬振方的《小說藝術論》曾云：

人物可以提供這個情節發展的動機，儘管情節很重要，沒有情節故事站不起來，但是人物的性格思想不但對人物的行為提供動機，也為整個故事的情節事件提供動機，並且導向它的發展。<sup>29</sup>

由上述可知，在所有的小說要素當中，儘管故事情節對於故事的發展影響甚大，然而人物卻才是影響故事的關鍵要素與動機提供者，所以人物應為小說呈現的首要條件。而在羅竹風主編的《漢語大辭典》中也曾言：

指文學藝術區別於科學的一種反應現實的特殊方式。即作家從審美理想的立場出發，根據現實生活各種現象加以藝術概括所創造出來的具有一定思想內容和藝術感染力的生活圖畫。通常亦特指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sup>30</sup>

呈上所述，作為文學藝術區別他人的要素，「人物形象」自然也就成為小說裡不可或缺的靈魂所在。然而，在人才如海的三國年代，要如何在一百二十回的篇幅中，將人物妥善分配、塑造，進而巧妙地去串起整個故事的環節，讓故事能夠千迴百轉、深植人心，這並非易事。因此，筆者認為不管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襯托與渲染的運用、虛構與史實間的對比等寫作手法，皆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這也

<sup>29</sup>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9。

<sup>30</sup>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辭典》，臺北，東華出版社，1997年，卷3下，頁1116。

是筆者將人物設為研究題目的首要原因。

其次，正如毛宗崗所言：「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於三國者也。」<sup>31</sup>要如何從眾星雲集、人才輩出的三國時代，選取當中的指標性人物？佛思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供了很好的出發點：

一本複雜的小說，常常需要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出入其間。扁平人物有時被稱為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他們依循一個單純的單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圓形人物所展現出的理念和性質若超過一種因素，其弧線即趨向圓形。其特色是能使讀者驚奇，具有複雜的人性特質，而人物的複雜性，更能產生小說作品的逼真性。他往往是寫實作品中的主角。<sup>32</sup>

在全文一百二十回的篇幅當中，諸葛亮佔據了三分之二的比例，足可見他其實就是《三國演義》角色中的重中之重，更是其中的圓型人物。而在諸葛亮眾多的對手當中，周瑜的篇幅雖短，卻令人為之驚艷、難以忘懷，其性格更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交手的過程，不斷轉換，從原先的自信滿滿到後來的自嘆弗如，其間人性特質的轉變，再次呈現了佛思特所說「圓形人物」的特質。而這也讓我對此二人在小說中的爭鋒相對、鬥智鬥力的過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也就是為何我會選取周瑜與諸葛亮作為本篇論文研究題目之原因。

本論文重在《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形象研究，由於《三國演義》其實是繼承了多種資料所誕生的產物，因此，在文本的閱讀上，除了《三國演義》本文之外，陳壽撰、裴松之注的《三國志注》以及作為《三國演義》藍本之一的《三國志平話》，也皆為此次的研究重點。筆者希望，透過這些文本的對比及分析，能夠使本篇論文更加的整齊與完善，也能夠使繁瑣的資料更加具有系統性、更加令人一目了然。

##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擬以文本分析法、文獻探討法以及歷史研究法作為主要的研究基礎，並輔以比較法與歸納法來進行作系統性的資料爬梳工作，進而從中進行諸葛亮與周瑜兩位人物形象的差異比較，以下針對上述的研究方法，略作概括說明：

#### 1. 文本分析法

本篇論文主要是以吳小林校注的《三國演義》為研究藍本，並輔以陳壽撰、裴松之注的《三國志注》及陳翔華編校的《元刻講史評話集》作為研究主軸，進而從文本的分析當中，對於周瑜及諸葛亮的人物形象做深入的探討。

<sup>31</sup> 陳曦鐘、宋瑞祥、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5。

<sup>32</sup> 佛思特：《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92頁

## 2. 文獻探討法

文獻探討法是一種蒐集國內外現有的相關研究著作、論文、期刊等資料，進行一種客觀且綜合性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也同時會輔以心理、社會及政治等其他相關領域的理論，從旁建構出整體研究的完整性。本論文的重點在於周瑜與諸葛亮的人物形象分析，因此，廣泛蒐集有關《三國演義》當中對於兩人的研究文獻，並從中篩選、節錄有關於本次研究重點的資料，也是本論文論述時的重要佐證工具之一。

## 3. 歷史研究法

作為一部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長篇的歷史章回小說，《三國演義》可說是沿襲多方作品的精華之作，因此在研究《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時，研究《三國演義》成書前的作品也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夠還原兩人在歷史中的原貌，從而探討兩人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之間人物形象的演變歷程，故本論文主要研究範圍是以《三國演義》、《三國志》與《三國志平話》為主。

## 4. 比較法

針對人物特質進行相關性的比較，如從政治、軍事、忠心、氣量胸襟等各方面，皆可看出《三國演義》與《三國志》或是《三國志平話》的不同之處，而透過這樣的方法也可以從中分析出文本中作者所欲表達的寓意以及所隱含的警世價值。

## 5. 歸納法

除了討論《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以及《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人物形象的演變歷程之外，亦有將兩人的形象進行分析、比對，從而進行歸納與統整的工作，使兩人的形象可以在經過本篇論文整理之後更趨於完整與多元。

## (二) 研究步驟

本篇論文主要架構分為六章，茲分述各章摘要如下：

### 1. 第一章—緒論：

簡單明瞭的介紹筆者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以及各項研究方法與步驟，並從前人的文獻探討中，搜尋與爬梳與本篇論文有關的相關資料。

### 2. 第二章—《三國演義》以外的周瑜與諸葛亮：

將藉由《三國志》及元代《三國志平話》來探討諸葛亮及周瑜的人物形象。

### 3. 第三章—《三國演義》中周瑜人物形象分析：

本章將從外在形象、才能及心胸氣度等各方面，進行全面且客觀的探究，從而分析周瑜在《三國演義》當人所呈現的人物形象。



4. 第四章－《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人物形象分析：

本章將從智慧、忠心、軍事才能以及治國策略等各方面，分析《三國演義》中所欲呈現出的諸葛亮之人物形象。

5. 第五章－《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比較：

本章將探討兩人在《三國演義》中的相同及相異之處，進而延伸至兩人形象與正史中定位有何不同，從而分析《三國志》到《三國演義》兩人形象演變之軌跡。

6. 第六章－結論：

總結本篇論文的研究成果。



## 第二章《三國演義》以外的周瑜與諸葛亮

《三國演義》為一本歷史演義小說，主要以歷史事件為主，輔以一些民間的傳說故事，並加入了一些渲染、虛構的成分，讓整體故事更具有可看與娛樂性。但相對來說，原先的故事情節及人物形象的部分卻因而在《三國演義》當中有所改變，無法了解到事件與人物的原始風貌。

因此，要了解周瑜與諸葛亮的真正人物形象，必須從史書加以著手。而本章預計從正史《三國志》中的周瑜與諸葛亮談起，第二節接續呈現《三國志平話》中周瑜、諸葛亮的形象，藉以呈現出《三國演義》以外周瑜與諸葛亮間不同形象的演變歷程。

### 第一節 正史《三國志》的周瑜與諸葛亮

《三國演義》與史傳系統之間的淵源，追本溯源還是要從正史開始，而所謂正史主要是以陳壽《三國志》為核心，在當時，雖有其他人撰寫三國歷史，但成就及參考價值仍遠遠不及此書。〈晉書·陳壽傳〉便曾有以下的說法：

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sup>33</sup>

明人高儒更曾提到羅貫中先生所創作的《三國演義》是「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sup>34</sup>而這裡的「據正史」指的便是陳壽的《三國志》，因此，《三國志》在所有講述三國歷史史書當中的重要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陳壽所整理的《三國志》是繼史記、漢書後，第三部的紀傳體史書，而陳壽也恪守不為權貴折腰，信筆直書的實錄精神，才可以讓我們後人從其作品當中看到最真實的三國形貌。《晉書》中更曾提到：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志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

<sup>35</sup>

從上面的描述中，足以看出陳壽堅毅、耿直的個性以及他繼承司馬遷、班固力求真實的優良態度。除了《晉書》之外，劉勰更曾經在《文心雕龍》當中給予陳壽

<sup>33</sup> [唐]房喬：《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82，頁577。

<sup>34</sup> [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志三·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2。

<sup>35</sup> [唐]房玄齡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2137。

一定的讚賞：

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sup>36</sup>

從上述《文心雕龍》的段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勰對於《三國志》的推崇程度，也說明了陳壽所著的《三國志》，其文學價值並不會輸給司馬遷的《史記》以及班固的《漢書》，而在其死後，尚書郎範頽等更曾上表：

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sup>37</sup>

也正因為《三國志》有一定的歷史參考價值，且事件內容於各個人物傳中皆互有參照，對後世三國故事的流傳更有著不小的影響。因此，本節將透過探討《三國志》中的周瑜與諸葛亮，進而重新還原他們二人在當代的人物形象。

## 一、正史《三國志》的周瑜

在陳壽所著的《三國志》當中，周瑜是一位不管在人品氣度、軍事才能、政治謀略都堪稱卓越的一流人才，並深受當時東吳人民所愛戴。而以下我們將從三個面向來探討周瑜在正史《三國志》中的人物形象：

### （一）忠於國家的一代將領

在孫吳政權剛起步的初期，年輕的周瑜便與當時的孫策私交甚篤，兩人以兄弟之禮相待，進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可從〈三國志·周瑜傳〉中看出端倪：

「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sup>38</sup>

如此「升堂拜母」的情節在當時蔚為佳話，流傳至今更代表了朋友間結為通家之好的深厚友誼。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段如下的敘述：

<sup>36</sup> 劉勰著：《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285。

<sup>37</sup> [唐]房玄齡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2137。

<sup>38</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周瑜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54，頁623。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sup>39</sup>

由上述兩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孫策與周瑜亦君亦友的交情，甚至當時雄踞一方的霸主袁術因欣賞而想拉攏周瑜為其效命，進而提出豐碩的條件欲任命周瑜為將，周瑜卻藉故東歸，回到了當時只是無名小卒的孫策身邊，輔佐他建立江東政權。這樣不被權力、慾望所迷惑的堅定心智，實為重情重義的表現。可惜的是，孫策英年早逝，但這並不影響周瑜對東吳的忠心，他曾對蔣幹說過：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sup>40</sup>

所以對周瑜而言，即便國君從孫策換成了孫權，只要是知人善任的君王，又有似手足的情誼存在，再加上孫家兄弟於國事上對周瑜言聽計從，如此的倚重和仰賴，周瑜怎能不賣命效力呢？而這一切也絕非是庸俗的權利及金錢所能取代的。如此忠心的表現，也讓我們看到了古代將領令人動容的一面。

## （二）運籌帷幄的軍事戰略家

在《三國志》的描述當中，周瑜年僅二十一歲便幫助孫策平定了江東，也幫助了孫吳政權奠定良好的開國基礎。而當曹操勢力逐漸崛起，兵威日盛，成為一方霸主時，周瑜更沒有因而畏懼強權，而慌了自己的腳步。相反的，當建安七年，張昭、秦松等人對是否送人質到曹營爭論不休時，周瑜卻獨排眾議，為孫權提出了以下截然不同的看法：

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仆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sup>41</sup>

<sup>39</sup>〔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54，頁623。

<sup>40</sup>〔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54，頁626。

<sup>41</sup>〔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民〕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

以上這些見解，充分從天時、地利、人和為孫權統整分析了東吳的政治、經濟與兵力的整體實力，並且從中剖析東吳要如何與曹操相抗衡。最高瞻遠矚的是，一旦孫權遣子為質，那便必須聽從曹操的命令，孫權統一天下的終極目標也必然不能實現。因此，當周瑜的建議被採納後，實也為東吳未來的發展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軍併吞荊州，劍指江東，當時東吳正面臨唇亡齒寒之際，大臣們紛紛手足無措，主張投降，但這時，周瑜再次挺身而出，做出了以下的分析：

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為將軍破之。」<sup>42</sup>

上述精闢的分析，從關西馬超、韓遂的後患未除開始，到北方士兵不擅水戰，甚至會水土不服，周瑜點出了種種曹操違反用兵之道的觀點，並勸說孫權只要以彼之長擊敵之短，雖曹操兵多將廣，東吳始終可破敵致勝，無須擔心。而這一席話，讓原本猶疑不定的孫權有如吃了定心丸，從而確立了抗曹的決心，《三國志》也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sup>43</sup>

---

年，卷 64，頁 2047。

<sup>42</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民]楊家駱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 1261-1262。

<sup>43</sup>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民]楊家駱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 1262。

除了《三國志》外，《資治通鑑》也詳加記載了曹操揮兵南下，攻打赤壁之事：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討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sup>44</sup>

由上也可看出，周瑜並沒有因為曹操軍隊勢力龐大而有所退卻，相反的，卻建議孫權大舉抗曹，也正因為周瑜的建言，才有了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周瑜的戰略思維對於東吳之重要性，自然也可見一斑。無怪乎後來當周瑜行經巴丘時，病疾復發身亡的消息，傳回東吳後，孫權一度悲痛得不能自己：

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sup>45</sup>

甚至《三國志》當中還有提到：

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sup>46</sup>

從君王親自穿喪服為周瑜哀悼，到孫權自己說出：「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的這番話，都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孫權有多麼倚賴周瑜，昔若非有周瑜，今日又何以稱帝？從上述的種種事蹟，皆可再次印證周瑜的軍事才能相當卓越、非凡，甚至對於當時東吳的興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 （三）瀟灑大度的江東才俊

具史實陳，他的正面評價不僅僅呈現於軍事能力及忠心不二的性格上，在陳

<sup>4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頁 2090。

<sup>45</sup>〔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民〕楊家駱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264。

<sup>46</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4。

壽的描述當中，周瑜更具有開闊的胸襟與氣度，是個為人稱頌的瀟灑公子。所以，在陳壽《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裡，曾有這樣的一段話：

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47

從上述「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這句話，我們便可看出當代的人對於周瑜的評價相當的高。不僅如此，劉備曾說他：「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sup>48</sup>，在《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中，孫權更曾感嘆：「公瑾雄列，膽略兼人」<sup>49</sup>。能同時讓兩位當代君王同聲其讚，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這也讓我們看到了無論是在性情、氣量，甚至是胸襟上，周瑜都是三國時期的佼佼者。而上述原本對周瑜不服的三朝老將程普，後來也折服於周瑜的治軍之道，《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曾提到：

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sup>50</sup>

由於周瑜的忍讓與大量，化解了他與老將程普之間尷尬及矛盾，甚至讓程普感動到「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這段話實是將周瑜的雍容大度、寬厚胸襟形容的淋漓盡致。除了有與人相處的寬厚胸襟之外，周瑜更有著常人所難及的音樂素養，所以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裡，曾對周瑜有這樣的描述：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sup>51</sup>

從上述段落，我們可以看出周瑜對音律的精通程度，甚至連喝醉了也可以察覺錯誤，「曲有誤，周郎顧」也就因而廣為人知了。所以，翻開《三國志》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到對於周瑜這號人物，出現的幾乎都是正面的評價，不管是人品、相貌、胸襟，甚至到戰略分析、統軍作戰的能力，周瑜幾乎都是一流的，這樣文武兼備的儒雅氣質，在三國的將軍當中是相當少見的。他的存在，正如他的字—「公瑾」，美如白玉，完美無瑕；他的出現，有如劃過三國時代的一道閃電，燦爛而絢麗，若不是因取蜀中途病故巴丘，年僅三十六歲，或許他會替三國時期留下更多令人驚豔的篇章！

<sup>47</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4。

<sup>48</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5。

<sup>49</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5。

<sup>50</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4。

<sup>51</sup> 同註 49，《三國志》，頁 1265。

## 二、正史《三國志》的諸葛亮

諸葛亮是三國歷史中最具代表意義的人物之一，而由於後來的時代不同的解讀、理解與傳播，造成了諸葛亮在形象上有相當多元的特點。而在《三國志》當中，陳壽更是唯獨幫諸葛亮、陸遜列傳，也因而可見諸葛亮在陳壽心目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定位。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我們也可看出陳壽對諸葛亮的敬重：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sup>52</sup>

將諸葛亮與管仲、蕭何相媲美，可見當時諸葛亮的鋒芒是多麼耀眼，陳壽對諸葛亮是多麼推崇。除此之外，諸葛亮的治國才能更被當代人是讚譽有加，其中有一段描述是這樣的：

「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嘗問其諸葛亮之治國。樊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sup>53</sup>

由上可知，對於一位生於亂世，奮鬥於亂世，最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物來說，諸葛亮在《三國志》中所獲得的評價大部分都是正向居多。而以下我們將透過《三國志》全方位的視角以及系統性的紀載，一窺在三國歷史中，諸葛亮在政治、戰略、軍事等方面，所呈現出來的人物形象：

### （一）以法治國的政治家

諸葛亮是我國著名的政治家，他先後輔佐了劉備、劉禪父子，建立了蜀漢，當時與曹魏、孫吳形成了三分天下之勢。而要使一個國家興盛強大，法治、規準是相當重要的，所以在《三國志》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敘述：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sup>54</sup>

<sup>52</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4。

<sup>53</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3。

<sup>54</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4。



「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等作法，都可以看出諸葛亮為了建立社會秩序有多努力。除此之外，以法治國更是他的核心準則，從「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雖輕必戮」這四句中，我們可以看出諸葛亮在政治上是依循本諸公心、不徇私情、賞罰分明的觀念加以執行。在如此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之中，上至官員，下至黎民百姓，自然也就「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兢兢業業的效忠國家了！

當然，在執法嚴明，毫不徇私的作法之下，自然也會有不聽從命令之人，其中在《三國志》中就有兩起較為明顯的例子：

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帝曰：「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sup>55</sup>

由上可知，當諸葛亮出軍祁山，急需糧草供應之際，李嚴卻因故督辦糧草不濟，甚至為了卸責，假傳聖旨令諸葛亮班師回朝。回朝後，李嚴在鑿鑿證據下無從抵賴，這時諸葛亮卻上表主云：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sup>56</sup>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其實也有惜才愛才的一面，雖說李嚴怠忽職守，糧草運送更沒有及時送達，造成蜀軍的損失難以估計，按律當斬。但諸葛亮顧全大局，沒有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夾雜任何個人恩怨，更在皇上面前處處為李嚴說情，希望後主能珍惜人才，從輕發落。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的「法」，並不是如商鞅的那種嚴刑峻法，而是儒家那種「以大義定出處」的道德標準。除了李嚴之外，另還有權臣廖立，因為不滿諸葛亮常常拿李嚴打壓他，而心生憤懣，便藉故向李邵、蔣琬發怨懟之言：

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

<sup>55</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99。

<sup>56</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99-1000。

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57

這位曾經被諸葛亮視為與龐統旗鼓相當的治世人才，批評先帝劉備用兵失當，勞師動眾而無所獲，甚至令自己身犯險地；又指關羽徒有虛名而無軍紀，致令荊州被奪；更指出當朝大臣向朗、文恭、郭攸之都是平凡的人，根本不能擔任重任。上至先主劉備，下至蜀漢重臣，自然群情激憤，但這時諸葛亮聞之，卻上書劉備道：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sup>58</sup>

光是批評先主劉備這點便可定廖立死罪，但諸葛亮卻認為「羊之亂羣，猶能為害」，不應處死。而後奏請後主治罪，廢廖立為庶民，徙汶山郡，與少數民族為伍。後來兩人聽聞諸葛亮逝世，廖立垂泣而歎：「吾終為左衽矣！」，李嚴則激憤發病而死。為何能使兩位受罰者感念其恩德，甚至聞喪而泣、激憤而死？終歸其因，還是諸葛亮公平執法及客觀公允的治國之道所致，也誠如陳壽所給予的評價：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諸。」<sup>59</sup>

這不但是陳壽個人對諸葛亮給予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是當代大多數人在諸葛亮治理下的內心感受。因而，當這位被大家推崇備至、傳頌街巷賢相逝世之後，其惠政德澤自然也就讓蜀民緬懷，《襄陽記》中就曾記載：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sup>60</sup>

<sup>57</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97。

<sup>58</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98。

<sup>59</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0。

<sup>60</sup> [晉] 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28。

除了在諸葛亮初亡之際，大家爭相祭祀於道陌之上外，多年後，百姓對其追思甚至愛屋及烏的轉移到諸葛瞻的身上，《三國志·諸葛瞻傳》中就曾記載：

「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sup>61</sup>

雖說這些美聲溢譽對於諸葛亮之子而言，多是言過其實，但這也實實在在地證明了諸葛亮的治蜀績效及廉潔忠貞的人格，深刻烙印在蜀國黎民百姓的心中，而這樣的緬懷之情，甚至讓諸葛亮死後神格化，進入廟堂之中，成為許多人民心中重要的精神支柱。

## （二） 籌謀規劃的戰略家

作為漢末三國時期的傑出軍事戰略家，在著名的三顧茅廬中，諸葛亮向劉備冷靜的分析了各個集團的消長及戰爭變化情勢，並針對劉備的處境提出了一套完整可以建基立國、北伐中原，進而與另外兩大勢力集團三分天下的戰略方針—「隆中對」，史上本無「隆中對」一說，標題並非由作者陳壽所提出，而是後人所添加上去，但全文仍可見於《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當中：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sup>62</sup>

從「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針對當時毫無根據地的劉備集團提出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對策，而後來事實也證明，劉備便據此奠定基礎，從而確定了他與曹操、孫權在史中「天下三分」的大勢，並且維持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而從上述的「隆中對」中，我們主要可以看出諸葛亮有以下幾個戰略想法：

1. 「引孫吳集團為援」：

<sup>61</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2。

<sup>62</sup>〔晉〕陳壽撰：《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912-913。

諸葛亮觀當時情勢，認為「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實力尚為薄弱的劉備，應先與江東的孫權結盟，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根據地，進而勤修內政，一步步壯大自己的實力。這樣的建議，對當時孤立無援、四處流竄的劉備來說，確實是一劑強心針，後來赤壁之戰的事實也證明，劉備與孫權聯手，不僅打敗了曹操，更替自己爭取到三國時代卓著的歷史定位。

## 2. 「取荊州、益州，並與少數民族交好」：

在「隆中對」中裡面說道：「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徹底點出荊、益兩州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而蜀漢帝國確實也在取得荊、益兩州的基礎上，才能加以建立。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戰略更使後來的蜀國在北伐上，能無後顧之憂，這些都足以看出諸葛亮對局勢變化的敏銳眼光。

## 3. 「待天下有變，以兵分兩路之勢進發」：

在早年三國局勢的演變當中，基本上都照著諸葛亮「隆中對」的規劃進行，但尚未等到天下有變、曹魏勢力分崩離析之前，蜀漢勢力卻失去了荊州，這對劉備軍團而言無疑是個晴天霹靂的慘痛消息。這最終也導致了蜀漢勢力在經濟實力上被大幅削弱，從此一蹶不振。

綜觀而言，取天下者，除了人謀，上需天運，諸葛亮再如何洞燭機先，萬萬也沒有料想到失去荊州的這一天，使得蜀漢政權終歸只能偏安一隅。因此，正如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一文結語：

總之，諸葛亮的「隆中對」，是我國歷史上最具體、完整，而且非常卓越的統一天下的全程戰略構想。遺憾的是荊州之失，為「隆中對」的致命傷。且沒有荊州之失，就不會有挽亭之敗，這兩次失敗，使蜀軍的戰力顯著降低，在以後的七年之內均無法獲得補充；尤其是能征慣戰的將才傷亡較多，後繼乏人；而荊州的喪失，更使蜀軍真的戰略態勢陷於不利。假如當時能以驍勇善戰、熟諸韜略、忠貞守志、均衡穩健並深明大義的趙雲取代關羽鎮守荊州，也許「隆中對」可能會有成功的希望。<sup>63</sup>

雖說失去荊州並不能完全怪罪於關羽，然而失去荊州確實使蜀漢國力大傷，諸葛亮所提出隆中對的藍圖，終究也是棋差一著，但是，難道諸葛亮就這樣死心了嗎？

### （三）被陳壽所小覷的軍事家

丟失了荊州之後，諸葛亮並沒有就此灰心喪志，相反的，他開始尋求其他解決之道。而他發現到，強兵悍將，戰馬利兵，糧倉充足，這些無疑都是一個國家強盛的重要條件，因此，對於蜀國來說，只佔領荊州、益州等地，並不能確保足以據險自保、安享太平。若要對抗狼子野心的魏國，不斷的開疆闢土、搜尋人才，

<sup>63</sup> 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頁 26。

才能增強蜀漢的綜合戰力，進而才能對曹魏一定的威脅情勢。因此，北伐中原也就成了諸葛亮的必要之舉，但弱小的蜀國，究竟要如何出兵、用計才能與強大的曹魏相抗衡呢？諸葛亮所提出的第一次北伐之計，竟與法正所言不謀而合：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sup>64</sup>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法正認為須先攻克當時夏侯淵、張郃所駐守的根據地—秦隴地區，才能進可攻，退可守。這與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目的地恰巧吻合，足見兩人都皆視秦隴為蜀國長期發展的首選之地，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甚至連明代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鑒論》中也加以認同：

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也，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強，誠收之以為外蔽，則武都、陽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定算在此矣。<sup>65</sup>

雖說諸葛亮將第一次北伐的策略計畫地相當出色，但最卻依然敗在街亭之戰，將軍馬謖剛愎自用的決策上，記載可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當中：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sup>66</sup>

《三國志·蜀書·王平傳》中更有詳盡記載：

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sup>67</sup>

由上述兩段可知，馬謖因其高傲的態度與經驗的不足，甚至不聽諸葛亮以及王平給他的建言，慘遭魏將張郃切斷水源，圍困於山中，慘敗於街亭之戰中，而這也直接導致了第一次北伐最終以失敗收場。

但諸葛亮卻並不因此而氣餒，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諸葛亮後來幾次的北伐，幾

<sup>64</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61。

<sup>65</sup>王夫之：《讀通鑒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314。

<sup>66</sup>〔民〕李文齋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922。

<sup>67</sup>〔民〕李文齋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049。

乎都是以漢中為據點，試圖進發隴山地區，進而切斷魏軍在關中與隴右之聯繫，孤立隴右之魏軍，待機而奪取之，以打下北定中原的良好基礎。

所以綜觀諸葛亮的七年北伐當中，除了街亭之戰失利損兵之外，在往後的戰爭當中，不僅多打勝仗，更奪得許多魏國的土地及人民，在戰役中更獲得武都、陰平二郡，使得蜀漢西北邊境上又多了道防線，既可北上隴右，又可與漢中遙相呼應，替蜀漢帝國在中後期的邊境防守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力保蜀軍仍有與其餘兩國爭雄的實力。然而，在《三國志》當中，陳壽卻有所異論：

「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sup>68</sup>

甚至說道：

「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sup>69</sup>

在筆者看來，卻不盡如此。多年北伐，雖未竟成功之志，但其實仍有許多重大的斬獲。而且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不應只從調兵遣將及出謀劃策的方面來看，而應從外交政治、戰術執行及後勤補給進行多方面的考量。從《隆中對》中與孫權建立穩定牢固的政治軍事同盟開始，到諸葛亮利用反間計使曹睿與司馬懿失和，讓曹氏政權產生變化，甚至到了戰爭後期為了後勤補給，諸葛亮研發出了「木牛流馬」，皆顯示出諸葛亮智慧巧思的一面，雖最終歷史的結局對諸葛亮而言，是遺憾、無奈的，但他卻早已向世人證明他優異的軍事能耐及才幹。

## 第二節 元代《三國志平話》的周瑜與諸葛亮

從唐代的文人作品開始，我們便可看到多有三國故事出現在詩句當中，如李商隱〈驕兒詩〉中的「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杜甫〈蜀相〉中的「出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等，而這也奠定了三國故事在宋元時期發展的基礎。比起唐代，宋元時期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創作作品是更加的多采多姿、琳瑯滿目，其中主要的表現形式可分為講史及雜劇兩種，其中講史內容多以歷史故事為底，夾雜一些作者的巧思創意，其底本即為「話本」（亦稱為「平話」或「評話」）。而話本的內容因僅供說書人參考、提示，故情節多較為簡單，亦不重視文采上的表現，但這樣的文字底本卻對未來文學的演進發展，有了不小的助益，陳翔華在〈論講史平話及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中便提到：

講史平話雖然敘事稚拙，但是它上承唐代變文，下啟明清演義，作為從短

<sup>68</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0。

<sup>69</sup>〔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4。

篇白話小說發展到長篇的關鍵環節，在中國小說演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sup>70</sup>

從上可以看出，講史平話在文學及藝術的表現上雖然不如後期的長篇小說，但講史平話卻可以被視為中國長篇歷史演義的先河，也是古代小說由短篇過渡到長篇的一座重要橋樑。而現存可見最完整的三國故事話本，則是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以下簡稱《三國志平話》)。在鄭鐵生的《三國演義的敘事藝術》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段敘述：

從成書這一角度來看，《三國志平話》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它結束了說三分和元雜劇三國戲那種以各自獨立的單元式故事出現的局面，形成一個雖然粗略但已構成初具系統的三國故事，僅此一點就使它在長篇小說敘事形態發展的長河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sup>71</sup>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三國志平話》的重要性，而曾深入探討《三國志平話》與《三國演義》關係的鄭振鐸也曾提到：

《虞氏新刊三國志平話》這部『平話』的發現……一面使我們得以窺見元代通俗文學的真實面目與程度，一面也使我們格外的相信中國小說的歷史原是極為悠久的，且種種的所謂通俗小說，其進展的路途也因此而大為我們所明瞭。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不僅僅是使我們震駭於在歷來所承認為歷史小說元祖羅貫中氏所著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尚有一部所謂元刊本《三國志平話》的存在而已。<sup>72</sup>

而如此貼近民間的通俗文學，其內容自然也就較為通俗化、平民化。內容為了吸引聽眾、讀者，也多以怪力亂神、荒誕不經的情節為主，有時在內容情節上，更是未經求證，便將故事，顛覆原有歷史情節。因此，蔣大器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便一針見血的點出《三國志平話》的缺點：

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sup>73</sup>

雖說《三國志平話》的文字敘述多過於庸俗鄙陋，故事情節更多被民間所渲染而較不具考證性，但卻無損其對三國故事題材在中國小說史當中，所扮演的濫觴角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上編》中，關四平是這樣說的：

<sup>70</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一，頁10。

<sup>71</sup> 鄭鐵生：《三國演義的敘事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頁102。

<sup>72</sup> 陳其欣選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2。

<sup>73</sup> 陳曦鐘、宋瑞祥、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5。

《三國志平話》是隨說話藝術興盛而繁榮起來的「說三分」故事的集大成者，從其不受史實約束而多取里巷傳聞的特點來看，甚至可以說，二者也是兩晉南北朝至宋元時期民間三國傳說的集大成者。它代表著史傳系統並行不悖且時有交融的傳說講述系統三國故事創作的最高成就，在三國題材演化史上是由歷史到小說漫長歷程中一座承先啟後的里程碑，是構成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這座文學大廈的支柱之一，在思維方式、結構格局、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感情傾向、文化觀念等方面，為羅貫中做了必要的準備。<sup>74</sup>

根據以上所言，《三國志平話》為羅貫中完成《三國演義》的重要基石，故可視其為《三國演義》之原型，而其自然也就成為觀《三國演義》前的必讀之作。

## 一、 元代《三國志平話》的周瑜

在《中國小說史略》當中，魯迅先生曾指出《三國志平話》的特點：

觀其簡率之處，頗足疑為說話人所用之話本，由此推演，大加波瀾，即可以愉悅聽者，然頁必有圖，則仍亦供人閱覽之書也。<sup>75</sup>

從上述的段落，我們可以看出《三國志平話》的用途主要是用來讓說書人說故事用的，其間的故事難免有穿鑿附會，與正史不符之處。而在這樣文本描述下的周瑜，從卷中的〈孔明殺曹使〉開始，到卷下的〈龐統謁玄德〉為止，其形象是正反並陳的，有的地方甚至與正史《三國志》差異甚大，而以下便從各方面加以還原周瑜在《三國志平話》中的形象：

### （一） 自視甚高，不顧國家安危的將領

在《三國志平話》當中，周瑜是在吳夫人口述孫堅遺言下登場的，因為孫堅死前就預料到曹操攻吳之事，於是便出現以下段落：

倘有急事，拜周瑜為元帥，使黃蓋作先鋒，可破曹賊。<sup>76</sup>

一開始《三國志平話》似乎便以孫堅的遺志，刻畫出周瑜一代將領的英勇形象。

<sup>74</sup>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上編》，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頁180。

<sup>75</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年，頁90。

<sup>76</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43。



但在後續的描述中，當曹操真的舉兵南侵，攻打江東之時，周瑜不僅拒絕孫權的任命，更終日把酒言歡，守在美人小喬身旁，不願為主帥出謀劃策。甚至當孫權賜予金珠緞匹時，周瑜依舊不為所動，並向小喬直言，要等諸葛亮及魯肅來談，他才會認真考慮。為了達成孫、劉聯手抗曹之使命，諸葛亮也不得不搬出激將法：

今曹操動軍，遠收江吳，非為皇叔之過也。爾須知曹操，長安建銅雀宮，拘刷天下美色婦人。今曹相取江吳，擄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清名？<sup>77</sup>

上述這段話，諸葛亮為周瑜點出於公於私，他都應出兵抗曹，否則不僅僅會毀壞其一世英名，更有可能淪落到老婆被人擄走的下場，迫於名利與無奈，周瑜才不得不點頭答應。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完全顛覆了周瑜在《三國志》當中的果斷與霸氣，而這與前述孫堅遺言裡的周瑜形象，其實也有著相當大的牴觸。因而，鄭振鐸先生便在《中國小說史略》當中，對於《三國志平話》有著這樣的評論：

他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歷史只有三分，採之傳說和作者自己的想像的創作倒有七分，所謂「滿紙荒唐言」者是也。<sup>78</sup>

經上述對照後，我們確實看到周瑜從正史《三國志》中捨身為國、忠心耿耿的形象，到《三國志平話》中轉變成為重視名利、沉溺酒色的墮落形象，是差距甚大的，因此，會出現「滿紙荒唐言」的如此論斷及評價，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

## （二）才智超群，卻淪為陪襯的綠葉

在《三國志平話》當中，作者對周瑜的描寫並不算少，雖說從上面段落，我們可以看到《三國志平話》把周瑜的人格形象轉化不少，但在軍事方面，仍舊把周瑜寫的智勇雙全、才智超群。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有一段相當有趣的描述：

曹公問言：「江南岸上千隻戰船，上有麾蓋，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隻戰船，引蒯越，蔡瑁，江心打話。南有周瑜，北有曹操，兩家打話畢，周瑜船回，蒯越，蔡瑁後趕。周瑜卻回。周瑜一隻大船，十隻小船出，每只船一千軍，射住曹軍。蒯越，蔡瑁令人數千放箭相射。卻說周瑜用帳幕船隻，曹操一發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卻射右邊。移時，箭滿於船。周瑜回，約得數百萬隻箭。周瑜喜道：「丞相，謝箭！」曹公聽得大怒，傳令：「明日再戰。依周瑜船隻，卻索將箭來！」<sup>79</sup>

<sup>77</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80。

<sup>78</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年，頁90。

<sup>79</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45。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第一次與曹操的交手過程中，周瑜不僅贏得了勝利，更從曹軍那邊獲得了許多箭支，使得雙方在兵器的實力上，瞬間敵消我長，十分精采。但從這段故事中，我們卻可以看到眾所皆知「孔明草船借箭」的影子，那到底哪一段敘述才是真正的史實呢？但其實真正和曹操「借箭」的人，既不是周瑜，也不是諸葛亮，正史《三國志》是如此記載的：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sup>80</sup>

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看出真正借箭之人並非周瑜、諸葛亮，而是孫權，而且是為求脫身才想出的計策，並非刻意為之。因此，可以看出平話的作者，為了要凸顯周瑜的足智多謀，才設計出「周瑜借箭」的橋段。然而，在赤壁之戰後，作者對周瑜形象的描述卻開始出現了改變，在赤壁之戰後幾次與諸葛亮的交手，周瑜皆屈居下風，於是有了下面這段與魯肅的對話：

周瑜自思：「曹操乃篡國之臣，吾觀玄德降準龍顏，乃帝王之貌。」又思：「諸葛命世之才，輔佐玄德，天下休矣！我使小法，囚了皇叔，捉了臥龍，無此二人，天下咫尺而定。」魯肅點頭，言：「元帥言是也。」<sup>81</sup>

承上可知，周瑜認為劉備、諸葛亮是未來孫吳一統天下的巨大阻礙，需施計而除之。並自信的認為，自己只要略施手段便可將此二人手到擒來。表面看似意氣風發的計策，但最終卻在黃鶴樓上因自己的醉酒大意而失敗，使劉備得以逃脫。這也才有了後來所策劃的「美人計」：

周瑜言：「討虜有一妹，遠嫁劉備，暗囚卧龍之計，可殺皇叔。」元帥使魯肅過江見討虜，言孫夫人嫁劉備，陰殺之。<sup>82</sup>

由上可知周瑜對於劉備在黃鶴樓逃脫一事，並不甘心，故又心生一計，想利用假藉孫權之妹與劉備聯姻的名義，引誘劉備入東吳而擊殺之。然而，諸葛亮卻早已看破周瑜的陰謀詭計：

皇叔暗與諸葛說回面事。諸葛笑而言曰：「皇叔遠逐夫人去江南，萬無一失。」皇叔再言：「恐有周瑜計。」軍師言：「主公過去，諸葛將五萬軍屯于江岸，下鎖戰船，左右關、張二將，使吳將不敢正視主公。」<sup>83</sup>

<sup>80</sup>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孫權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47，頁551。

<sup>81</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47。

<sup>82</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3。

<sup>83</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4。

從上述可以看到諸葛亮談笑用兵的形象躍然紙上，而後周瑜的計策也被諸葛亮一一識破，進而步步地為劉備化解危難，成功迎娶孫權之妹。而這類與諸葛亮對陣交手，周瑜從開始的滿腹信心到後來氣急攻心的描述，在書中後面幾個小節屢見不鮮。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三國志平話》先前對周瑜在赤壁之戰上才略過人的描述，其實主要是作者想要藉由連周瑜這樣的佼佼者，都敗給了諸葛亮的形象描述，來烘托出諸葛亮的與眾不同、神機妙算。而周瑜在赤壁之戰後的形象書寫上，自然也就漸漸淪為諸葛亮身旁陪襯的綠葉了！

### （三）自大妄為，氣度狹小的性格特色

在正史《三國志》中，周瑜是個胸襟寬闊、愛才惜將的好將軍。相較之下，《三國志平話》中的周瑜，在品格修養上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貶抑，從上述周瑜只願守在美人身旁，而不顧國家安危的表現便可略知一二。除此之外，在周瑜於黃鶴樓設計欲擒劉備的事件中，其形象貶低的呈現表現得更加明顯，原述如下：

歌曰：天下大亂兮，劉氏將亡。英雄出世兮，掃滅四方。烏林一兮，劉滅摧剛。漢室興兮，與賢為良。賢哉仁德兮，美哉周郎！贊曰：美哉公瑾，問世而生。與吳吞霸，與魏爭鋒。烏林破敵，赤壁鏖兵。似此雄勇，更有誰同？<sup>84</sup>

在當時為求脫身的情境之下，劉備開始大讚周瑜才德兼備、智勇雙全，而當時的周瑜聽了讚揚之語，整個人便醺醺然了起來，甚至忘了自己原本早已規畫好的計策：

周瑜大喜：「皇叔高才。」周瑜令左右人將焦尾於膝上，有意彈夫子杏壇。琴聲未盡，周瑜大醉，不能撫盡。玄德曰：「元帥醉也。」眾皆交錯，起坐喧嘩。皇叔潛身下樓，至江岸，把江人言：「皇叔何往。」玄德曰：「元帥醉也，令明日準備筵會，等劉備過江，來日小官寨中回宴，請您眾官。」把江官人不語，皇叔上船。後說周瑜酒醒，按琴膝上，緩然而坐，問左右曰：「皇叔何往也。」告曰：「皇叔下樓去了多時。」周瑜大驚，急叫把江底官人，言：「玄德自言，元帥有令，過江準備筵會去也。」卻說周瑜碎其琴，高罵眾官：「吾一時醉，走了滑虜劉備。」<sup>85</sup>

從劉玄德醉走黃鶴樓的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瑜原先在《三國志》中正直高尚的形象早已蕩然無存，進而在《三國志平話》當中轉變成會喝酒誤事，事

<sup>84</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48。

<sup>85</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49。

後還會推責於眾官之人，如此自大妄為、不負責任的形象，實與正史的形象差距甚大。而與諸葛亮次次對壘的描述中，周瑜氣度狹小的性格特點也與正史的記載有所不同：

至來日，西有曹璋陣，東有周瑜陣，北有張飛。卻說張飛見周瑜，長揖言。「周公瑾別來無恙。」周瑜言：「賊將者敢欺我。」見張飛背後旗上寫『車騎將軍』。公瑾言：「今氣我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孫權官小如張飛。」周瑜恨在懷中。吳將與曹璋對陣，交馬多時，不見輸贏。卻說張飛言：「吳將近後，我斬曹璋。」吳軍不識翼德之威，叫一聲出九霄之外，連戰曹璋，璋大敗。周瑜言曰：「守數日，不得曹璋便宜，今日張飛贏了，咱不羞矣。」周瑜亦趕曹璋，璋射一箭，正中周瑜，落下馬來。不是眾人，幾乎捉了周瑜。天晚，班軍至營內，張飛亦回奔寨，高叫：「前者夏口受危，元帥救俺，今日元帥二十日不得曹璋便宜，張飛殺敗，把夏口四郡獻與公瑾，以報夏口之恩。」道罷去了。周瑜藥貼金瘡，鈞其左臂，言曰：「孤窮劉備負我之恩，被張飛氣我，皆是諸葛也。與我四郡，諸葛意在何處。」無數日，人告周瑜言：「皇叔，諸葛三千軍守了荊州。」周瑜見道，叫一聲，金瘡血出，眾官曰：「荊州吳地。」瑜即時引軍在路。<sup>86</sup>

此段主要是在描述當時周瑜與曹璋對陣多時，一時間不分勝負，於是魯肅便向周瑜建言求援蜀軍，而諸葛亮派出張飛出征的精采段落。此段將周瑜氣度狹小的個性描繪的淋漓盡致，先從因張飛的「車騎將軍」稱謂與他家主公「討虜將軍」的地位相同，周瑜氣不過，自覺受了奇恥大辱開始，到後來張飛打了勝仗，周瑜卻沒因此而開心，反倒忿忿不平的行為，都可看出他是位見不得別人好的將領。甚至在描述中，可以看到他認為諸葛亮只是個「牧牛村夫」，是不能與自己相提並論的，卻往往被氣得「大叫一聲，金瘡迸裂」。《三國志平話》中種種形象上的刻劃，早已顛覆了正史中周瑜「雅量高致，性度恢廓」的原型，而漸漸形成另一種民間版本—空有才智，卻心胸狹隘、毫無風度，不能成大事的周瑜。

## 二、 元代《三國志平話》的諸葛亮

《三國志平話》主要是以蜀漢為全書敘述的核心，而曹魏及東吳兩國的敘事篇章卻相對薄弱了一些，在這樣的體系架構當中，蜀漢集團人物事蹟的呈現自然也就佔了許多書中的重要篇章。在《三國志平話》中，全篇分成上、中、下卷，自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後，常敗將軍劉備便開始嘗到勝利的滋味，甚至漸漸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蜀漢帝國。而這樣以蜀漢為正統的一部典籍，諸葛亮的出現可說是全書的分水嶺，猶如一顆閃耀的星星豐富了整個故事精采度，讓人至今仍

<sup>86</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50。

然為之津津樂道。不過，細較之下，相對於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中的諸葛亮也出現了以下的形象轉變：

### （一）粗曠、魯莽的性格特色

諸葛亮的個人特色在《三國志平話》中，出現了相當大的轉變，從原先在《三國志》中躬耕田隴、溫文儒雅的書生形象，轉化為性格豪放、個性急躁之人。從以下段落就可以略知一二：

唬諸葛大驚：倘若不起軍，夏口主公休矣！言盡，結袍輓衣，提劍就階，殺了來使。眾官皆鬧。張昭，吳危曰：「方知諸葛奸猾！知者知是諸葛殺了曹使；不知，則言吳軍殺之。」令人執了諸葛。諸葛叫而言曰：「討虜錯矣！適來曹公書，將軍再看，方知天下諸侯十個被曹操殺無一二。我家主公是高祖十七代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有何罪過？倘若來殺皇叔，必收江吳之地。將軍熟思之。」魯肅曰：「主公不聞天下人言，斬者不由獻帝，存亡皆在曹公。」<sup>87</sup>

從中敘述，我們可以發現到諸葛亮居然提劍殺了來使，完全違反了「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基本禮儀，更何況是在吳國境內斬殺曹使，更顯諸葛亮未經深思熟慮，便做出決策的莽撞個性，而且從「結袍輓衣」、「提劍就階」、「諸葛叫而言」等小動作中，都可以發現諸葛亮略顯粗魯的性格特點。下面我們再看「孔明說周瑜」的部分情節：

孔明振威而喝曰：「今曹操動軍，遠收江吳，非為皇叔之過也。爾須知曹操，長安建銅雀宮，拘刷天下美色婦人。今曹相取江吳，虜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清名？」周瑜推衣而起，喝：「夫人歸後堂！我為大丈夫，豈受人辱！即見討虜為帥，當殺曹公。」<sup>88</sup>

「振威而喝」的動作顯現了諸葛亮在《三國志平話》中陽剛的一面，諸葛亮為了要勸周瑜與自己聯手抗曹，在小喬面前怒喝周瑜，而這樣的激將法最終也達到了效果，但卻與《三國志》中諸葛亮雍容斯文的形象相去甚遠。」而同樣的吆喝也出現在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平南郡之亂的段落當中：

軍師捉了蠻王，又使金珠贖了。軍師又言：「咱會一戰，就馬上喝下你來，納降麼？」蠻王不信。去無數日，軍師與蠻軍對陣。軍師出喝三聲，南陣上蠻王下馬。軍師到營，蠻王又不降。又使金珠贖了。蠻王歸寨，與眾官

<sup>87</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8。

<sup>88</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9。

評議，使人多驅虎豹。前後一月，又搦戰。軍師會其意。無五日，對陣，蠻王令人打出虎豹來。諸葛喝一聲，絕倒千人。一手仗牌，一手提劍，後立名曰蠻牌，充遼虎豹又驚。軍師背後鑼聲皆發，又捉了蠻王，又得了五十萬貫金珠，贖與了歸營。<sup>89</sup>

從諸葛亮與蠻軍的對陣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軍師出喝三聲，南陣上蠻王下馬」、「諸葛喝一聲，絕倒千人」等描述看到，諸葛亮此時的形象並非弱不禁風的文弱書生，反倒成了能在兩軍交戰之時，舞刀弄劍、威嚇四方的戰場霸主，而這樣威猛的形象，甚至可以與聲巨如雷、勇冠三軍的張飛相提並論了。

那為何諸葛亮的形象在《三國志》及《三國志平話》的描述上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呢？主要是因為兩書的作者在寫作動機及其所設定的理想讀者上有所不同，《三國志》主要是為了呈現最原汁原味的歷史風貌，而其所設定的理想讀者可能也較偏向讀書人，所以在形象的設定上諸葛亮便會顯得冷靜理智、文質彬彬，塑造出一種高風亮節的書生觀感。反觀《三國志平話》，其出自民間說書人之手，所設定的理想讀者也多為平民百姓，那諸葛亮的形象自然也得較為個性鮮明、動作粗曠，才能讓市井小民心有戚戚焉，而在《中國歷史小說的藝術流變》中，紀德君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

宋元平話在以市井細民的歷史觀念和政治要求詮釋、褒貶歷史人事的同時自覺的用市井細民的眼光來打量、描寫他們所喜愛的帝王將相，有意拉近帝王將相與市井細民的心理距離。這樣，正史中高貴、莊嚴、威武的帝王將相，便幾無例外的被平民化了，他們外在的行為舉止，內在的心理欲求，和市井細民並沒有甚麼兩樣，甚至他們原本就是市井細民或鄉野莊農。<sup>90</sup>

依上述所言，為了拉近文本中人物與當時平民百姓的心理距離，《三國志平話》中所構建出魯莽粗曠、大聲吆喝的諸葛亮形象，也就更為貼近基層民眾內心的聲音，甚至偶爾少一根筋、犯點過錯的行為表現，不但瑕不掩瑜，反而更顯其親切、平民，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三國志平話》中所描述的諸葛孔明，其實間接投射出了當時宋元民眾的某些心理狀態，以及他們對帝王將相的期望感受。

## (二) 充滿神仙色彩的行為表現

呈上所述，《三國志平話》為了要貼近市井小民的內心感受，角色形象的呈現上難免會偏離史實，甚至給予人物特別的風格特色，讓人物看起來更富有故事性及趣味性，讓平常老百姓都可以參與文本，融入其中。而諸葛亮更是其中人物角色裡的重中之重，因而文本便將他描述為一位能呼風喚雨、窺伺天機的軍師，

<sup>89</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0。

<sup>90</sup> 紀德君：《中國歷史小說的藝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23。

在諸葛亮未出場前，徐庶就舉薦諸葛亮時就曾有以下描述：

徐庶曰：「南有臥龍，北有鳳雛，鳳雛者是龐統也；臥龍者諸葛也，見在南陽臥龍岡蓋一茅廬，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行兵如神，動止有神鬼不解之機，可為軍師。」先主聽畢，大喜；與徐庶相別，卻還新野。<sup>91</sup>

呈上所述，從「行兵如神」、「動止有神鬼不解之機」等字裡行間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徐庶對諸葛亮的讚嘆之情，而這樣的敘述也已經開始將諸葛亮加以神格化，下面的敘述更是將諸葛亮神仙般的本事描繪的淋漓盡致：

話說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廬謁臥龍，不得相見。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當，攻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sup>92</sup>

在劉備三顧茅廬的段落中，直接將諸葛亮視為一位能「撒豆成兵、揮劍成河」的神仙，連司馬懿都困惑其到底是人？還是神仙？這樣的敘述雖有誇大其詞、超乎想像之感，但卻也讓整段故事更加的精采，令人為之著迷。而在諸葛亮南征孟獲的段落中，也有類似的敘述：

又數日，引軍南到蠻界，至瀘水江。其江泛溪熱，不能進。武侯撫琴，其江水自冷。軍師令軍速過，言不聞蠻景煙瘴，瀘水蜈蚣巴蛇，乃蠻地毒物。<sup>93</sup>

撫琴居然可以讓江水變冷，這樣的敘述早已添加了許多想像的成分在其中，對陣蠻王孟獲，更是以神乎其技的超能力令孟獲心服口服：

建興二年，是六月半，大雪降中間，軍到焦紅江，深闊無計可過。軍師令人造風輪，隨風而過，正落在住處蒲關。蠻王曰：「諸葛非人也，乃天神也！」邀軍師入蒲關，管待數日，獻十車金珠，折箭為誓，世不反漢。<sup>94</sup>

「撫琴降溫」、「造風輪」這些能駕馭自然的超能力，自然讓蠻王看得目瞪口呆，佩服的五體投地，也無怪乎孟獲會說：「諸葛非人也，乃天神也。」進而折箭為誓，世不反漢。而在《三國志平話》當中的描述，諸葛亮不僅生前神奇，甚至連死後都能讓司馬懿唯命是從：

<sup>91</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5。

<sup>92</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5。

<sup>93</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0。

<sup>94</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1。

至當夜，狂風過處，見一神人言：「軍師令我來送書。」司馬接看，書中之意略云：「吾死，漢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漢亡，魏亦滅，吳次之。爾宗必有一統。若爾執迷妄舉，禍及爾也。」司馬看罷，有不從之意。神人大喝。司馬喏喏言曰：「願從軍師之令。」神人遂推司馬倒地，叫聲不迭，覺來卻是一夢。以此司馬各立邊疆，不與漢爭鋒，還朝。<sup>95</sup>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諸葛亮的描述已經接近神話故事之境界，居然可以驅使鬼神入夢，並讓司馬懿能在其死後，依然聽從命令，各立邊疆，不與漢爭鋒。如此的寫法，是創作者經由極端誇張的想像，並融合相關的民間故事之後，所形成的諸葛亮版本。雖說如此神格化的呈現，早已不符合最初諸葛亮在歷史中的原型，但卻也因此看到諸葛亮在後世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並為後來的戲曲小說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進而在民間俗文學中，佔有其一席之地。

### 第三節 小結

《三國演義》是一部以歷史事件為主，民間傳說為輔的歷史長篇章回小說，因此，若要研究《三國演義》，必然也要對於《三國志》以及《三國志平話》這部作品有著一定程度的熟悉，方可了解《三國演義》故事的來龍去脈。而在先前的第一節與第二節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三國志》與《三國志平話》之間的情節與人物形象，有著不小的出入，瀟灑大度的周瑜演變成自大妄為、氣量狹窄的小人，羽扇綸巾的諸葛亮演變成粗曠豪放的性格角色。雖然如此，透過這樣的演變，不僅讓我們發現到俗文學影響力的巨大，甚至對後來的長篇小說的發展上有著不小的幫助：

講史平話敘事稚拙，雖非藝術佳構，但是它上承唐代變文，下啟明清演義，作為從白話短篇小說發展到長篇的關鍵環節，在中國小說演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sup>96</sup>

由上可知，《三國志平話》的文學性雖不如《三國志》，但它卻承上啟下的關鍵要素，若沒有平話作為依據，《三國演義》是否能問世，可能還是個未知數，因此《三國志平話》可說是羅貫中《三國演義》的一塊跳板，對此，鄭鐵生也表示：

《三國志平話》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它結束了「說三分」和元雜劇三國戲

<sup>95</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3。

<sup>96</sup> 陳翔華撰：〈論講史平話及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收於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平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一，頁10。



那種以各自獨立的單元式故事出現的局面，形成一個雖然粗略但已構成初具系統的三國故事，僅此一點就使它在長篇小說敘事型態發展的長河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sup>97</sup>

總歸而言，不管是《三國志》，抑或是《三國志平話》，他們皆各有其各自的特色與功能。《三國志》提供了歷史中的人物原型與事件，而《三國志平話》則是將各段小故事連綴成篇，提供了一個較具連貫性的整體架構。因此，透過《三國志》的故事與角色與《三國志平話》的情節串聯，加之羅貫中的巧手妙筆，《三國演義》這部歷史鉅作也就此問世，並受到社會大眾的喜愛與關注，從而歷久不衰！



---

<sup>97</sup> 鄭鐵生撰：《三國演義敘事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頁73。

### 第三章 《三國演義》中周瑜人物形象分析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曾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出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sup>98</sup>在談笑間，令強虜灰飛煙滅的瀟灑姿態甚是令人神往，而在前章《三國志》的描述裡頭，周瑜的形象也近乎無懈可擊。但隨著歷史軌跡的推移，周瑜的形象描述也開始出現了兩支不同的分岔系統。一類多以文人作品為主，其描述多遵照史實，寫法多近似於《三國志》；另一類則以俗文學為藍本，而民間故事中的周瑜雖依然智勇雙全，但為了凸顯諸葛亮的好，周瑜的形象開始由正面轉向負面，甚至出現了性格偏狹、氣量狹小等悖離史實之敘述。

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則是屬於俗文學這一類的作品，不難想見作者除了會在文字敘述上參照正史《三國志》外，更同時融合了《三國志平話》與戲曲人物的各種特色，使周瑜的形象在《三國演義》呈現了正反兩極鮮明的二重性。與曹操抗衡時，是位不可一世、叱吒風雲的大英雄；但與諸葛亮的對陣，卻又成了一個毫無氣度的敗軍之將，這樣充滿矛盾的性格描述，卻也使《三國演義》中的周瑜更加接近平常人的行為舉動，使得故事的描繪更能夠貼近人心。因此，本章將對於《三國演義》中周瑜的形象從其外在形象、才能及心胸氣度等各方面，進行全面且客觀的探究，進而釐清小說與史實的差異及原因。

#### 第一節 消失殆盡的瀟灑大度

在小說的描述當中，人物的刻畫通常會透過外在形象加以呈現，而外貌甚至能隱約透露出一個角色的性格特色，而在高瑞卿主編的《文學寫作概要》當中便曾提到：

小說人物的審美直覺性十分強烈，所以在人物的塑造中，外在刻劃非常重要，外在刻劃是否成功，關係到人物塑造的成敗。肖像的描寫就是直接刻劃人物的肖像特徵，通常對於人物的相貌、體態、衣著等等外部型態的描繪，來揭示人物的內在性格。肖像描寫的基本要求是，既要傳神，又要性格化。<sup>99</sup>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小說中人物外型的描述，不僅可以體現角色的獨特性，更是一個角色能否鮮明、生動的關鍵，而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大部分的主要人物也都擁有相當具體的描述及呈現。以周瑜來說，其初登場出現在第十五回〈太

<sup>98</sup> [北宋]蘇軾：《東坡樂府》，臺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頁9。

<sup>99</sup> 高瑞卿主編：《文學寫作概要》，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214。

史慈酣鬥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中：

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仙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仙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sup>100</sup>

上段引文我們可說是《三國演義》對周瑜形象描述的總綱，在周瑜的「名」與「字號」當中，「瑜」與「瑾」指的都是美麗的玉石，而周瑜也正是人如其名，其「姿質風流，儀容秀麗」外貌形象眾所皆知。因此，在羅貫中的描述當中，我們彷彿可以見到周瑜那俊俏秀美的外表，而在「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的句子中，我們則能看出周瑜與東吳君主那非比尋常的友誼關係。甚至後面周瑜與孫策協商、尋覓人才的段落當中，也把周瑜的視才之明與治國才幹表述的淋漓盡致。對於初次登場的人物而言，羅貫中這樣的敘寫方式，其實是對周瑜充滿許多正面評價的，也較為符合正史當中周瑜那風流瀟灑的才子形象。

然而，《三國演義》的內容既有史實，也有一些虛構的成分存在。所以周瑜的形象在諸葛亮出現後，便開始產生一種悖離史實，卻又深植人心的微妙變化，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曾表示：

為了美化諸葛亮，他卻又將這一戰鬥中的其他重要將士變成漫畫式人物。……正史記載了諸葛亮、魯肅、周瑜、孫權之間的許多對話，羅貫中無論何時在其小說中重述這些對話時，魯肅與周瑜也是以目光遠大、勇氣百倍的政治家出現時，與孫權手下其他怯懦的謀士恰成對比。但在虛構成分比較多的場景中，他們僅僅成了諸葛亮足智多謀的喜劇陪襯。<sup>101</sup>

在這段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國演義》中的周瑜形象，主要是建立在作為諸葛亮陪襯角色的基礎上，例如在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中便有所描述：

<sup>10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83。

<sup>101</sup>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6。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sup>102</sup>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周瑜發現孔明料事如神，計畫總走在自己的前面時，便暗生殺諸葛孔明之心，此時周瑜見不得別人好的心理層面已開始浮上檯面，形象已經開始逐漸崩解。在第四十六回〈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中，更是利用魯肅與諸葛亮的對話，襯托出周瑜與諸葛亮間的強烈反差：

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卻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sup>103</sup>

在上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肅質問諸葛亮為何看到黃蓋被打而不出手相救？誰知諸葛亮突然回了一句：「子敬欺我。」從這裡便可以知道諸葛亮早已洞悉全局，知道東吳在演「苦肉計」的戲碼，甚至還特別要魯肅跟周瑜說謊，以掩蓋他知道真相的事實。而後，魯肅跟周瑜秉告的經過如下：

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薄情。」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卻不敢明言。<sup>104</sup>

<sup>10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4-515。

<sup>10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0。

<sup>10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0。

從上述的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到兩位軍師彼此之間互相角力、鬥智，而藉由魯肅傳話的過程，強烈的反襯出諸葛亮與周瑜之間的差異，一位是早已洞燭機先卻不欲人知，另一位則是自以為是而沾沾自喜。從這裡我們便可以清楚的看到羅貫中利用周瑜的「苦肉計」，再次凸顯諸葛亮的足智多謀。而在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中，也有類似的表現手法：

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sup>105</sup>

在〈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的章回當中，周瑜因為想用火攻但風向不對，而積鬱成疾，苦思而不得其解。正當東吳的眾將士都不知都督為何而病，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時，只見諸葛亮以紙條娓娓道出周瑜的病源，甚至還提出了解決之道，即便是高傲如周瑜這般，此時也不禁佩服的五體投地。此段利用周瑜內心獨白的方式，將諸葛亮的形象再次提升，甚至近乎神格化，在如此的對比之下，周瑜形象再次相形失色，而原先在陳壽筆下那位「曲有誤，周郎顧」的風流倜儻之士，在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描繪之下，那近乎完美的外貌形象，最終也就只能淪為諸葛亮身旁的綠葉角色了！

## 第二節 受君主所器重的東吳第一謀士

在《三國演義》當中，由於作者「尊劉抑曹」、「心存漢室」的主觀意識過於強烈，進而在很多故事情節當中皆悖離了史實，不僅僅是曹魏方面的猛將謀士受到貶抑，連帶東吳一方的將領也皆是如此，而這當中，周瑜的才能更是被放大化的諸葛亮給比了下去。雖說如此，一代將星的才華，在戰爭當中的文韜武略，依然是不可被抹滅的。作為周瑜的死對頭，諸葛亮其實對周瑜是推崇備至的，因此，在《三國演義》描述諸葛亮為周瑜寫的祭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底下的這段話：

吊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捨以民。吊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吊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吊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

<sup>10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3。

奮翼。吊君鄱陽，蔣干來說；揮灑自如，雅量高志。吊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sup>106</sup>

在上述的祭文當中，幾近將周瑜一生功業洋洋灑灑的加以描繪，而在這當中，從周瑜投效孫策、勸孫權勿遣子為人質，一直到赤壁之戰當中的智騙蔣幹及火燒曹軍，皆在在的呈現出周瑜的足智多謀，以及他那與眾不同的非凡才氣。而以下便藉由上述的幾個事件，呈現這位東吳第一謀士在《三國演義》中的智慧形象：

### 一、投效孫策，開始嶄露頭角

在《三國演義》第十五回〈太史慈酣鬪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的章回當中，乃是周公瑾的初次登場，而其實他與孫策早在孫堅討伐董卓之時已為舊識，並以兄弟相稱。因此當孫策欲從袁術處借兵出征之時，周瑜自然毫不猶豫地投靠了孫策，並全心全力的輔佐孫策。而兩人之間的好關係，毛宗崗曾如此描述：

孫策是小霸王，此人亦是小范增也。<sup>107</sup>

這段評語雖然簡短，卻一語道盡了孫策與周瑜之間的緊密關係，兩人可說是「魚幫水、水幫魚」。而在投靠孫策之後，周瑜也漸漸的開始嶄露鋒芒，第一次獻策便成功的為孫策生擒一名猛將：

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裡，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涇縣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卻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裡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sup>108</sup>

孫策愛才惜才，而周瑜這招「三面攻縣，只留東門」的欲擒故縱，不僅活捉了太史慈，更正中孫策的下懷，讓孫策更加的賞識周瑜的才幹。然而，好景不常，孫

<sup>10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47。

<sup>107</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頁189。

<sup>10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87-188。

策在一次獵鹿的活動當中，遭到了偷襲：

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槍帶弓面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槍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面倒。那二人舉槍向孫策亂搦，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sup>109</sup>

雖說孫策後來被程普救回，但卻因傷處過多，再加上箭頭有毒，實是神仙也難救其性命。而在自知即將撒手人寰之際，孫策依然心心念念著周瑜，並將東吳的宏圖大業寄託給了其弟孫權：

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sup>110</sup>

從「內事張昭，外事周瑜」的語句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瑜早已得到孫策全心的信任，然而此時周瑜卻在駐守巴丘（今江西峽江），這兩位賢昆仲最終竟無法見上彼此最後一面，實令人嗚呼哀哉！而在後世對孫策的讚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孫策對周瑜的倚重程度：

後人有詩贊曰：「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靖，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專意屬周郎。」<sup>111</sup>

話說孫策已死，周瑜連夜趕回，卻只能見上孫策的靈柩一面，其哀痛程度自然可想而知，雖說如此，卻因此更加堅定了周瑜輔佐孫氏江山的決心，因此當孫權依循兄長之命，繼續尋求周瑜的協助時，周瑜也毫不考慮地應承了下來：

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sup>112</sup>

而此時的周瑜，並未被悲傷蒙蔽了其聰慧的心智，並更加清楚明白的知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倘若孫權要繼承兄長之業，並將其發揚光大，還需要更多賢能之士從旁輔佐，方能安定江東，進而成就大業。因此，他便又向孫權舉

<sup>10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345-346。

<sup>11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350。

<sup>11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351。

<sup>112</sup> 同註116。

薦了一人：

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sup>113</sup>

而事實證明，周瑜是對的，魯肅不僅建議孫權要進伐劉表，並與曹操各自雄霸一方之外，更替孫權再次招攬到賢士諸葛瑾，而諸葛瑾則建議孫權且順曹操，勿通袁紹。在眾謀士的建言之下，孫權漸漸的安定江東，獲取民心，而周瑜自然也就成了江東勢力的中流砥柱，也因而再次獲得了新任君主的器重與信任。

## 二、洞悉時局，勸孫權勿遣子為質

呈前面小節所述，自從孫權聽從周瑜的建議之後，不僅固守住原有的根據地，更加廣納四方賓客，開會館於吳會，而賢士之間又相互舉薦，頓時之間，猛將謀士齊來，東吳舉薦的風氣蔚為一股潮流，因此，在《三國演義》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底下的描述：

時有會稽闕澤，字德潤；彭城嚴畷，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陽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烏傷駱統，字公緒；烏程吾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南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琅琊徐盛，字文向；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sup>114</sup>

經年累月，孫權在周瑜的輔佐之下，江東地區呈現了一片祥和繁榮之貌。然而，好景不常，建安七年，透過「官渡之戰」，曹操打了歷史上相當著名以少勝多的一場戰役，而經此一戰，也將袁紹的勢力完全打出了群雄爭霸的版圖。至此，曹操便開始將其野心往南延伸，動起了下江南的念頭：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遺業，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吳太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

<sup>113</sup> 同註 116。

<sup>11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49。



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sup>115</sup>

相較於《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的《江表傳》，《三國演義》對於周瑜勸諫孫權勿遣子一事，寫得較為簡略，但是在這當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周瑜對東吳立國理念的表述。當時，北方的曹操顛覆袁紹集團之後，局勢大致由曹操所掌握，因此，如何在北方曹魏集團以及其他江南的割據勢力當中找到平衡點，這不僅僅關係到孫吳一時的安危，更關係到孫吳未來在天下局勢當中的發展。

此時的周瑜，雖然年輕，但對於東吳未來發展的態勢，卻了然於心，在此次規畫當中，周瑜替孫權點出了江東「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的優勢，更認為東吳政權若能不為求魁儡漢獻帝的封侯而見制於人的話，便能自立於江南，從而南面稱孤。而拒絕曹操「送子為質」的要求，雖是一著險棋，卻也確立了東吳與曹操抗衡，從而謀求自立於江東的發展藍圖。

### 三、赤壁一戰，助東吳順利抗曹

官渡之戰後，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形式再次發生巨大的改變，北方的公孫瓚、呂布、袁術、袁紹，雖皆曾叱吒一時，但終歸曇花一現，無法延續。取而代之的，是收歸許多良臣猛將，稱霸北方的曹操，而此時富饒的江東之地，自然也就成了曹操眼下覬覦的待宰羔羊，這也才會致使後來歷史著名的「赤壁之戰」。而在《三國演義》當中，除了闡述史實之外，有著更多鬥智鬥力、扣人心弦的曲折情節，因此在周先慎的《古典小說鑑賞》中曾言道：

戰爭不單單是武力的較量，同時也是一種鬥智和鬥勇的過程。赤壁之戰鮮明的體現這一特點。在八回書中，實際寫開戰的不到兩回，其餘都是圍繞著決定戰爭勝負的多種因素，豐富多彩的展現出戰爭發展的進程。<sup>116</sup>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描寫赤壁之戰的這八回當中，真正敘述戰爭的篇章竟不到兩回，其餘的幾乎皆在描摹眾謀士間，如何角力鬥智、勾心鬥角的心理層面。而在這當中，又以周瑜與諸葛亮的智謀戰所佔之比例為重。因此，這此段落中，我們將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去探討《三國演義》當中，作者如何呈現赤壁之戰當中周瑜的人物形象：

#### (一) 力諫孫權抗曹的關鍵人物：

在孫權拒絕送兒子到曹操那邊為人質之後，曹操便開始對孫吳勢力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因此，當曹操完全剿滅袁紹在北方的勢力之後，曹軍便旋即南指，劉

<sup>115</sup> 同註 119。

<sup>116</sup> 周先慎：《古典小說鑑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236。

琮懼而投降，而曹操便不費吹灰之力的取得了荊州。此時的曹操，知道劉備轉投江夏，深怕劉備軍隊會與孫權聯手共同抗曹，於是便發檄文給孫權：

孤近承帝命，奉詔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sup>117</sup>

表面上，曹操假借漢獻帝之名，欲與孫權結盟，共伐劉備；實際上，卻是結合他新納入的荊州軍，向江東步步進逼。如此軟硬兼施的作法，嚇得當時東吳群臣不知所措，頓時間議論四起，為了該降還是該戰而爭論不休。此時，孫權內心也是相當的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而在《三國演義》的四十三回與四十四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周瑜雖沒有舌戰群儒，然而他卻是左右孫權決策的關鍵性人物：

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sup>118</sup>

正當孫權為了要戰還是要降而苦惱不堪時，周瑜的一席話彷彿醍醐灌頂般，瞬間澆醒了懵懵懂懂的孫權。此段中，周瑜極為明智的點出了曹軍南犯的四個大忌，從北方未平，馬騰、韓遂有如芒刺在背開始，一直到北軍南侵，外加時值隆冬，定會水土不服為止，一席精闢的分析，娓娓道出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利於曹軍的事實，講得主降派個個啞口無言、鴉雀無聲，也讓孫權當下就拔劍斫案，決心抗曹。然而，此時的孫權心中尚有疑慮，並未全然相信周瑜所言，為此，周瑜再次面見孫權：

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正為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未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為慮。」<sup>119</sup>

<sup>11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97。

<sup>11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3-514。

<sup>119</sup> 同註124，頁514。

由於東吳的軍隊與曹軍的數量仍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孫權仍然無法全然相信東吳有打贏的可能性。而在這邊，周瑜再次精闢的點出了曹軍弱勢之處，他向孫權分析曹操的直屬軍約為十五、六萬人，其中的一半卻包含了平定袁紹的收編之兵，而一群軍心未定，仍互相猜忌、狐疑的軍隊，實不足懼。這一席話，再次聽得孫權君心激昂：

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sup>120</sup>

因此，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周瑜在東吳的影響力之大，而且若非周瑜與魯肅當時跳出來獨排眾議，並力諫孫權抗曹，恐怕東吳早已降曹，更不會有後來的孫劉聯軍與赤壁之戰的發生。而這其中，周瑜更是扮演了安定孫權心理的關鍵角色，比起主降派的張昭，周瑜更加深得君王之心，且精確地指出各項東吳的優勢與劣勢，如此鞭闢入裡的言論，也再次凸顯周瑜那深謀遠慮的智慧！

## (二) 使手段詐欺蔣幹：

計謀的運用，往往會在瞬息萬變的戰事中起到翻轉局面的作用，而其中以「間諜」來蒐集敵方資料的手段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此，一旦透過間諜掌握了敵方的軍情資訊，便會使得戰爭更加容易、更加穩操勝券，而在《孫子兵法·用間》當中便分析了五種不同的「間諜」之法：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也。生間者，反報也。<sup>121</sup>

從上述可知，在《孫子兵法》當中，將間諜使用的方式分為五類，而其中又以「反間計」最為困難，所謂「反間」，就是利用敵方間諜帶回錯誤情報，進而擾亂敵方對於形勢的判斷，頗有一種利用別人的圈套，進而將對手反將一軍的味道。周瑜於赤壁之戰前夕便相當巧妙的使用了一次反間計，我們在《三國演義》的四十五回當中，可以看到這段落的精采描述：

<sup>120</sup> 同註 20，頁 514-515。

<sup>121</sup> [東周]孫武著、[東漢]曹操註、[清]孫星衍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頁 259-265。

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sup>122</sup>

當時曹操正苦無破敵之計，聽聞蔣幹能夠作為曹軍間諜說服周瑜來降，不僅喜上眉梢，立刻點頭讓蔣幹前往東吳營帳。豈知，周瑜早已料到昔日同窗好友的來意，並劈頭就說：「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絲毫不給蔣幹任何開口說服自己的機會，此時的蔣幹竟也只好木訥無語，不敢多言。然而，若是一事無成的回去，蔣幹自知必受責罰，於是他開始尋找一些對於曹操有用的情報：

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著？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著一卷文書，乃起床偷視之，卻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sup>123</sup>

對於勸降之計無效的蔣幹而言，這封降書猶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般的珍貴，蔣幹認為此書若是帶回曹營，必是大功一件，並可為曹操剷除奸細。然而，這早已是周瑜所設下的圈套，為了增加事件的真實性，周瑜更繼續加碼演出：

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床上睡著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卻？」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裝睡著。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sup>124</sup>

此時的周瑜再次加油添醋，透過假說夢話，懊悔自己酒後失言，以及故意設計的帳外談話，讓蔣幹更加對於自己的判斷深信不疑。並在周瑜的「安排」之下，連夜溜回江北，將假信獻給曹操。而這種小道謠言，卻正好極其符合曹操生性多疑

<sup>12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6-527。

<sup>12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8。

<sup>12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8。

的心理，二話不說的便斬了當時曹軍最為得力的兩位水師大將，事後雖為懊悔，卻已無法挽回。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羅貫中的筆下，周瑜利用一次精采萬分的反間計，不費吹灰之力的除掉了他的心頭大患。然而，歷史上並無「蔣幹盜書」一事的發生，蔣幹更是一位才智卓越、風度翩翩的君子之士，但小說如果照實敘寫，其精彩與碰撞自會減少許多，因此，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經由羅貫中的巧奪天工之下，並透過在情節上緊湊、合理的安排，加上對每位人物鮮明的個性描繪，造就了「蔣幹盜書」的精采篇章，雖不符合史實，卻深深地抓住了每位讀者的心！

### (三) 計中有計的「連環計」：

一位思慮縝密、計策周全的謀士，面對強大的敵人之時，必定要懂得如何智奪巧取，多計並用，方能夠克敵制勝。而在《三國演義》的敘寫當中，赤壁之戰的精采之處其實不在戰爭場面的描繪，而是眾家謀士如何運用計謀取得勝利的過程呈現。而當曹、吳兩軍隔江對峙，戰局呈現僵局之時，周瑜便從對蔡和、蔡中採用「反間計」開始佈局，然後以打黃蓋實行「苦肉計」作為催化劑，直到龐統向曹操詐降獻「連船計」，巧妙地讓曹軍的船艦鎖在一起，進而完成了一個既恐怖又細膩的「連環計」。所以簡單來說，「連環計」便是要利用環環相扣的計策讓敵人自顧不暇，無法辨識真偽，若有一環失誤，連環計就會滿盤皆輸。因此，在揭暄的《兵經·疊》中便曾提到：

大凡用計者，非一計之可孤行，必有數計以勦之也。以數計勦一計，由千百計煉數計，數計熟則法法生。若間中者偶也；適勝者遇也。故善用兵者，行計務實施，運巧必防損，立謀慮中變，命將杜違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數端起，前未行而後復具，百計疊出，算無遺策，雖智將強敵，可立制也。<sup>125</sup>

如同上述所言，面對老奸巨猾、經驗老到的曹操，周瑜若是孤行一計必不可行，甚至有可能會遭到反將一軍，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計謀若要取得成功，勢必要有如抽絲剝繭般的數道計策同時進行，才能夠足以避開敵人雪亮的眼睛，周瑜心中也深知此道理。然而，雖說曹軍久經沙場，已是兵乏馬困，但在人數上來說，孫劉聯軍依然是以小搏大，不能輕舉妄動，再苦無突破之口的情況下，有一天，機會之神卻開始偷偷向周瑜招手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曹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sup>126</sup>

<sup>125</sup> [明]揭暄著、李炳彥、崔彥臣評：《兵經釋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頁52-53。

機智的周瑜，一眼便識破了曹操的詭計，看出蔡和、蔡中並未是真心投降，而是曹營所派來埋伏的間諜，然而他卻並未就此點破，反倒留他二人性命以作後用：

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sup>127</sup>

至此，有了假消息的傳遞途徑，周瑜正開始思忖該如何部屬下一步行動時，黃蓋便出現了，連環計的二部曲也就正式開展了：

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sup>128</sup>

此段落，可以看出黃蓋是心甘情願的為周瑜執行這項艱鉅的「苦肉計」任務，而黃蓋與周瑜所合演的這齣看似痛徹心扉的戲碼，幾乎讓在旁的所有人都看了於心不忍，紛紛為黃蓋老將軍抱屈，但此計卻未能瞞過當時的東吳參謀闞澤：

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著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惟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闞澤欣然領諾。<sup>129</sup>

就這樣，闞澤便加入了這場深不可測的反間計畫之中，並進入曹營獻上黃蓋的詐降書。然而，曹操並不是個省油的燈，且在經過上次誤殺蔡瑁、張允的事件之後，他更加的步步為營、小心謹慎，因此，看完降書後，生性多疑的他馬上懷疑其中有詐：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卻敢來戲侮我耶！」<sup>130</sup>

<sup>12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8。

<sup>12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8。

<sup>12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9。

<sup>12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0。

<sup>130</sup> 同註134，頁546。

有了上次偽信事件的經驗，曹操自然更多了十二萬分的小心，此時即便巧舌如簧的闞澤，一時之間竟也無法完全取得曹操的信任。在這緊要關頭，周瑜先前將計就計的留下的兩位曹軍間諜，竟適時的發揮了功效：

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闞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sup>131</sup>

就這樣，狡猾的曹操竟再一次落入周瑜反間計的圈套當中，「黃蓋詐降」一事竟也就這樣讓曹操暫時相信了。回到東吳之後，闞澤又再一次與甘寧合演了第二齣詐降的戲碼，雖說缺乏謀略蔡中、蔡和依然毫無保留的相信，並稟報了曹操，但這卻使曹操的疑心病再起，連得兩封降書，反倒使得他心中忐忑不安、舉棋不定，這時候，前次受辱不甘的蔣幹再次跳出來說話了：

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sup>132</sup>

即刻，蔣幹再次駕著小船前往江東。聽聞消息的周瑜，再次計上心頭，想起之前龐統曾經建議過的「連船火攻」之計，但是苦於無人去與曹操提議，此時良機不好好把握更待何時，於是便設計了一齣蔣幹「巧遇」龐統的戲碼：

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sup>133</sup>

此間，周瑜佯怒質問蔣幹為何盜書，以致於曹操殺了蔡瑁及張允，此時蔣幹有如啞巴吃黃蓮，當他再想開口試圖為自己辯解時，卻已被周瑜差遣部下送至山後的小屋歇息，並如同上述所看到的段落遇見龐統。而龐統也就這樣順理成章的進入了曹營獻策，此時的曹軍兵疲馬困，到了船上更是暈得暈、吐得吐，龐統的獻策正好「貌似」解決了曹操心中所焦慮的事情：

<sup>13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7。

<sup>13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8。

<sup>13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49。

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

自此，從將計就計的接受蔡中、蔡和的投降開始，到黃蓋、甘寧的詐降戲碼，一直到龐統的「連船計」，我們可以看到幕後的操盤手皆是周瑜，而透過一計扣一計的連環效果，才獲得曹操全盤的信任，甚至認為自己已是勝券在握，甚至連程昱、荀攸提醒需防火攻的基本常識也聽不下去，最終再驕傲自滿的情緒帶動下，最終導致了自己慘敗於赤壁。而+，也再次讓我們見識到周瑜的足智多謀，然而，在史書上並沒有「周瑜打黃蓋」與「龐統獻連船計」的橋段，因此想必是羅貫中在史實、藝術與軍事謀略當中，自行斟酌、加入想像，進而取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平衡。所以，在清代張德堅的《賊情彙纂·偽軍制下·詭計》中便有以下的一段描述：

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點賊，採裨官野史中軍情，倣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實為不傳之祕訣。其裁取《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

134

由此可見，透過羅貫中的生動杜撰，讓《三國演義》不在只是一本歷史小說，更成了後人所參考的一本謀略手冊，而在羅貫中精彩的描述之下，讓周瑜在赤壁之戰與曹操的多次交手中，佔盡了上風，也再次凸顯出周瑜身為東吳第一謀士的不凡風采！

### 第三節 「既生瑜，何生亮」的狹小氣度

一提及周瑜，大多數人往往會直接聯想到的，並不是在沙場上運籌帷幄、瀟灑自如的周瑜形象，而是在戲劇舞台上那位心胸狹隘、處處見不得別人好的東吳大都督，而之所以會有這樣與正史迥異周瑜形象的出現，正是出自羅貫中之手。在羅氏的《三國演義》當中，於人於事，皆有不少的主觀褒貶，甚至為了增添情節的精采程度與緊湊性，作者採用了「七實三虛」的筆法，進而杜撰出諸葛亮神一般的角色能力，但卻也因而注定了周瑜在小說中的悲劇命運。因此，在康韻梅〈偏離史實的瑜亮情結——略談《三國演義》對赤壁之戰的摹寫〉中，便有著一段極為中肯的見解：

小說杜撰了周瑜與諸葛亮的緊張關係，是為全書最扣人心弦的精彩情節之

<sup>134</sup> 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615。



一，因而形成所謂的「瑜亮情結」。然此情節的構成卻是偏於一端的失衡狀態，即凡事都是諸葛亮略勝一籌，善妒的周瑜無法接受，而生發了惡毒心腸，次次欲加害諸葛亮，反而讓自己陷於更為不堪之境，因而更加憤怒不平。……如此一來，周瑜在歷史上的光華被消彌殆盡，終究成為了襯托諸葛亮的負面角色。<sup>135</sup>

由上述可知，為了塑造更多小說的可看性，羅貫中將原先史書中「雅量高致」的周瑜形象，改編成一位善妒善忌之人，更透過其欲次次加害諸葛亮不成，反被諸葛亮所氣，使得周瑜「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妒才心理更加生動鮮明。而本小節底下便將藉由《三國演義》當中三殺諸葛亮及三氣周瑜的情節，進而探究周瑜在《三國演義》中，被羅氏所塑造出的狹小氣度：

### 一、三殺諸葛

在《三國演義》的章回之中，從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開始，諸葛亮便展現了其超凡的才智，東吳群臣由下到上無一不讓他說得啞口無言，低頭無語。在諸葛亮初至江東嶄露鋒芒之際，從周瑜與諸葛亮暗中較勁的過程中，周瑜便發現到若留此人，日後必定會成為東吳難纏的對手，殺諸葛亮的念頭也因而一閃而過：

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sup>136</sup>

在魯肅的建議之下，周瑜便派遣諸葛瑾前往作為說客，試圖勸降諸葛亮，然而聰明如諸葛亮，早已知悉自己哥哥的來意為何，甚至反而勸哥哥轉頭劉備，不僅骨肉得以相聚，更可與自己共商天下大計。碰了一鼻子灰的諸葛瑾，回江東後將實情告知周瑜，周瑜欲謀殺諸葛孔明的心念也就更加堅定了，而三殺諸葛亮的戲碼也就自此登場：

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

<sup>135</sup> 康韻梅〈偏離史實的瑜亮情結——略談《三國演義》對赤壁之戰的摹寫〉，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08年，頁44-47。

<sup>13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5。

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一吾亦助兵千人一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sup>137</sup>

第一次周瑜所打的如意算盤，是假借「斷敵糧草」的名義，試圖派諸葛亮、關羽、張飛及趙雲等人，前往曹操的糧倉與糧道進行劫糧任務。然而，諸葛亮亦非省油的燈，對於劫糧的成功率可能性之低，他亦了然於心，明白周瑜無非是想派他們去「送死」。對此，諸葛孔明看準了周瑜好勝的心態倒推了一把：

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sup>138</sup>

好強的周瑜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言論，身為東吳第一謀士的他，被諸葛亮反譏他只會水戰而不會陸戰，此時的他便掉入了諸葛亮激將法的圈套之中：

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sup>139</sup>

此間周瑜爭勝好鬥的心態一覽無遺，原先自己欲假曹操之手加害諸葛亮，如今卻被諸葛亮激到想要自己前往劫糧，若非其後諸葛亮向魯肅解釋兩軍聯盟，正值用人之際，告訴魯肅恭請周瑜勿因自己的「片面戲言」而枉送性命，周瑜方才作罷，否則周瑜便有可能因為自己的意氣用事而自亂陣腳，甚至丟了性命，相較之下，諸葛亮在談笑風生間便破了周瑜的計謀，如此繪聲繪影的反襯敘述手法，實令人讀之莞爾一笑，並可從文字中感受到羅貫中所塑造出善忌善妒的周瑜形象。

一殺諸葛亮不成後，諸葛亮這位潛藏的大敵，對於周瑜來說，一日不除，便有如芒刺在背、如鯁在喉般令人難安，在第四十六回〈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的篇章開頭中，我們便可看到當諸葛亮識破了周瑜的反間計之後，再次堅定了周瑜殺諸葛亮的決心：

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妒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

<sup>137</sup> 同註 141，頁 521。

<sup>13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521-522。

<sup>13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522。

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sup>140</sup>

第二次行動的契機發生在群英會後，周瑜成功讓蔣幹帶回偽信，並假曹操之手除掉蔡瑁、張允這兩位精通水師的大將。此時自得意滿的周瑜，自然想試探諸葛亮是否看破他的伎倆，於是便派魯肅假意前往試探，不料他的反間計依然被孔明所識破。大驚之下，周瑜決心除掉諸葛亮，第四十六回中便有著精采的描述：

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吾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辦完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辦完？」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sup>141</sup>

由上可知，周瑜將製箭的重任委以諸葛亮全權處理，周瑜原先料想十天要造出十萬支箭根本是天方夜譚，誰知諸葛亮竟然自己說三天便可完工，這無疑是玩火自焚。早已有殺亮之心的周瑜，自然落井下石的要孔明寫下軍令狀，並且沾沾自喜地想著此次定是十拿九穩，諸葛亮肯定是必死無疑了！

然而，劇情在此卻發生戲劇性的轉折，羅貫中巧妙的運用正史上「孫權為求脫身而迴船」的事蹟，轉化成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聰明的諸葛亮早就算到三日後長江定起大霧，藉由濃霧佯攻，疑心病甚重的曹操必不敢貿然出擊，諸葛亮也就這樣順利的完成「借箭任務」。煮熟的鴨子就這樣飛了，周瑜雖然心有不甘，卻也無可奈何，並慨然而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sup>142</sup>

在龐統的連船計以及黃蓋的詐降接連成功之後，周瑜一切的計畫看似完美無缺，但這時在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中，卻提到周瑜在觀望曹軍布陣後，突然間口吐鮮血、不省人事，魯肅急忙請來孔明幫忙，非料諸葛亮用十六字便道出周瑜心病：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sup>143</sup>

半信半疑的周瑜，懷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差遣五百精兵前往南屏山築壇，並聽候諸葛孔明的吩咐。三更時分，忽然帳外東南風大作，旌旗不斷飄向西北邊，驚駭不已的周瑜吩咐了第一道軍令：

<sup>14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3。

<sup>14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3-534。

<sup>14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7。

<sup>14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4。

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sup>144</sup>

此時周瑜應該在意的是在東南風的有效時限內，利用火攻大舉進攻曹軍，否則時間一拉長，一旦曹操察覺的風勢有異，必然會將連鎖船的計策做出改變。然而周瑜這時的第一個念頭卻是派遣丁奉、徐盛等二位東吳名將，不計代價的殺掉孔明，可見他對諸葛亮的忌憚之大。為此，毛宗崗下了一段相當精闢的批註：

未調各路破曹操之兵，先調兩路殺孔明之兵。周郎之視孔明，重於曹操，重於八十三萬大兵也。<sup>145</sup>

所以，在整場赤壁之戰中，周瑜最害怕的，並非是曹操的百萬大軍，反倒是諸葛孔明近乎鬼神的表現。然而，第三次的加害行動依舊被識破：

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sup>146</sup>

綜觀而言，「三殺諸葛」的虛構情節當中，羅貫中藉由次次行動的失敗來醜化周瑜形象，進而將周瑜重新定位成一位欲致人於死地而方休的氣度狹小之人，而在陳壽《三國志》中周瑜「雅量高致」的形象，此時自然早已蕩然無存！

## 二、三氣周瑜

前段「三殺諸葛」的情節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於幾番欲殺諸葛亮，皆未能得逞，這不僅成功塑造了諸葛亮的才智卓絕，更使得周瑜在幾次的對決中，顯得灰頭土臉，徹底醜化周瑜的英雄形象。而在袁閻琨《中國兵書十大名典》的《將苑·將弊》中也曾提到：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sup>147</sup>

<sup>14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6。

<sup>145</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頁700。

<sup>14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6。

<sup>147</sup> 袁閻琨：《中國兵書十大名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702。

上述的為將之道中，「妒賢嫉能」在八個弊端當中名列第二，足以顯得這是當一位領導者相當忌諱之事。而在《三國演義》當中，周瑜的氣量狹小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大的罩門，「三殺諸葛」不成後，從第五十一回開始，羅貫中更是以著名的「三氣周瑜」的橋段，凸顯周瑜眼裡容不下別人的狹小氣度：

玄德問孔明曰：「卻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卻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卻忘耶？」玄德曰：「前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著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sup>148</sup>

赤壁戰後，孫劉聯軍大勝，曹軍退守南郡、襄陽、荊州等地，此時的孫劉二軍，雖仍為同盟，但早已各懷鬼胎、存有異心，無不想要佔領更多的根據地。此時的劉備，不同於孫吳早有兄長基業，依舊勢單力薄，無立足之地，但此時神鬼莫測的諸葛亮卻將焦躁不安的劉備勸住，只在江口屯紮，也為後續的劇情發展留下了伏筆。

卻說周瑜答應劉備若不能取得南郡，便任由劉備取之後，便積極進攻南郡，但曹軍早有準備，躁進的周瑜甚至在攻城中受了箭傷。但才智超群的周瑜並未因此而氣餒，反而將計就計的假裝自己傷重不治，引誘守將曹仁出城，再將其迎頭痛擊。辛苦獲勝的周瑜原以為此時南郡早已成自己的囊中之物，非料事態卻急轉直下：

逕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sup>149</sup>

原來，諸葛亮力勸劉備按兵不動的用意在於隔岸觀虎鬥後，再進而坐收漁翁之利。大怒之下的周瑜，再次分撥軍馬，直搗襄陽與荊州，但探馬再次來報：

探馬飛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卻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

<sup>150</sup>

<sup>14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84。

<sup>14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89。

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再次搶先了一步，此時荊州、南郡、襄陽盡入劉備囊中，大忙一場卻毫無所獲的周瑜如何不氣？一氣之下，先前攻城遺留的箭傷迸裂，周瑜大叫一聲便暈了過去，而此時也為後續周瑜的命運留下了伏筆。

二氣周瑜的戲碼則是發生在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中，早已看出劉備非池中之物的周瑜，建議孫權假借妹妹孫尚香續絃劉備之名，行軟禁劉備，奪取荊州之實。不料此齣「美人計」再度被諸葛孔明所看破，甚至授予趙雲三個錦囊協助劉備逃出東吳，機關算盡的周瑜，從未想過此事會弄巧成真，立即氣急敗壞地率軍在後苦苦追趕，但卻依舊落居下風：

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眾將急救，卻早不省人事。<sup>151</sup>

腹背受敵的周瑜，無奈之下也只得倉皇撤軍，善於心計的諸葛孔明，明白向來自負的周公瑾必然無法承受如此的奇恥大辱，便令眾將士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看似輕描淡寫的反諷之語，卻猶如正中紅心的箭狠狠的刺進周瑜的心坎裡，因而氣得舊傷復發，再次暈厥了過去。

經歷了前兩次的金瘡迸裂，不勝忿怒的周瑜，自是無時無刻想著該如何興兵雪恨。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讓他再次等到了機會：

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卻把荊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sup>152</sup>

屢次取荊州皆未成功的周瑜，這次想重現春秋時期「假道伐虢」的計策，意圖奪回戰略地位相當重要的荊州之地。可惜的是，計策雖妙，卻仍然無法逃過孔明的法眼，甚至假意答應，再暗中來個甕中捉鱉，因此，後人便有詩替周瑜惋惜：

<sup>15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89。

<sup>15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29。

<sup>15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38。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裏釣魚鈎。

153

來到荊州城下的周瑜，不僅空歡喜了一場，更差點成了蜀軍的刀下亡魂，雖僥倖被左右將士奮力救回船上，但被周瑜視為眼中釘的諸葛亮此時再度出招，修書遣人送之：

書曰：「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卻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非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sup>154</sup>

書中雖無嚴厲譴責、嘲諷之語，甚至多為殷切期盼的口吻，但三番兩皆像個孩童被諸葛亮戲耍的周瑜，此刻，書中的字字句句似乎皆幻化成一根根的針，刺進他好強好勝的內心。覽畢，喚左右取紙筆訣別吳侯後，周瑜便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sup>155</sup>連叫數聲而亡，自此一代將星殞落，年僅三十六歲。

綜觀《三國演義》中的周瑜，羅貫中將其塑造成一位既不能容忍別人比他好，也不能對於失敗處之泰然，而這樣的個性最終也導致了他的英年早逝。然而，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面對曹操時的周瑜，是如此的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到了諸葛亮面前，卻是次次慘敗、毫無勝算。如此的形象塑造，實缺乏合理性與一致性。因此，劉紅星便曾撰文提到：

小說創作不同於編撰史書，並不一定要嚴格按照史實來寫，作者有完全虛構想像的權利。他有寫出人物負面性格的權利，也有將歷史人物徹底「易容」的權利，即使是將周瑜寫成丑角也無所謂。但是對其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各方面的描寫要和諧統一，不能相互背離，發生抵觸。而小說中周瑜形象的描寫恰恰正是犯了這個毛病。<sup>156</sup>

小說中，作者處處以正筆敘寫諸葛亮，曲筆寫周瑜，實藉由犧牲周瑜在史傳中的英雄形象，來誇大渲染諸葛亮神話般的事蹟，雖說是羅貫中為求凸顯諸葛亮而刻意為之，但周瑜形象反覆之大，到了有違常理的地步，如此負面的周瑜形象甚至深植現今許多讀者的內心，由此可見小說影響力是多麼巨大！

<sup>15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39。

<sup>15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45。

<sup>15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

<sup>156</sup> 劉紅星：《〈三國演義〉中的雙面人——周瑜形象分析》，瀋陽，文學語言學研究，2007年，頁72-73。

#### 第四節 小結

在漢魏當代品鑑人物才性的作品當中，他們認為「才智」是英雄形成的兩大要素，因此，在《人物志》對於英雄的定義也呈現出了以下的看法：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sup>157</sup>

呈上所述，英雄的定義含括了深明事理的聰明與膽識過人的武略，而在《三國演義》中的周瑜仍然具有這兩項的人物特色。然而他的「才智」卻隨著羅貫中的寫作立場而被埋沒了，徐士年對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瑜)在《三國演義》裡雖然也被寫得英武、瀟灑，有許多優點，但這些好處掩不住《三國演義》裡突出描寫的他那種氣量狹小，不能容物，而且極其忌刻人才的缺點。……寫了周瑜的狹小，也就反襯了孔明的高瞻遠矚。<sup>158</sup>

因此，為了凸顯出諸葛亮的高瞻遠矚，羅貫中便將小說中的周瑜性格做了不小的更動，使得《三國演義》的周瑜形象同時兼具了歷史與民間故事的不同之處，而這樣的結果其實是和俗文學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對於這樣的演變，周遠成認為：

周瑜的歷史形象也被改造成文化藝術形象，逐漸完成了後世貶損周瑜形象的藝術塑造和流變成型……周瑜形象的貶損，一方面來自劉漢代表的正統心理與非正統心理衝突和文化沉積……。(另一方面)是隨市井文學的興起和市井文化形成的結果。<sup>159</sup>

為了強化諸葛亮的藝術形象，周瑜的正統歷史形象也就只好在不知不覺中被犧牲了。故筆者希冀透過本章節，從周瑜的外在形象、文韜武略，直到「既生瑜，何生亮」狹小氣度，一步步地替讀者梳理出小說中的脈絡線索，並期待讀者能在解構羅貫中書寫意象的同時，也能夠看出小說眾多的不合理之處，從而覺察出《三國演義》中周瑜「違礙常理」的負面形象！

<sup>157</sup> [魏]劉邵撰、[北魏]劉昫注：《人物志》，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頁7。

<sup>158</sup> 徐士年撰：〈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收錄於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29-130。

<sup>159</sup> 周遠成撰：〈三國周瑜論〉，船山學刊，2003年第二期，頁115-116。



## 第四章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人物形象分析

三國時期，是一個群英匯聚的年代，不管是統帥、謀臣、武將皆有著豐富多彩的獨特魅力，並廣為後人所津津樂道。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便是融合了許多三國人物故事的經典鉅作，因此，楊義在《中國古典小說十二講》便曾如此說道：

在古典文學領域，實在難以找出第二本書像《三國演義》那樣展示如此豐富多彩、勝境迭見的人才型態和戰爭型態，它可以被看作形象的武經和精彩的智慧書，以致在中華民族近古的才智建設中曾經發揮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sup>160</sup>

從楊氏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其認為《三國演義》是中國歷代以來少見的智慧之書，在羅貫中巧奪天工的妙筆之下，眾家謀士的人物形象便活靈活現的躍然紙上，而其中又以諸葛亮的人物形象刻劃得最為深刻，全書中幾乎利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在描寫他，幾乎將諸葛亮塑造成一位集儒家情懷、兵家謀略、法家律令、墨家工藝、綜橫家辯才無礙、陰陽家陰陽五行等九流十家特長於一身的「千古完人」。對於如此獨特的人物形象描寫手法，劉上生先生提出了底下的問題：

為何諸葛亮這位躬耕山野的南陽士子、「出師未捷」的悲劇人物獨獨成了光照千秋的智慧之星，贏得從市井小民到君王領袖各種人物的崇敬、傾倒和感嘆？為什麼如姜尚、管仲、樂毅、張良、陳平、徐懋功、劉伯溫等一大批才智之士的歷史故事和文學形象，相形之下，都黯然失色？！<sup>161</sup>

三國時期從不乏賢相謀臣，但為何只有諸葛亮如此的不同凡響、與眾不同，甚至被冠以「古今來賢相第一奇人」的美稱呢？因此，透過本章，筆者將意圖從智慧、忠心、軍事才能以及治國策略等各方面，分析《三國演義》中所欲呈現出的諸葛亮之人物形象。

### 第一節 以「隆中對」定調三分天下

拜羅貫中的妙筆所賜，使諸葛亮的智慧形象深植人心，而在眾星閃爍、人才輩出的三國時代當中，諸葛亮自然有其獨到之處，方可脫穎而出、流芳百世。因

<sup>160</sup>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局，2006年，頁26。

<sup>161</sup> 劉上生：〈論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統及其民族文化意蘊〉，收在《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149-168。

此，清人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便曾有此一說：

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神疑鬼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sup>162</sup>

呈上所述，毛宗崗認為三國有「三絕」，其中又以諸葛亮為「智絕」的代表，在劉備遇上諸葛亮以前，劉、關、張三人只能算得上是四處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草莽英雄，直到劉備的三顧茅廬，諸葛亮出山之際，方才漸漸使得劉備成為一方之霸。這其中的因素，諸葛亮當居首功，而諸葛亮名垂千古的「隆中對」，更是其「智絕」的最佳展現：

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可棄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sup>163</sup>

在群雄爭霸的世代裡，一個國家的成敗，往往要靠著成功的戰略指引方向，方能夠使國家在整體佈局上取得優勢。而在「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到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根據了當時多變的情勢，進而替劉備擬定一套極具前瞻性的戰略計畫，而在這套戰略裡面，諸葛亮將劉備「匡復漢室，申大義於天下」的夢想加以階段化，分別說明如下：

<sup>162</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1-2。

<sup>16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47。

## 一、分析局勢，勉勵劉備

一開始，諸葛亮便點出了隆中對的核心精義，他認為事並不完全取決於天，人謀的力量才是更重要的，更舉出「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的例子來勉勵戎馬半生而仍無立錐之地的劉備，事在人為，不要因一時的勢單力薄而灰心喪志。除此之外，他更替劉備精闢的分析出現今已擁百萬大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佔盡「天時」，不可與之爭鋒；經營江東已歷三世，擁有廣大民心及天險的孫權，佔盡「地利」，只可為援而不可圖。毫無根據地的劉備，現下只能利用「人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根據地，方可與上述兩者一爭天下。

## 二、如何建立根據地

針對仍然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劉備，諸葛亮對此提出了相當完整的戰略藍圖。他認為在當時天下局勢中，華北已由曹操牢牢掌握，不可圖之；江東歷經三代孫氏的建設，也早已國富民強，不能動搖。為今之計，在群雄割據的版圖上，僅剩下荊州、益州、交州與西北等地，而其中又以荊州與益州最適合做為劉備當前的根據地。故在諸葛亮的分析中，他替劉備規劃了兩個先行目標：

### (1) 奪取荊州：

荊州戰略地位四通八達，古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且當前的主人劉表身體早已日薄西山，其子劉琮更是優柔寡斷、圖謀安定之輩，並不足為懼。所以諸葛亮直接點出「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可棄乎？」要劉備見機行事，順勢拿下荊州，方可開啟建立基業的第一步。

### (2) 佔據益州：

建立基業的第二步，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則提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的益州，並舉出漢高祖劉邦的例子，建議劉備可以趁著劉璋闇弱、不知存恤賢士之時佔領益州，循著劉邦的先例，並提醒劉備自己有著「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的優勢，進而號召天下英雄、賢臣、謀士，在荊、益延攬群英、安內攘外，如此才有能與曹操、孫權一爭天下，形成三足鼎立的籌碼與實力。

## 三、安定後方，外交盟友

在建立根據地之後，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繼續提到「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的重要性，他認為西南地區雖說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但後方仍有許多各自為政的少數民族，必須加以安定、平反，方可於北伐之時無後顧之憂。除此之外，只擁有兩州之力，實難顛覆雄踞北方大半江山的曹魏勢力，因此「聯孫抗曹」、結交盟友自然也就成了諸葛亮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而這些後來也都在七擒孟獲、與劉備娶孫夫人中，一一實現了。

#### 四、靜待時機，後圖中原

在「隆中對」的最後，則提到「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在諸葛亮的戰略觀點當中，他早已料到隨著時間的推移，狼子野心的曹魏集團，即便是父親曹操不敢篡漢，兒子曹丕也將必篡之。而那時即為劉備號召天下反攻之時，以益州的主力軍隊，外加荊州軍的後援助攻，「復興漢室」的終極目標方能一舉成功。

綜觀而言，諸葛亮的「隆中對」提供了劉備匡復漢室的具體作法及策略，而後續局勢的發展基本上也如孔明所預想的發展，所以客觀來說，諸葛亮為蜀漢集團所制定的戰略方針，是相當實際且有效的。可惜的是，究竟人算不如天算，關羽的大意失荊州，使得「隆中對」中的戰略條件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劉備更為了復仇，而導致了託孤白帝城的憾事，也終究為蜀漢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但〈隆中對〉極富前瞻性的各項策略制定，其影響力仍然是相當巨大且無可抹滅的，因而，在唐代名相裴度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並序〉中，便有著對諸葛亮的讚賞：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相諸葛公是也。<sup>164</sup>

而從諸葛亮的驚世之作「隆中對」中，我們便可發現裴度所非虛言，孔明從各個角度替劉備分析局勢，設定戰略目標，在戰場上既能作為出謀劃策的軍師，在政治上也能作為替主公規劃政治藍圖的宰相。若不以最終成敗論〈隆中對〉的價值，光是從把一位沒沒無聞的流浪皇族，輔佐成君臨西南一方的君主，難道能不認為諸葛亮是位不世出的賢相嗎？

### 第二節 效忠蜀漢的堅定意志

中國自古以來，「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的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心裡，因此君王與臣子間的知遇之恩，往往也就成了文學中能夠發揮的良好題材，而在〈古詩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樓〉中，便有著一段令人動容的描述：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sup>165</sup>

<sup>164</sup> 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1。

<sup>165</sup> 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85年，頁54。

在古詩的描述當中，隨著久久迴盪不已的歌聲，以及其間反覆的嘆息聲，知音與歌者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似也就不言而喻，而這種知音間的共鳴與相遇，正恰巧體現在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關係之上，從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羅貫中便把兩人之間的曲折相遇寫得神采奕奕、扣人心弦：

蒼天如圓蓋，陸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  
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sup>166</sup>

劉、關、張三人初訪隆中，田野間便有農夫哼唱上述之歌，而此曲正是出自臥龍先生之手，從「蒼天如圓蓋，陸地似棋局」的字句中，我們便可看出孔明雖隱居山林，但卻志在安邦定國，對於天下局勢早已了然於心。對於求才若渴的劉備來說，這樣的當世大賢豈能放過？於是便有了二訪草廬之行：

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sup>167</sup>

時值隆冬，朔風凜凜，劉備為訪賢士不惜冒著風雪，前往拜會諸葛亮。卻只見一少年抱膝哼曲：「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sup>168</sup>但此少年卻非諸葛亮，而是其弟諸葛均。由此可見，羅貫中為凸顯諸葛亮的重要性，使盡手段調足讀者胃口，從歌詞當中，諸葛亮「待主而動、待時而出」的心情，實是表露無遺，也展現了他擇主那不容他人左右、絕不降格以求的堅定意志。怏怏而歸的劉玄德，為求賢才，來年早春，三度造訪臥龍崗：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

<sup>16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35。

<sup>16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39。

<sup>168</sup> 同註172。

「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sup>169</sup>

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劉備三顧茅廬的行動之下，即便是淡泊名利的諸葛亮，也終被「淚沾袍袖，衣襟盡濕」的真心所打動，而答應盡其所能輔佐劉皇叔匡復漢室，解救天下蒼生。至此，劉備終於得到他夢寐以求的人才，而諸葛亮自身的鴻圖大志也終有所展，而這樣的關係也早已超越了一般君臣之間的互動關係，故關四平先生便曾言道：

《三國志演義》中劉備集團的君臣關係最為優化，居於全書的最高層次，是作者理想的君臣關係範型。其表現型態為：君以文士為師，以武將為弟，文士以諸葛亮、龐統為代表，劉備對他們可是言聽計從，尊寵無比，極盡敬師之道。三顧茅廬，劉備拜師之道可謂無以復加。歸新野後，劉備對諸葛亮更是「以師禮待之」。關羽、張飛認為劉備「敬之太過」，劉備則曰：「吾得孔明，猶魚得水也。」於是「魚水之誼」就成了君臣關係的理想化型態。<sup>170</sup>

正因為獲得君主如此無上的信任與器重，使得諸葛亮自是殫精竭慮、夙夜匪懈，不斷為了擴張劉備的事業版圖而努力，甚至當劉備集團危如累卵、扶老攜幼引數十萬人民棄樊城而幾近走投無路之時，諸葛亮依舊不離不棄的待在劉備身邊，連自己的哥哥來當說客，遊說他加入東吳集團，他都無動於衷：

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不識兄意以為何如？」<sup>171</sup>

從上述例子可知，諸葛亮感念劉備三顧茅廬的一片赤誠，也願以自己的一生忠心加以回報，而不會因為其他集團的力量或勢力誘惑而有所動搖，而這也正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極佳寫照。除此之外，當蜀漢軍團在彝陵之戰慘敗，導致劉備在白帝城憾恨而終之時，臨死前對孔明的託孤更是被傳為千古美談：

<sup>16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48。

<sup>170</sup>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中編》，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頁68。

<sup>17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6。

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sup>172</sup>

這段堪稱為君臣互信的最佳代表，雖說劉備違反了先前所制定〈隆中對〉的策略方針，為了報仇而伐吳吞敗，導致蜀漢的國勢急轉直下，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撒手人寰。即便如此，諸葛亮依舊信守著自己與先帝的約定，試圖東交孫權、南征孟獲、北伐曹操來壯大蜀漢，並將自己的忠誠轉移至後主劉禪的身上，對其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盼後主能「親賢臣，遠小人」，從而完成先帝之遺願。而在諸葛亮北伐前的〈出師表〉，其對蜀漢帝國的忠誠更是再一次的清楚呈現：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sup>173</sup>

這一道令人讀之動容的〈出師表〉，充分顯現出諸葛亮內心最真實的想法，臨危受命於國家存亡之秋，換作是一般人，可能早就見大勢已去，而從此歸隱山林或轉換陣營。可是諸葛亮卻用其後半生的戎馬生涯，夙興夜寐的想要報答劉備的三顧之恩以及託孤之信任，深怕自己辜負了劉備的識人之明。而這樣的使命感，也使得諸葛亮事必躬親，從不放心別人代勞，因此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三回當中，就有著底下的描述：

主簿楊顛諫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為不必。夫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

<sup>174</sup>

楊顛的一席話其實諸葛亮也都明白，但由於「恐付託不效」的責任感，使得諸葛亮只好大小政事、軍務一手包辦，唯恐自己無法實現劉備光復漢室的理想。然而，

<sup>17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58。

<sup>17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31。

<sup>17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71。

即便諸葛亮擁有再強大的意志力與執行力，凡人的身體卻終究也有支撐不了的一天，致使憂勞成疾，而在五丈原迎來了自己生命的終點：

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乃喚楊儀吩咐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諒死節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章而行。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sup>175</sup>

即便走到了油盡燈枯的最後一刻，諸葛亮仍舊念念不忘北伐未竟之業，並仍對後主充滿無限的期望與忠愛之情，千年後讀之，仍不免令人為之鼻酸。綜觀諸葛丞相的一生，他不鳴則已，一鳴則驚天動地；不是他不願出山安邦定國，而是在等待最合適、也最能信任的君主出現。遇到劉備，便有如千里馬遇到伯樂般的欣喜，諸葛亮也用奉獻出他的一生作為來加以報答，翻開史冊，古今又有幾人能做到這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實際行動？雖說他的命運最終以悲劇收場，但卻也更能顯現出其悲壯與偉大。無怪乎明代蔣大器便曾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說道：「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sup>176</sup>面對這樣的評論，諸葛亮實是當之無愧啊！

### 第三節 神機妙算的非凡軍事才能

在古往今來的章回小說中，《三國演義》可說是相當膾炙人口、受人喜愛的一本奇書，那為何此書會一路風靡至今呢？筆者認為有很大的原因，在於羅貫中對於謀略出神入化的描述，全書基本上計謀迭出，謀士們各個無所不用其極，其城府之深、思慮之廣，讀來往往令人拍案叫絕、愛不釋手。而眾多的謀士當中，又以一人為全書的主角，是個震古鑠今、空前絕後的全才，他就是此章節的主人翁—諸葛亮。

在羅貫中的描述之下，諸葛孔明幾近為無所不能、十全十美的千古完人，而回溯一下諸葛亮這位人物在歷史上的人物形象，也多半是褒多於貶，讚美之詞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唐元稹元微之便曾有詩讚曰：

<sup>17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78。

<sup>176</sup> 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32。



撥亂扶危主，殷勤受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存盛德，應嘆古今無。<sup>177</sup>

從上述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出元稹給予諸葛亮極高的評價，而到了羅貫中手中，他更是將諸葛丞相塑造為《三國演義》中最为傑出的軍師，而關於此點，董每勤先生便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歷來，有些人認為羅貫中寫諸葛亮有些過份，我以為並非「溢美」，因為他大體是根據《三國志》加以放大勾勒，這放大不只是藝術手腕，另一原因是陳壽的立場不同，對諸葛亮間有微詞，但不敢完全抹煞事實，所以〈諸葛亮傳〉還部會被打很大的折扣；羅貫中以自己的立場觀點，依據總的傾向，必須加以彌補被陳壽打了的折扣，使他還原。……羅氏偏一反陳壽所評，不僅寫他的長於治戎，而且饒有奇謀……。<sup>178</sup>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諸葛亮人物形象的創作上，羅貫中不僅一反陳壽所評，更把諸葛亮形塑為一位「長於治戎，而且饒有奇謀」的軍師。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究竟如何呈現諸葛亮「饒有奇謀」的非凡軍事才能呢？本小節將透過底下五個部分，逐步進行分析探究：

### 一、草船借箭周瑜嘆

諸葛亮「草船借箭」的事蹟，幾乎是家喻戶曉、傳頌巷弄的故事，出自《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當中。當時的曹操，兵臨赤壁，直逼江東陣營而來，使得東吳集團內部因「主戰」、「主降」而紛爭不下，直到周瑜從鄱陽（今江西波陽）返回議政時，方才使孫權有了「主戰」的念頭。然而，孫權「戰」與「降」的意念卻依然搖擺不定，並被當時身在東吳共謀籌畫的諸葛亮給察覺了：

孔明日：「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日：「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sup>179</sup>

此時的周瑜，被諸葛亮的才識與遠見所震懾，但卻也明白此人若是成為日後的對手，必定令人棘手不堪，而漸漸暗起殺機。到了後來，周瑜利用反間計殺蔡瑁、張允，依舊被諸葛亮所識破，周瑜大驚之餘決意使計除掉諸葛亮，而這才有了

<sup>177</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1543。

<sup>178</sup> 董每勤：《三國演義試論—增改本》，頁177-178。

<sup>17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4。

下面草船借箭的精采橋段：

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吾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辦完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辦完？」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sup>180</sup>

聰明如周瑜，要殺諸葛亮何須親自動手，因此他以對抗曹軍為名，行謀害孔明之實。表面上，他依然客客氣氣的與諸葛亮談論軍事戰略，暗地裡卻將材料及工匠人等一再拖延，如此一來若遵循正常的造箭程序，諸葛亮必定無法交差。更何況諸葛亮自己又將陷阱越挖越深，十日改成三日，還願立軍令狀以示負責，正中周瑜下懷，樂得周瑜連忙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以為證據。

然而，諸葛亮也並非省油的燈，對於周瑜想要借刀殺人一事，他早已心知肚明，並想了相關的應對之策。因此，當魯肅來探其虛實時，諸葛亮便假惺惺地開始演戲來博取魯肅的同情：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sup>181</sup>

只見諸葛亮的戲碼相當成功，立刻獲得魯肅的允諾幫忙，在魯肅的協助之下，諸葛亮不費吹灰之力的便完成了草船借箭的前置作業。然而，一位好的軍事家，並定會將「天時、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條件加以綜合考量，方能出奇制勝、打贏戰爭，因此只靠魯肅幫忙是不夠的，諸葛亮還同時算計了人心與天象，下面先來看一段草船借箭的精采描述：

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掉轉，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

<sup>18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3-534。

<sup>18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4。

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sup>182</sup>

原來諸葛亮早已料定在大霧之中，多疑的曹操必定不肯輕舉妄動，定會以亂箭應付未知的敵人。而紮滿草人的船，自然也就輕易獲得了十萬支箭，看得魯肅是目瞪口呆，以為神人，佩服至極，然而，魯肅上有一事不明而請教諸葛亮：

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我命繫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sup>183</sup>

除了知道曹操的個性之外，諸葛亮更靈活運用了大霧的氣象條件來幫助自己，正如《孫子兵法·地形篇》所提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sup>184</sup>要贏得戰爭的勝利，除了自助人助，亦要靠天助，而通曉天文地理的諸葛亮早知三日後會起大霧，方敢立下軍令狀，事後聽聞事情經過的周瑜，除了無奈，也只能慨然而嘆：「吾不如也！」

雖說諸葛亮草船借箭一事，並未見於《三國志》與《資治通鑑》等正史記載當中，應是羅貫中根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的孫權借箭加以改編而成，但在羅貫中的藝術加工之下，諸葛丞相「草船借箭」的軍事形象，早已深植廣大讀者的心中，進而成為代表諸葛亮的典型故事之一。

## 二、布八陣圖退陸遜

在曹操兵敗赤壁之後，諸葛亮的〈隆中對〉所提出三分天下的局勢漸漸成型，在諸葛孔明的輔佐之下，劉備從無到有一步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蜀漢帝國，不得不讓人讚嘆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以及先知卓見，於此，唐朝大詩人杜甫寫了一首著名的五言絕句：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sup>185</sup>

在一首二十字的五言絕句當中，杜甫言簡意賅的描述了一代軍師、被後人視為是「智慧象徵」的諸葛亮之偉大，將一位整天東奔西竄的落魄皇族，輔佐成為可以

<sup>18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6。

<sup>18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6-537。

<sup>184</sup> [東周]孫武著、[東漢]曹操註、[清]孫星衍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頁208-209。

<sup>185</sup> 彭定求等：《全唐詩（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566。

「北抗曹操，東聯孫吳」的大國之君。然而，劉備為了替關羽報仇，不聽諸葛亮的勸阻，執意進軍伐吳而導致夷陵之戰大敗，兵荒馬亂之際，終究還是諸葛亮跳出來替劉備解圍：

遜見日將西沈，殺氣越加，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令著土人問之名。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sup>186</sup>

在《三國演義》的描述當中，吳軍在夷陵之戰中大獲全勝，並試圖追擊蜀軍的殘兵敗將，然而卻受到了殺氣沖天的亂石堆加以阻擋，年輕氣盛的陸遜自是不放在眼裡：

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sup>187</sup>

入石陣觀察的陸遜，卻彷彿走進了一座巨大的迷宮，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欲尋出路也始終一無所獲，石陣中更是殺氣騰騰，雖不見一兵一卒，卻有令人有種毀天滅地之感。正當陸遜驚疑惶恐之際，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卻出現了：

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臨去之時，曾分咐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sup>188</sup>

原來困住陸遜的是諸葛亮名動天下的「八陣圖」陣法，其可分為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等八門，並隨著時間的不同而變幻無窮，若非老者黃承彥的引導，

<sup>18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50。

<sup>18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50。

<sup>18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50。

陸遜恐早已命喪於此，八陣圖的威力之大實在非同小可。連諸葛孔明自己也曾說：「八陣既成，自今行師，應不復敗矣。」<sup>189</sup>可見，「八陣圖」是為諸葛亮自身的得意之作，經過其非凡的創意巧思，所設計出獨一無二的行軍、作戰或宿營等相關陣形，這樣的布陣手法不僅相當實用，更對後世影響深遠。無怪乎陸遜回營後，也只能無奈嘆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sup>190</sup>

雖說在史冊的紀載中，諸葛亮並未參與夷陵一役，因此可以看出是羅貫中試圖以八陣圖困住陸遜一事，來提升諸葛亮神機妙算的人物形象，使諸葛亮在小說中更加的神通廣大。然而，八陣圖的石頭陣確實存在，是諸葛亮用來操練蜀軍的軍事基地，而其目的是用來提升軍隊整體的進攻及防禦的能力，而這樣的陣法也讓後來北魏時代的習雍上書北魏文帝，建議採八陣之法平流寇，唐軍事家李靖更從八陣圖演變出六花陣法破敵。從上述之例，足見「八陣圖」的發明之偉大，更再次證明了諸葛亮那令人驚羨的非凡軍事才能。

### 三、七擒孟獲破蠻兵

早在諸葛亮為劉備所提出的〈隆中對〉當中，便曾提到「西和諸戎，南撫彝越」的重要性，而這裡的彝越指的便是如今雲南、貴州及四川南部一帶的少數民族，由於此區地處偏遠，有些尚且還停留在原始、奴隸社會的階段，因此較難受到蜀漢朝廷的掌控，各部落間的酋長們更是各懷鬼胎，心存異心。果不其然，蜀漢章武三年，皇帝劉備於夷陵之戰中敗北，病逝永安。同年夏天，益州統帥雍闓眼見機不可失，決定反叛，而越嶲酋長高定隨即響應加入。為了能使當地少數民族同仇敵愾，雍闓找來當地威望極高的孟獲遊說夷人，至此，也促使了諸葛亮七擒孟獲的開端。

而「七擒孟獲」一詞，我們最早可以在《漢晉春秋》以及《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中看到，裴松之的《三國志註》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亦有所記載，可見此為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然而，在小說《三國演義》中，從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至第九十回「驅巨獸六破蠻兵，燒藤甲七擒孟獲」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在羅貫中的描述下，出現了許多史實中從未登場的角色，例如鄂煥、祝融夫人、孟優、木鹿大王等，更出現許多虛構的故事情節，如朵思大王用四口毒泉阻撓蜀軍之去路，以及木鹿大王驅使猛獸軍團攻擊蜀軍，但皆被諸葛亮用智慧所化解。如此誇大渲染之筆法，皆是作者為了凸顯與強化諸葛亮有著優於常人的本領，進而塑造其神鬼莫測、變幻無窮的軍師形象。對此，毛宗崗便曾評曰：

每讀《西遊記》，見孫行者之降妖，讀《水滸傳》，建公孫勝之鬥法，以為奇幻！不謂《三國志》中已備西遊、水滸之長矣！況彼以捏造之事，雖層

<sup>189</sup> 陳文德：《諸葛亮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年，頁791。

<sup>19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51。

見疊出，總屬虛談。不若此為真實之事，即偶有一二，已足括彼全部也。

191

從上述段落，我們不難看出，羅貫中為了描述諸葛亮用兵如神的特質，特意用了類似《西遊記》、《水滸傳》的神魔敘事手法，來烘托出諸葛亮的與眾不同。而在七擒孟獲的段落當中，作者也運用了一些這樣的寫法，來描述諸葛亮非凡的軍事才能。底下，我們便來看看《三國演義》如何運用四個章回的篇幅來陳述諸葛亮征討南蠻，七擒孟獲的情節：

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腳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sup>192</sup>

從上述段落，我們可以看到孟獲初登場其實是相當華麗的，羅貫中將其人物形象書寫的氣宇軒昂、志得意滿，絲毫不畏諸葛亮之威名。然而，不久後他便隨即吃到苦頭：

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引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sup>193</sup>

原來，諸葛亮令王平、關索佯敗，誘孟獲乘勝追擊，然後再以左路張嶷、右路張翼分別夾擊，使得蠻兵大敗，慌忙撤退。然而，神機妙算的諸葛亮竟連孟獲的退路都已截斷，孟獲就這樣被魏延五花大綁的押到諸葛亮面前：

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sup>194</sup>

<sup>191</sup> [明]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評：《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出版，1994年，頁1309。

<sup>19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86。

<sup>19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86-987。

因此，在八十七回中，趾高氣昂的孟獲，並不認為自己輸給了諸葛亮，只是因為大意而遭到偷襲。諸葛亮也深知，不讓孟獲心服口服投降，其後必定再生反心，因而釋放了孟獲，使其回去厲兵秣馬，再決雌雄。而在第八十八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孟獲試圖利用地形上的優勢擊退蜀軍：

卻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sup>195</sup>

不僅如此，瀘水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此河流日間會有毒氣蒸發，不可渡之，只有夜間方為可行。此時，守株待兔的孟獲自以為高枕無憂，認為此戰必勝：

謂眾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sup>196</sup>

然而，孟獲千算萬算也沒想到，蜀軍早已獲得土人的相助暗渡瀘水，而蠻軍大將董荼那更是念及諸葛孔明的活命之恩，再次替諸葛亮生擒孟獲。但，自視甚高的孟獲依然不肯就範，於是便有了第八十八回後半部「識詐降三擒孟獲」的戲碼：

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殷勤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卻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沖天，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面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才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sup>197</sup>

由此段落，我們可以看到孟獲想要藉由詐降，試圖與孟優以裡應外合的方式破敵，

<sup>19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87。

<sup>19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91。

<sup>19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93。

<sup>19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96-997。

卻依然被諸葛亮輕鬆識破，並且毫不費吹灰之力的再次將其生擒。此等料敵於先，實令人讚嘆諸葛亮的足智多謀。然而，先前所提到羅貫中所運用近似於《西遊記》、《水滸傳》的敘事之法，並未見於前三次，反而是在後三次生擒孟獲的故事中，不斷交替出現：

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sup>198</sup>

從「狂風大起」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似乎可以預測氣候，並以氣候掩飾自己所設的陷阱，自是再次輕輕鬆鬆地活捉孟獲。而這也只是顯示他鬼神般能力的第一步。欲入禿龍洞擒孟獲的過程當中，諸葛亮更是深入不毛之地，面對前所未見的四口毒泉，並獲得山神的相助：

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sup>199</sup>

閱讀至此，會彷彿有種置身於《西遊記》場景的錯覺，面對冥頑不化的孟獲，就連山神也前往相助於蜀軍，甚至可以喝開石壁而入。此等想像中的畫面，雖不符史實，卻再次增添孔明的不凡，其後，更有諸葛亮焚香求水的段落：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sup>200</sup>

面對毒泉、酷熱等各種致命的險峻環境，諸葛亮卻依然能透過山神相助，焚香祈福的方式化險為夷。此種敘事手法，不難看出羅貫中意圖利用神魔對抗的方式烘

<sup>19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02。

<sup>19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06-1007。

<sup>20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08。



托諸葛亮的用兵如神，把諸葛孔明的人物形象昇華到另外一種境界。除了五擒孟獲之外，在第九十回六破蠻兵的場景當中，同樣有類似的敘事手法：

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蒂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沖倒無數。<sup>201</sup>

這裡的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一副仙家道骨的風采，見木鹿大王的怪風猛獸，竟也毫不畏懼，輕輕鬆鬆將羽扇一搖，其風吹回，更將蜀陣中的假獸直指敵營，沖倒蠻兵無數。讀到此處，不僅讓人有種在閱讀「中國版的哈利波特」之感，雖說皆是虛構畫面，卻相當引人入勝。而在最後一次與孟獲的對陣中，諸葛亮則是利用地形的優勢，引孟獲的三萬外援藤甲兵入盤蛇谷，將他們用地雷炸得粉身碎骨，也替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一事劃下了完美的句點。

綜合來說，在七擒孟獲的整體過程中，雖說出現了許多虛構的杜撰情節，但不得不讓人佩服羅貫中驚人的組織能力，他以「虛實穿插」的方式縱貫故事，卻絲毫沒有過多的違和感，而諸葛亮也在羅貫中的組織之下，被包裝成具有神人般能力的角色，因此，在沈伯俊的《羅貫中與三國演義》中，便曾提到了以下的一段論點：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不僅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過大量的虛構情節，著力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他塑造為用兵如神的謀略大師，成為中華民族無比智慧的化身。<sup>202</sup>

而從七擒孟獲的情節當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羅貫中運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對比、烘托，來強化出諸葛亮神機妙算的軍師形象，並利用一種化繁為實、層層遞進的方式，一步步地建立諸葛丞相人物的鮮明形象。雖然小說中有些地方過於渲染、誇大，情節當中甚至揉雜了一些神秘詭異的色彩，但卻不能掩蓋諸葛丞相七擒孟獲、平定南蠻的事實，而「七擒七縱南蠻王」的事實也再一次讓世人驚艷於諸葛亮那匠心獨具的軍事頭腦！

#### 四、空城計欺司馬懿

一位嫻熟於戰略的軍事家，必定是精通於兵法以及能靈活運用各種心戰之人，

<sup>20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17。

<sup>202</sup> 沈伯俊著：《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頁63。

而戰場上的勝負，很多時候比的並不是軍隊的多寡，抑或是武器的精良與否，而是取決於謀略與猜忌。正所謂兵不厭詐，《孫子兵法·計篇》便曾言道：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乃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203

因此，若是能不費一兵一卒，以詭詐、迷惑對手的方式，使敵將作出錯誤的判斷，往往也能達到出其不意的戰略效果。諸葛亮舉世聞名的「空城計」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初次北伐曹魏，卻因馬謖丟失街亭（今甘肅莊浪東南），而使得整體戰事的情況急轉直下，高明如諸葛亮，此時也只能無奈的撤軍返回漢中（今陝西南鄭）。然而，老狐狸的司馬懿自然不肯放過這棒打落水狗的好機會，馬上率著十五萬大軍蜂擁而至。換作他人，早就開城投降了，但只見諸葛亮不疾不徐地身披鶴氅、頭戴綸巾，坐在城樓上焚香彈琴，這下連老謀深算的司馬懿都被他給搞糊塗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底下就來看看原文裡的精彩段落：

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sup>204</sup>

深諳算計之道的司馬懿，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而在第九十五回的一開始，便曾有一段司馬懿與魏名將張郃的對話是這樣描述的：

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sup>205</sup>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司馬懿深知諸葛亮的心理狀態，後來諸葛亮也確實未採納魏延取道子午谷的冒險計畫。然而，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sup>203</sup>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24。

<sup>20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1077-1078。

<sup>20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1071。

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sup>206</sup>身為司馬懿的老對手，諸葛亮自然也知道對方必定不相信他會毫無防備的去面對十五萬大軍，而如此大膽冒險的賭博行為，便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基礎上，如此神鬼莫測的計策，又有誰能想得到呢？無怪乎司馬懿在得知真相後，也只能仰天長歎曰：「吾不如孔明也！」<sup>207</sup>

然而，上述舉世聞名的「空城計」並未記載於史書當中，可以想見應該又是羅貫中一次極其生動又成功的虛構故事。雖不符合史實，但如此情節上的安排卻再次凸顯了諸葛亮神機妙算的軍師形象，而這樣的戰略表現，竟也與《孫子兵法》中所說的不謀而合：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sup>208</sup>

「伐謀」為優、其次「伐交」、再者「伐兵」、「攻城」則是不得已而為之，而諸葛亮以一人撫琴之姿，退司馬懿十五萬大軍之勢，可以看出「空城計」將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念運用得淋漓盡致。雖說後經裴松之考證，並無此事<sup>209</sup>，但實無損於《三國演義》此章節的精采程度，也難怪「空城計」的故事會如此歷久不衰、膾炙人口了！

## 五、木牛流馬運糧草

一位傑出的軍事家，除了要熟稔於兵法布陣、調兵遣將等各種戰略知識外，更是要針對自己軍隊所需，創造出符合需求的各種工具，方能因地制宜、克敵制勝。而先前我們已經看到長於思考、創造的諸葛亮利用了八陣圖解蜀軍之危難，就連對諸葛亮軍事方面著墨不多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中都曾經提到：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sup>210</sup>

可見諸葛亮靈活多變的妙思奇想，就連筆鋒較偏曹魏方面的陳壽都不得不加以讚賞幾分，而如此偉大的發明家除了改造連弩、發明八陣圖之外，在他生涯的後期尚有一種得意之作「木牛流馬」，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二回〈司馬懿占北原

<sup>206</sup>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02。

<sup>20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1080。

<sup>208</sup>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95-96。

<sup>209</sup> 裴松之進行考證後，表示諸葛亮屯兵陽平時，司馬懿時任荊州都督，兩人沒有機會交手，因此沒有「空城計」一事。見〔西晉〕陳壽著、楊家駱主編：《三國志》，頁 921。

<sup>210</sup>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市，世界書局，1985 年，頁 927。

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中有著詳細的描述：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並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食水，可以搬運晝夜不絕。」眾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尚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圓，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眾皆大喜。<sup>211</sup>

對於遠伐曹魏的蜀軍來說，糧草的搬運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對於占地較小、人口數較少的蜀國來說，如果還要分配大量人力在搬運糧草之上，必定會使得戰場的可用之兵大大的減少，蜀軍的戰鬥能力也會大大減弱。高瞻遠矚的諸葛亮自然也想到了這個問題，因而發明了「皆不食水，可以搬運晝夜不絕」的「木牛流馬」來解決蜀軍糧草搬運的問題。在機械動力學發達的今日看來，或許只是個不起眼的小東西，但這樣的東西竟是遠在三國時期的軍師所製造出來，那可就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大發明了！

除此之外，諸葛亮更是故意讓司馬懿搶去幾隻以做仿效，但正如毛宗崗所批：「前但說得造法，不曾說得用法；前但說得行法，不曾說得止法。」<sup>212</sup>諸葛亮便利用魏軍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一知半解，再次用自己所熟知的發明狠狠的戲弄了司馬懿一番：

數日後，人報魏軍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兵，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軍中，將運糧之人，盡皆殺散；卻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來，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抬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也。」<sup>213</sup>

原來諸葛亮在木牛流馬內還藏有著小機關，一頭霧水的魏兵看見原先好好的木牛流馬竟「牽拽不動，扛抬不去」，自是心生疑竇，再看到扮作鬼怪神兵的蜀軍竟能對此等怪物操縱自如，必然是心懷恐懼而不敢追趕，而害得魏軍平白無故的蒙受了近千車糧草的巨大損失。看到此處，不得不讓人再度讚嘆諸葛亮那神機妙算的軍事智慧，而關於《三國演義》這一方面的描述，毛宗崗則曾評曰：

<sup>21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58。

<sup>212</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1515-1516。

<sup>21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60。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為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為入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為真實，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sup>214</sup>

從上述的段落，我們可以看到毛氏認為雖然孔明在《三國演義》中有許多超乎常人的智能展現，然而我們仍應當將其視為可供後世效法的聖賢。就如同筆者先前所提到的草船借箭、八陣圖、七擒孟獲、空城計等精彩故事，雖說有些是經由羅貫中妙筆所杜撰出來的藝術表現，卻依舊不能抹煞諸葛孔明在軍事運籌帷幄上的非凡成就，也無怪乎在諸葛亮逝世一千八百多年後的今天，他依舊活在後人們的心中，並成為後人世世代代效法的偶像典範！

#### 第四節 以法治國、賞罰分明的統御之術

中華文化數千年以來，讀書人立身處世無不遵循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精神，進而以貢獻自己畢生之所學，實現淑世之願。而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許多有智慧、膽識、謀略、德行的懷才賢士，各憑本事輔佐主公拓展疆土。因此，在葉松林〈謀士與皇權——《三國演義》中謀士形象評析〉一文中便曾言：

小說中的謀士，最鮮明的特質就是：一些士人出身之輩，張揚忠君報國，投身並依附於某一政治派別或軍事武裝割據集團，憑藉自己的才幹、謀略和忠誠，出謀劃策；雖赴湯蹈火而不辭，肝腦塗地以為榮，輔其所奉之主，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乃至助其實現皇權夢。因這類人物，是以謀略為資本的智囊菁英，故而被聘作謀士，甚而至於拜為軍師。<sup>215</sup>

而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中，最為出類拔萃的菁英謀士自然又非諸葛亮莫屬了。而先前我們已經先後提到了諸葛亮身為謀士應具備的智慧、忠心及軍事才能，而下面筆者將藉由三點，來探究這位既能安內又能攘外的傳奇賢相，是如何以其獨具匠心的統御之術，將蜀國一步步帶領至三強鼎立之局面的精采過程：

<sup>214</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1537。

<sup>215</sup> 葉松林：〈謀士與皇權——《三國演義》中謀士形象評析〉，黑龍江，黑龍江社會科學，1998年，頁72。

## 一、以法治國的堅定決心

法律，乃是建立一個國家的基本條件，國家若是有了一系列完善的組織、規章，來規範其人民應有之行為，那麼其人民便不會像無頭蒼蠅般的無所適從、亂象叢生。因此，在先秦時期以法治國而聞名的韓非子，便曾提到：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sup>216</sup>

在韓非子的說法中，他強調法律本不應分親疏貴賤，在法律之前應人人平等、一視同仁，一切應依法律為準繩，進而無所偏頗、公正無私，方可使國家興盛、人民安樂。身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同樣深知這個道理，因此，在《三國演義》第六十五回中，我們可以看到初入蜀地的劉備，委請諸葛亮訂定治國規章，諸葛亮便展現了其欲以法治國的堅定態度：

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sup>217</sup>

從上述可知，法正覺得諸葛亮所制定的刑責過於苛刻，希望從寬減刑，以慰民意。然而，諸葛亮卻認為就如同國不可一日無君，國也不可以一日無法，而且如果威刑不肅，反而會導致種種弊端的發生，而最終走向劉焉、劉璋父子一樣的下場。而在諸葛亮的堅持之下，蜀國的法政系統一步步的趨於完善，老百姓也開始過上不同以往、安居樂業的日子，「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sup>218</sup>，法治的重要程度自也不言而喻。然而，好景不常，諸葛亮誓死效忠的劉備病逝白帝城，此時的蜀漢面臨內憂外患，局面甚是岌岌可危，作為蜀漢的丞相，諸葛亮依舊秉持著奉公守法的態度，盡心盡力的想要完成先帝「復興漢室」之遺願。面對年幼無知的後主劉禪，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再次重申了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之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sup>216</sup>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0年，頁295。

<sup>21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749。

<sup>21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749。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sup>219</sup>

從上述「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等文句中，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希冀後主劉禪能夠明辨是非，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如此才可以使人民有依循的準則，也才能夠使臣民能夠心服口服的效忠於蜀漢，而這與先前所提到韓非子的「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用法寬嚴程度的拿捏，卻是一門很大的學問，需與當下情境、人物互相配合，方可達到良好的成效。閩南語有句諺語說：「嚴官府出厚賊」，若只是一味地利用嚴刑峻法來統治國家，那最終也必定會招致反效果。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雖強調以法治國，但其用法寬嚴卻不拘格套，他能夠根據條件的不同，審慎權變的進行不同調整，在《三國演義》第六十五回中就有一個明顯的例子：

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日；「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日：「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sup>220</sup>

在法正任職蜀郡太守期間，曾有過一段「睚眦之怨，無不報復」的荒唐歲月，就如同竹林七賢阮籍、嵇康等人一般，有才之人往往會有放蕩不羈、不受約束的個性。而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並未針對此事加以責罰法正，反而替法正辯護，褒揚法正平定益州之功，這種利用「褒代替貶」的高明方式，不但展現了諸葛亮在法制上通權達變的手段，更使得法正內心反而有所過意不去，而收斂了許多。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以法治國」並不是呆板的依循法條而已；相對的，以恩威並施、罰賞並濟的方式，更能夠使人心悅誠服，也才能使國家真正步上安定、和諧的軌道。

## 二、以信為本的治軍態度

信任，是一位領導者是否能統領軍隊的關鍵要素，一位治軍嚴謹、言出必行的將軍，自然能夠得到下屬的信任與效忠；相反的，若是在上位者出爾反爾，做事毫無規準可言，那想必其所領導的軍隊必然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正如同富蘭克林曾經說過：「失足，你可能馬上復立，失信，你也許永難挽回」，信任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見一般，而中國古代的聖賢—孔子，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語：

<sup>21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30。

<sup>22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749。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sup>221</sup>

在孔子的觀點裡，他認為「信用」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人如果沒有了「信用」，就如同馬車缺少「輓」與「軌」一般，便無法在社會中順利的與人相處。反之，人若有信，即便是在艱難的環境，也都能夠順利克服。因此，孔子總是不厭其煩、再三叮囑弟子誠信的重要性：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sup>222</sup>

由上述可知，孔子把「言忠信，行篤敬」作為修身的必要條件，認為這是成就一個理想人格的首要因素。而從子貢問政的例子，更是可以看出孔子有多麼重視信用問題：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sup>223</sup>

從子貢「食」、「兵」、「信」的三個條件中，孔子認為誠信乃是重中之重，自古以來無信而不立，由此可見一位領導者的誠信，自是比兵力、糧食重要許多。對於嚴以律己的諸葛亮來說，「誠信」自然是他自己最重視的原則之一，同時也是蜀軍將士們皆能對他心服口服、誓死追隨的原因所在，從《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一回中我們便可略窺一二：

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現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眾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取劍閣，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為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依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眾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眾軍皆欲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

<sup>221</sup>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98年，頁59。

<sup>222</sup>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98年，頁162。

<sup>223</sup>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98年，頁134-135。



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眾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sup>224</sup>

先前長史楊儀曾經跟諸葛亮提到，大軍若是征戰久駐於前線，必定是兵乏馬困，戰鬥力自然也會大打折扣，因此，採取「時限制」的方式輪番換兵，士兵們必然更有與敵軍搏鬥的意願與體力。然而，在上述緊急的時刻中，我們可以看到孔明卻認為：「用兵命將，以信為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而不肯為了一己之難，而背信忘義、失信於兵，寧願獨自領著四萬軍馬去抵抗雍、涼的二十萬大軍。此舉反倒激起了蜀軍將士們的士氣，兵士們知道丞相是個重承諾、守信用之人，而他們也決定以行動來回報諸葛亮的恩情，願意一同留下大殺魏兵、共抗外侮。從此例之中，我們再次看見了「以信為本」的重要性，而諸葛亮也正是憑藉著這樣的治軍態度，進而樹立他在軍中的威望與地位。

### 三、賞罰分明的公正不阿

「信賞必罰」是從古至今治軍之道的必要法則，有功則賞，則定然是將士用命、團結一氣；有過則罰，則團體紀律必然嚴謹，不敢有所逾越。而領導者的行事作風也跟部屬的表現有著直接且密切的關係，因此，諸葛亮就曾經說過：

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sup>225</sup>

先前已經說過「誠信」在軍中的重要性，那要如何樹立在軍中的威信呢？在上述的段落中，諸葛亮則提到了嚴格執行獎懲便是樹立威信的不二法門，賞罰有所本，部屬有所依循，這樣的軍隊才不會如同一盤散沙，將士們也才願意勇往直前、奮勇殺敵。由此可見，「賞罰分明」是領導統御裡面相當重要的一環，《韓非子·定法》中也曾出現過類似的例子：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

<sup>226</sup>

對於主張法治為上的韓非子而言，賞罰的適當與否，對於民心的趨向影響相當巨大，遵從法令者就該賞，違背者則罰，不可有所偏頗、徇私，而這恰恰與執法嚴明的諸葛亮有著巧妙的相似之處，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一回中，李嚴因延宕軍糧運送時程，竟假傳東吳來犯之消息，欲藉由諸葛亮班師回朝來掩蓋自己延誤

<sup>22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43-1144。

<sup>225</sup> 羅吉甫：《諸葛亮領導兵法將苑菁華錄》，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頁41。

<sup>226</sup>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0年，頁89。

之罪，豈料李嚴此計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都護李嚴妄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因此班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為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從之。費禕即具表啟奏天子。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出班奏曰：「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望乞恩寬恕。」後主從之，即謫為庶人，徙於梓潼郡閒往。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為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sup>227</sup>

如此欲蓋彌彰之法，自然瞞不過精明的諸葛亮，當諸葛亮派人查明真相之後，罪證確鑿的李嚴自然也無從抵賴，只有俯首認罪。雖說李嚴是劉備生前託孤之重臣，但孔明依然沒有念及舊情，依法處置，將其謫為庶人，流放至梓潼郡度過餘生。然而，在段落的最後，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而牽連李嚴家族其他人等，甚至還起用李嚴之子李豐為長史，積草屯糧，整治軍器，其公正無私的態度著實令人嘆服。

另外在《三國演義》中還有一例，也是諸葛亮治軍信賞必罰的明證：

卻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總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人高視下，勢如破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sup>228</sup>

以上是極為著名「馬謖失街亭」的精采片段，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剛愎自用的馬謖，因聽不進王平的建議，又將孔明先前的叮囑拋諸腦後，而導致蜀軍兵敗街亭

<sup>22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47。

<sup>22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73。

的慘劇。然而，街亭乃是諸葛亮北伐路線中的五路總口，街亭的失守亦是宣告諸葛亮此次北伐的失敗，諸葛亮震怒的程度自是可想而知，毅然決定要處決曾經自己曾經視其為接班人的馬謖，蔣琬欲留賢才，諸葛亮卻如是說：

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須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sup>229</sup>

雖說孔明曾經極其喜愛馬謖，甚至視其為當世之英才，然而他深知此時軍令如山，若因一人而廢法，何以服眾？因而揮淚斬馬謖，充分了展現他視法如山的精神，並於班師回朝後，上奏自請處分：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謀，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慮事多闕。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闕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sup>230</sup>

雖說街亭之失，罪不在諸葛亮，但他依然認為視人不明是他的過錯，如此嚴以律己、責躬罪己的態度，實能看出諸葛孔明勇於承擔、嶄崎磊落的人格特性。從「揮淚斬馬謖」的事件中，我們也可以再次看到諸葛亮絕對不會因為一己之私，而失去公正客觀的執法態度，而對於趙雲在兵敗之後，獨自斷後，保護軍資什物不遺餘力的精神，諸葛亮也毫不吝嗇的「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sup>231</sup>以上種種，足以看出諸葛亮「賞罰分明」的治軍態度，也無怪乎在蜀軍當中，上至將軍，下至兵卒，個個都對諸葛亮有著全心全意的信任，並且誓死追隨、為之效命了！

## 第五節 小結

綜合本章所述，在《三國演義》當中，羅貫中所呈現的諸葛亮，不管是在政治、軍事以及對君王的忠誠上，皆展現出其與眾不同的形象色彩，幾乎是集智、勇、忠、謀於一身，從名垂千古的「隆中對」現世之時，便注定了諸葛亮不凡的一生，而若非劉備執意伐吳，天下局勢基本上與諸葛亮所分析的情形相差無幾，足可見諸葛孔明的高瞻遠矚。

為報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諸葛亮對蜀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也實是讓人感佩不已，正如《文心雕龍》〈知音〉篇所言：

<sup>22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85。

<sup>23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

<sup>23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83。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sup>232</sup>

正因知音難尋，逢知音更難，所以三顧茅廬的故事自然是更顯彌足珍貴，為了報答這樣的知遇之恩，諸葛亮在他的有生之年，竭忠盡力、成就了天下三分之功，也流傳為千古佳話。如此「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的不二忠心，無怪乎後人便曾以古風一首寄寓感慨：

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王圖在天府。  
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  
何其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sup>233</sup>

拜南陽三顧所賜，我們也才能夠看到後來諸葛亮在軍事及政治上的非凡才能，從赤壁之戰開始，孔明便開始嶄露頭角、發光發熱，替劉備爭取了一方天地。然而好景不常，劉備病逝白帝城，立即讓蜀漢霸業傾頹泰半，但諸葛亮仍舊力挽狂瀾的逆轉頹勢，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發明空前絕後的八陣圖、木牛流馬等工具，甚至以空城計戲耍司馬懿，一度讓蜀漢霸業有蒸蒸日上之感。加上其以法治國、以信為本、賞罰分明的統御之術，使得蜀人無不感恩戴德，老幼婦孺皆鼓腹嘔歌，將諸葛亮的事蹟傳頌後世。以上種種，我們皆可看出諸葛亮為了「匡復漢室」，傾心竭力、食少事煩，只希望能夠完成劉備的遺願，如此巨大犧牲與奉獻的精神，也讓唐代大詩人杜甫傾心不已，底下便引〈詠懷古蹟五首·其五〉，來看看杜甫是如何描述諸葛亮：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sup>234</sup>

在杜甫的詩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諸葛亮的仰慕之情，甚至認為諸葛亮的才幹媲美古代賢相伊尹及呂尚，而比蕭何及曹參有過之而無不及，實為千古難遇之奇才。然而，以巴蜀之地要力抗曹魏九州之勢，再加上蜀國後主的昏聩無能，即便諸葛亮有通天之能，也難以力挽狂瀾，故詩的最後，杜甫便以「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來表達他對諸葛亮壯志未酬的無限憾恨。而毛宗崗對於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結局，也給予了如此的評語：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有終，不如不出。及如孔明盡瘁

<sup>232</sup> 張立齋編：《文心雕龍·知音第四十八》，臺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459-464。

<sup>233</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1770-1771。

<sup>234</sup> 劉墉：《唐詩句典》，臺北，求真出版社，2010年，頁179。

而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於萬世？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sup>235</sup>

當諸葛亮選擇出山的那一刻，便開啟了他「逆天入世」的人生之路，雖然早知步步荊棘、困難重重，他依然為了人民、為了信念而不計利鈍，力圖重整漢室昔日光輝，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崇高精神，到現在讀來依舊讓人唏噓流涕、感慨不已，而對於如此悲劇，《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是這樣解釋的：

具有正面素質的人物作正義之事，但在特定時空環境之下遭受挫折、失敗、犧牲。在毀滅中展現出正面人物巨大的精神力量，使觀者震撼、悲憫，並進而對觀者靈魂起了洗滌、淨化的作用。<sup>236</sup>

正因諸葛亮是壯志未酬、以身殉國的結局，反倒更加凸顯孔明悲劇英雄的角色，而透過羅貫中的妙筆生花，《三國演義》實是成功的將諸葛亮多謀善斷、捨我其誰的人物形象深植人心，使讀者至今依然為之津津樂道！

---

<sup>235</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514。

<sup>236</sup> 陳瑞秀：《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頁109。

## 第五章 《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比較

根據明末文學家馮夢龍的說法，他認為在明清章回小說裡，《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西遊記》為小說中之佼佼者，並稱為「四大奇書」，而其中又以《三國演義》最廣為人知，不管是研究的書籍也好，拍成的電視劇也罷，可說是不計其數。而它之所以能歷久不衰，主要是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相當生動精采，令人有種身歷其境之感，關於此點，蕭佩瑩在《唐傳奇人物研究》曾如是說：

人物塑造並不是單純地描繪一原型，而是在實際生活中，廣泛地吸取生活經驗，通過誇張、想像、虛構、剪裁……等手法，創作出一系列鮮明的人物形象。由此可知，作家筆下栩栩如生的小說人物，絕非隨意可塑造出來的，而是透過小說家豐富的人生閱歷、細膩的心思、入微的觀察，以及巧妙的筆觸著墨，方能塑造出刻畫入微、撼動人心的角色形象。小說人物的創生靈感是取材於現實生活，而小說家接觸到的是龍蛇雜主的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真人，因此，小說人物塑造的成功與否，關鍵即在於小說家的「合成」功力。<sup>237</sup>

作為一部歷史小說，我們可以看到羅貫中在《三國演義》巧妙地結合了正史與民間故事，把歷史與虛構融為一體，因此他的「合成功力」可說是無庸置疑的。小說中，為了凸顯人物形象，我們可以看到作者不斷的利用對比、映襯、渲染的手法，來取得強烈的藝術效果。其中，周瑜與諸葛亮就是對非常明顯的例子，故本章將透過探討《三國演義》中兩人的相同及相異之處，進而延伸至兩人形象與正史中定位有何不同，從而分析《三國志》到《三國演義》兩人形象演變之軌跡。

### 第一節 周瑜與諸葛亮的相異處

談及《三國演義》，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周瑜與諸葛亮這兩號人物，一位是名滿江東的青年才俊，另一位則是震古鑠今的賢相代表，「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等等句子，更是早已成為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中所運用的口頭禪，而其中所描述的人物，也成功塑造出他們各自獨樹一幟的形象，在《三國演義與經營謀略·序》中便可略見一二：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書，……作為一部藝術化的兵書，逼真的描繪了

<sup>237</sup> 蕭佩瑩：《唐傳奇人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8-9。

驚心動魄、千姿百態的戰爭畫卷，成功的塑造了一批多謀善斷、處事嚴謹的、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出色謀略家典型形象，藝術的凝集了我國古代謀劃、策略思想的精華，蘊涵文韜武略，飽含大智大勇，為我國古代許多政治家、軍事家所推崇。<sup>238</sup>

呈上所述，在《三國演義》當中，諸葛亮可說是全書整體謀略家中的核心角色，然而，身為東吳陣營第一謀士，周瑜自也是不惶多讓。根據前兩章，我們已經看到兩人在書中的精采表現，那麼同為《三國演義》中一流的軍事政治家，他們兩位人物形象上到底有何相異之處呢？以下將以三點分述之。

## 一、性格外放與謹慎小心

### (一) 性格外放的周瑜

在先前的第三章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羅貫中用「姿質風流，儀容秀麗」做為周瑜初登場的介紹台詞，這風度翩翩的人物形象不僅建立了周瑜少年英雄的氣概，更替之後小說中周瑜「個性外放、好惡分明」的性格留下了伏筆。所以在《三國演義》中所描述的周瑜，可說是一位喜形於色之人，不管是志得意滿抑或是氣急敗壞，我們皆可看到他在小說中的情緒是顯而易見的，而這樣的個性正好是一把雙面刃，大鳴大放的個性往往有種安定軍心的力量，但也有可能因此而思慮不周、甚至影響健康。舉例來說，在《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中，周瑜外放的性格便顯露無遺：

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眾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sup>239</sup>

當曹操大軍南下，只見東吳內部亂成一團，此時的周瑜剛返回江東，聽完主戰派的想法之後，馬上以一句「安肯投降」，抒發了自己內心抗曹的決心，更使得各主戰派的將軍更加團結一致，如此安定軍心的能力，也正是因他直爽率直的個性所致。然而，過度自信的個性也曾替周瑜招來失敗：

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笑

<sup>238</sup> 郭濟興、李世俊：《三國演義與經營謀略·序》，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3。

<sup>23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09-510。

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今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孔明，子敬在此為證，都督休悔。」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sup>240</sup>

呈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周瑜信誓旦旦的認為自己可以輕取南郡，然而卻因為計策不夠周全，加上吳軍太過輕敵而導致兵敗南郡，而諸葛亮則是趁著兩強爭鬥，坐收漁翁之利，從而獲取南郡。由此可見，大鳴大放的個性既為周瑜帶來成功，卻也同時帶來失敗，除此之外，喜怒分明的個性也影響了他個人的健康：

卻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sup>241</sup>

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的開篇，我們可以看到周瑜因為擔心沒有東南風，無法使用火攻，而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如此強烈的性格特色，最終自然也就導致了他英年早逝的結局。所以，在羅貫中的筆下，周瑜的急躁也就成了他日後的「阿基里斯之踵」，因此，在葛楚英所撰的《三國演義與人才學》中，便曾給這樣的周瑜下了一段很好的註解：

周瑜的「急」反映在氣質上是修養太差，反映在功利上是破曹心過切。「人急智短」，這句話說明了人的氣質修養給才智所帶來的影響。周瑜有「智」，一急就成了「智短」了。<sup>242</sup>

故而，在《三國演義》當中，周瑜外放的個性雖然替他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但這樣的性格對於東吳第一謀士來說，卻是顯得魯莽衝動了一些，如此人格上的缺失自然也使得周瑜過人的才智黯淡了不少，無怪乎葛楚英會說他是「人急智短」了！

## (二) 謹慎小心的諸葛亮

相較於「人急智短」的周瑜，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的表現便顯得較為謹慎小心，運用如此映襯對比的寫作手法，在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便有著相關評語：

《三國》一書，有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其對之法，有正對者，有反對者，有一卷之中自為對者，有隔數十卷而遙為對者。<sup>243</sup>

<sup>24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84。

<sup>24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3。

<sup>242</sup> 葛楚英：《三國演義與人才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年，頁230。

<sup>243</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8-9。



在小說中，諸葛亮與周瑜之間的爭鬥，便是巧妙的運用上述所敘的人物前後對比之方式，藉由周瑜來反襯諸葛亮的過人之處。而在個性上，相較於周瑜的「急」，諸葛亮的「穩」自然顯得更加思慮周全：

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sup>244</sup>

《三國演義》中所述的「子午谷計畫」，與正史所述相去不遠<sup>245</sup>，而歷來對於魏延的這個計畫始終爭論不休，支持者認為偷襲才有可能克敵制勝，諸葛亮的北伐大業有可能早已成功。然而，在羅貫中筆下「求穩」的諸葛亮自是沒有採納此計，而後來也證明諸葛亮是對的：

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sup>246</sup>

原來死對頭司馬懿也早就想到了此計，因此諸葛亮若真採納魏延的意見，蜀軍不一定會把魏軍打得落花流水，還有可能被反將一軍，落入司馬懿的圈套當中。從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諸葛亮謹慎的個性實是他之所以能成為一代軍師的關鍵因素。然而，諸葛亮謹慎小心的個性，也導致了他凡事從不放心別人代勞，皆是事必躬親的態度，在《三國演義》第八十七回中便有著如此的描述：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sup>247</sup>

<sup>24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41。

<sup>245</sup> 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魏延傳》引《魏略》註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見[西晉]陳壽著、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95年6月），頁1003。

<sup>24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71。

<sup>24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79。

正所謂：「能力越大者，責任越重」，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成都的大小事務幾乎由諸葛亮一手包辦。然而諸葛亮事事一肩扛的個性，即便是鐵打的身體也吃不消，就連司馬懿都料定諸葛亮的健康遲早會出問題：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者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sup>248</sup>

最後一次北伐中原，面對司馬懿的堅守不出，用兵如神的諸葛亮竟也是無可奈何，於是便採取激將法意欲逼迫司馬懿出兵。然而，司馬懿在聽到孔明的近況之後，竟淡淡說了一句：「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實是切中諸葛亮的要害。針對此事，主簿楊顥也曾對諸葛丞相提出勸諫，聰明如諸葛亮豈會不知休息的重要性？然而，他卻向楊顥說道：

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sup>249</sup>

短短一句「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道盡了諸葛亮內心的無奈與辛酸，更間接反映出諸葛亮謹慎小心、如履薄冰的處世態度，而在憂勞成疾的情況下，一代將才諸葛亮最終便病逝於五丈原（今陝西岐山南），如此結局在距離千百年的今天讀起來，還是令人備感神傷、悲慟不已啊！

## 二、自作聰明與深謀遠慮

一般小說在刻劃人物上，常常以美醜、善惡、智愚等要素來歸類人物的特色，但在《三國演義》當中，羅貫中卻是採取與眾不同的寫法，在他的寫作觀點裡，他並不認為一強一弱的敘述能充分使人物立體化，相反的，若是以兩強相爭的寫法，將能使文章更具可看性，因此，在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便曾提到：

文有正襯與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其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為加倍乖巧，其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以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sup>250</sup>

因此，若要使人物形象上勾勒的更加生動，一正一反的「反襯」手法並不足以凸

<sup>24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71。

<sup>24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71。

<sup>250</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13-114頁。

顯人物的性格與特色，衝突當中所激盪出的「正襯」，反使雙方個性形象對比得更加鮮明。羅貫中筆下，周瑜與諸葛亮雙雄之間的相爭，便是採取以對撞衝突的方式，來凸顯出諸葛亮的高明，相形之下，周瑜的智慧反倒變成是一種自作聰明了！在赤壁之戰中，周瑜與諸葛亮表面雖是相敬如賓，背地裡卻是暗潮洶湧、殺機四起，其中便有幾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 1. 借刀殺人之計

在前面第三章「三殺諸葛」的部分，筆者便曾提到周瑜派諸葛瑾作為說客，前去勸降諸葛亮不成後，便開始動了殺諸葛亮的念頭。於是在「一殺諸葛」的計策中，周瑜打著「聚鐵山斷糧」的名義，欲借他人之手，將諸葛亮除之而後快。沒想到周瑜的計策不成，反險些被諸葛亮以激將法氣到自己去劫糧，要不是諸葛亮以「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堤備？公瑾若去，必為所擒。」<sup>251</sup>奉勸魯肅告訴都督萬不可衝動行事，周瑜早已命喪黃泉。

然而，沒有除去自己的心頭大患前，周瑜誓不罷休，故而又有了「二殺諸葛」的作戰策略。在第二套「借刀殺人」的版本當中，周瑜依舊天真的相信，他可以不用費吹灰之力的借曹操之手，殺掉孔明，但早已洞燭機先的諸葛亮，不僅沒有成為曹軍的箭下亡魂，反倒出色了完成此次的任務。兩次借刀殺人之計，一來一往之間，我們可以看出周瑜為達目的卻聰明反被聰明誤，以及諸葛亮為顧全大局的深謀遠慮，因此，在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第四十六回的總評中，我們便可看到以下的評論：

周瑜欲斷北軍之糧，明知其斷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東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斷糧，不能使北軍無糧；而孔明不造箭，卻能使江東有箭。則孔明之智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殺孔明，早被孔明識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與周瑜，卻使周瑜不知。則孔明之智為尤奇矣！

<sup>252</sup>

在羅貫中的敘事筆法下，周瑜與諸葛亮其實都是極其厲害的人物角色，但相較之下，諸葛亮卻更上層樓，毛宗崗在上述段落中便點明了其間的差異：

- (1) 周瑜意不在斷糧，卻不能真有計策使魏軍無糧；而孔明意不在造箭，卻真能使計借箭成功，其間思考的縝密程度，立見高下。
- (2) 在兩次行動中，周瑜皆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的計劃絕對萬無一失，卻不知這樣的雕蟲小技在諸葛亮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相反的，諸葛亮在考量全局的過程中，卻沒有因為對方的小動作想要加以報復，反而以大局為重，一次勸周瑜勿因衝動而枉送性命，另一次則完美地達成了任務，替孫劉聯軍帶來了實質上的軍

<sup>25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2。

<sup>252</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16頁。

事助益。

小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國演義》的描繪之下，周瑜本來是饒富智謀，在諸葛亮的面前卻始終是少了那麼一層；本來是精彩絕倫的計策展現，遇到了諸葛亮卻變成了自作聰明。一位是一計只為求殺諸葛亮，另一位則是用一計就可達到破除陰謀、節省軍費以及消耗敵軍戰力等多項目的，兩雄對峙間，讀者難道還能不讚嘆諸葛亮的深謀遠慮嗎？

## 2. 二蔡反間之計

羅貫中除了在借刀殺人的計策上，表現出周瑜自視甚高卻又落得自作聰明的下場外，在偽信詐蔣幹一事中，我們也可再次看到他那自傲自負的脾性：

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sup>253</sup>

周瑜嘴上雖說「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然而他內心還是自以為贏過了孔明，否則為何要派魯肅前去試探諸葛亮？甚至在聽完魯肅如實回報後，何至於大驚直呼要殺諸葛亮？相較於周瑜自作聰明的猜想，諸葛亮被魯肅試探的表現卻沉穩許多：

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唬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干。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任錯耳。今蔡、張二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介、於禁為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裡，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這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妒忌，又要尋事害亮。」<sup>254</sup>

在諸葛亮與魯肅的應對當中，諸葛亮早已知曉魯肅的來意，並誠心誠意的祝賀周郎的妙計已成，這對孫劉聯盟來講，無疑是除掉了眼下的心腹大患。此外，諸葛亮不僅洞悉這件事情的原委，更對於周瑜內心所隱藏的殺機是一清二楚，要不是魯肅太過老實，否則周瑜可能就會一直沉浸在沾沾自喜的氛圍之中了！關於此事，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一樣有著相當中肯的評價：

蓋欲瞞曹操，又必須先瞞二蔡也。乃眾人可瞞，二蔡可瞞，曹操可瞞，而獨孔明必不可瞞。不但公瑾不能瞞孔明，而孔明反囑子敬以瞞公瑾，則孔

<sup>25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9。

<sup>25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3。

明之智又高於公瑾數頭。<sup>255</sup>

由此可見，羅貫中為了凸顯諸葛亮之「智」，在映襯的手法中下了相當大的功夫，利用周瑜做為跳板，間接地顯現出諸葛亮的深謀遠慮。而在孔明那鬼神般的思維之下，周瑜再多的巧思妙計似乎也就只能成為「自作聰明」了！

### 3. 賠了夫人又折兵

赤壁戰後，孫權跟周瑜皆明白，劉備在諸葛亮的輔佐之下，早就已經不是當年那位屢戰屢敗的劉皇叔，其胸襟氣度也絕非是池中之物。在奈何不了諸葛亮後，周瑜開始將歪腦筋動到了劉備身上：

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他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

256

早將劉備、諸葛亮視為是東吳假想敵的周瑜，聽到了劉備喪妻的消息，馬上就聯想到了孫權的妹妹—孫尚香，想要以當初王允令董卓、呂布鬥得兩敗俱傷的「美人計」，故技重施在劉備的身上，這條計策也馬上獲得孫權的讚賞，然而，事情卻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卻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實，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知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sup>257</sup>

在毛宗崗的評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周瑜所使的「美人計」前實而後虛，似又略勝王允一籌，但如此巧計為何沒有奏效呢？為何王允使一計賺得董卓與呂布二人，而周瑜卻大事未成呢？羅貫中在小說中很清楚地給了讀者解答：

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sup>258</sup>

<sup>255</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18頁。

<sup>25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13。

<sup>257</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44頁。

原來在劉備、孔明的心中早有所防備，為此，諸葛亮索性來個將計就計，交付趙雲三個貼身錦囊，要趙雲見招拆招，令主公能夠魚與熊掌兼而有之。然而，好的計策，同時也需要有好的執行者，劉備這時候便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個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也。<sup>259</sup>

在劉備與諸葛亮聯手上演「智激孫夫人」的年度大戲之下，孫尚香竟弄假成真的愛上了劉備，而當美人計其中的關鍵人物都已失守時，周瑜也只能在旁徒呼負負。再加上吳兵不敢動孫夫人，與諸葛亮神機妙算的撤退路線綜合起來，使得周瑜沾沾自喜的妙計，最終只換得一句：「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sup>260</sup>。如此下場，只怕周瑜當初是連想都沒想過的結局呢！

### 三、心胸狹隘與寬宏大度

#### (一) 心胸狹隘的周瑜

根據前面第三章的描述，在《三國演義》的形塑之下，周瑜是一位氣量狹小且忌才妒能之人，處理事情時也較為目光短淺、衝動行事。而在羅貫中的描述當中，「三氣周瑜」是最主要在形容周瑜心胸狹隘的部分，例如筆者在第三章曾經提到的南郡之戰，周瑜力戰而不能取，諸葛亮卻不費一兵一卒而坐享其成。此時周瑜在一氣之後悠悠轉醒，有著一段精彩的描述：

卻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蘇，眾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sup>261</sup>

重傷方醒，周瑜竟不顧自己的身體安危以及統帥形象，當眾在軍士面前罵諸葛亮是「村夫」，如此貶抑之詞實可見得周瑜內心有多麼的忿忿不平，而這邊也充分凸顯出了周瑜「眼裡容不下沙子」的狹小氣量。然而，周瑜似乎將一切的過錯都加諸在諸葛亮身上，認為他趁亂進佔南郡城，實為卑鄙無恥之徒，絲毫不認為自己的計策有任何疏失，毛宗崗對於此事便給予了很好的評點：

<sup>25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14。

<sup>259</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45頁。

<sup>26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29。

<sup>26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91。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幟于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于南郡之側，則何至為子龍所襲乎？使之中箭，既輕進于前；繼之失地，又遲發于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sup>262</sup>

在毛氏評語中，他明確的點出其實周瑜並非沒有機會防止趙雲的偷襲，只是因為他自己計策疏漏，思慮沒有韓信來的縝密罷了。因此在南郡之戰一事中，周瑜先是允諾劉備若他無法攻下南郡，便「任從公取」，實為自傲自負；其後看見諸葛亮得了南郡、荊襄，便「罵人村夫」，實為氣量狹小，如此個性鮮明的形象呈現，無怪乎世人在讀完《三國演義》後，皆會將周瑜定義為心胸狹隘之人！

## (二) 寬宏大度的諸葛亮

雖說在羅貫中的筆下，周瑜的負面形象大於正面形象，然而在作者的藝術加工之下，周瑜在《三國演義》中的地位實為一條連接的樞紐要素，進而對於諸葛亮的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映襯作用。因此，在周瑜氣度狹小的對比之下，諸葛亮的寬宏大量自也就呼之欲出：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吊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捨以民。吊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吊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吊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吊君鄱陽，蔣干來說；揮灑自如，雅量高志。吊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樸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痛哉！伏惟尚饗。<sup>263</sup>

周瑜死後，諸葛亮前往巴丘弔喪，並以上述感人肺腑的祭文悼念周瑜，文中前半段提到周瑜一生的豐功偉業，後半段則是在表達諸葛亮的哀傷之情，甚至以「從此天下，更無知音」來敘述諸葛孔明對於這名可敬敵人的離開，就如同失去知音一樣，感到萬分的不捨與悲痛。看到如此淚如泉湧的諸葛亮，原先對孔明恨之人骨的眾將士們，竟也對其寬宏的氣量感到佩服：「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

<sup>262</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34頁。

<sup>26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47。

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sup>264</sup>忠厚老實的魯肅，更是在旁自思：「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sup>265</sup>由此可見，面對周瑜幾次的殺己之罪，諸葛亮非但沒有與之計較，還對於周瑜的逝去如此傷痛欲絕、真情流露，孔明的寬宏大度自此可見一般。

諸葛亮的寬宏大度除了展現在與周瑜的交手之外，於七擒七縱孟獲的情節中同樣可見其寬闊的胸襟，面對孟獲一次次的挑釁與不服，若是脾性較為不好的將帥，大可一刀把孟獲給砍了，但是諸葛亮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諸葛亮一而再、再而三的饒過孟獲，就連諸葛亮的下屬都開始頗有異議：

卻說孔明放了孟獲，眾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sup>266</sup>

然而，事實證明諸葛亮是對的，正因為諸葛亮的寬宏大量，才能讓蠻王孟獲以及其蠻兵真心誠意的降伏於蜀國之下，並誓言不再反叛。因此，在《三國演義》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七擒孟獲之後，諸葛亮在當地少數民族的心中地位甚至趨近於神：

於是蠻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為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皆呼之為慈父；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sup>267</sup>

能讓民眾感恩戴德，甚至為其「立生祠，四時享祭」，這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由此可見，諸葛亮寬宏大量的形象早已深植在當地人的心中，而對於平反南蠻的事件，毛宗崗也曾提出其獨到的見解：

武侯之欲撫南蠻，而即用孟獲者：真深得安蠻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不能不分兵；分兵，則不能不轉餉；轉餉，而輸輓徒勞。不若使自守之，而庇蔭之下皆吾土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設官；設官，則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獄滋擾。不若使自治之，而涵蓋之下皆吾人也。<sup>268</sup>

而在上述一切管理要素的背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毛宗崗所沒提到的，那就是一「得心」，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諸葛亮這裡便是利用「軍欲征其地必先得其心」的原理，用其寬闊大度的胸襟，使南蠻地區從上至下

<sup>264</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47-648。

<sup>26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48。

<sup>26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991。

<sup>26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23。

<sup>268</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238頁。



皆對其佩服至極、感恩不已，這便是使用「心戰」所得到的驚人成效，也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以德服人」比起「以力服人」，才是真正能令人心悅誠服的不二法門！

## 第二節 周瑜與諸葛亮的相似處

身為東吳與蜀漢兩大陣營的軍事天才，在《三國演義》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周瑜與諸葛亮身上有著許多相似的特質，從他們兩人選擇君主開始，一直到在分析局勢、設計戰略等各方面，他們皆有著非比尋常的見識、氣魄與素養，甚至能讓戰事精準地依照他們的判斷加以進行，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兩位能成為東吳與蜀漢中最耀眼的將星，而底下筆者將他們的相似處分為三點，進行對照性的分析、比較：

### 一、選擇君主的主動取向

在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中，儒家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甚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提倡的「天人感應說」，更是將「君命乃天命」的觀念推到一個全新的頂點。在這樣的概念下，「君擇臣」無疑是理所應當的道理，然而其他的聖賢卻有著不一樣的觀點，在《孟子·離婁下》中，我們便可看到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sup>269</sup>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孟子認為最理想的君臣關係是君臣間彼此互敬互重，而最糟糕的君臣關係則是君臣間彼此相互憎恨、互相厭惡。因而見得，臣下與君上的關係不再是全然的被動，並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可以明確表達，甚至反映出下屬的內心感受，於《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這兩位當世大才，也都表現出了「臣擇君」的主動性。小說第二十九回中，周瑜便藉由馬援之語，表述了他此類的想法：

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

<sup>270</sup>

<sup>269</sup> [宋]朱熹撰、金良年今譯：《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第八·離婁章句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67。

<sup>27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352。

這段話雖是周瑜為了說服魯肅效忠孫權而言，卻也明確的表現出周瑜自身對於「臣擇君」強烈的主觀意識，在他的概念中，明主才值得將士們追隨效忠，反之寧可靜待識才明主的出現，也不願為終無所成的昏庸君王賣命。在這一方面，《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曾有一段清楚的描述：

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sup>271</sup>

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的敘述中，當周瑜為好友奔走、擊破敵軍，甚至替孫策招集足夠兵馬，平定吳會、山越以後，周瑜便回到了他爸爸任職太守的地方。然而，袁術卻遣其弟取代了周瑜父親太守一職，甚至袁術還想要將周瑜納作自己麾下的將軍，但聰明的周瑜早已看出袁術是個昏庸無能、短視近利的君主，因此便找個理由趁機跑回了吳國。綜上所述，周瑜並不是一位「聽命行事」的人臣，相反的，他不但在觀念上強調了臣子應保有「賢主而棲」的主動性，更實際以行動來實踐他的想法！

除了周瑜之外，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也同樣保有「臣擇君」的主動性，在《三國演義》的敘述當中，三顧茅廬便是諸葛亮主動選擇君主的最佳例證。在劉備三顧茅廬之前，第三十六回末我們更可一度看到諸葛亮不喜徐庶將他胡亂推薦出去：

且說徐庶既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即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赴許昌見母。<sup>272</sup>

原來徐元直唯恐諸葛亮不肯出山輔佐劉備，便事先跑去臥龍崗替劉備做一回說客，誰知卻被諸葛亮義正嚴詞的說教了一番，從而羞慚而退。閱讀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並不願意作為別人的替代品，他只想做符合他自己意願的事，也就是擇明主匡復漢室，救百姓於水火之中。在劉備二顧茅廬的時候，羅貫中便透過了其弟吟唱諸葛亮的創作，從旁表明諸葛亮「身在茅廬，心繫天下」的心志：

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sup>273</sup>

<sup>271</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0。

<sup>27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29。

從上述可知，諸葛亮自翊為「鳳凰」一般的角色，並以「非梧不棲」、「非主不依」等語句充分表達他雖等待明主，卻絕不降格以求的自身原則。如若沒有適合的君主，他寧可躬耕於隴畝之間，聊寄傲於琴書之上，從而靜待明主的到來。

因此，在選擇君主的主動性方面，我們皆可從周瑜及諸葛亮的身上看到相同的特質，古代的君臣關係，就如同虬髯客傳裡紅拂女口中的「絲蘿」與「喬木」，彼此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缺一不可。然而，這樣的關係卻不只是君王可以掌控主動權，充滿謀略與智慧的軍師，同樣也可以為自己選擇一位具有「伯樂之才」的君主，而這樣的君主也才能帶給百姓真正的安定。因此，在黃宗羲〈原臣〉一文中，便曾言道：

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sup>274</sup>

呈上所述，為臣者並不能一味的遵循君主的旨意，否則便有可能使得國家走向滅亡之途。同樣的，在君臣互擇的過程中，為臣者更加不能將就或屈居於自己不喜歡的君主之下。而在三國所發生的事件中，周瑜拒袁術與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便是提供給我們一個最好的示範與說明！

## 二、預判情勢的軍事眼光

自古以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總是戰場上不變的真理，然而，究竟要如何從群雄爭霸、人才迭出的三國時代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場上的「勝者」？那就需要軍事家具有預判情勢的獨到眼光，方能搶得先機、克敵制勝。因此，在《孫子兵法》中，並曾提到：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sup>275</sup>

上述的段落提到，善戰者，並不會一味的去苛求士兵、責罵下屬，反而總是能利用現成的「勢」以及適當的人才，將最少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功效。所以善於打仗的人總是能以精準的眼光，承「勢」而行，將敵人一舉擊潰，這一方面，周瑜及諸葛亮都有著過人及傑出的表現。

首先，在周瑜的部分，身為東吳大都督，分析戰場上的局勢，從而設計出正

<sup>27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39。

<sup>274</sup> [清]黃宗羲撰：《明夷待訪錄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91。

<sup>275</sup> [周]孫武撰、[魏]魏武帝等注、[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2頁。

確的戰略計策，他責無旁貸。然而，他精準的預測判斷，卻也著實是赤壁之戰的分水嶺，從而在歷史上寫下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在《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的段落中，便有著精采呈現：

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蒿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sup>276</sup>

當曹操率領八十三萬大軍殺來，江東正值風雨飄搖，隨時有可能傾頽之際，周瑜提出了一席令人振聾發聵的言論，洋洋灑灑的以他獨到的眼光分析出曹操南下必敗的四大軍事忌諱，頭頭是道的言論，不僅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更令張昭等主降派一眾，聽的是啞口無言，無從反駁。而上述周瑜提到曹操所犯的大忌，竟也於《孫子兵法》中所云不謀而合：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於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高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sup>277</sup>

上述的〈始計篇〉提到，一場戰爭的關鍵在於道、天、地、將、法等五大要素。因此，在周瑜的分析中，於「道」，曹操的八十三萬大軍中，有不少士兵是袁紹降軍，這些人是否會與曹軍上下一心，孰未可知；於「天」，赤壁之戰前夕正值隆冬盛寒，這對兵疲馬憊且水土不服的曹軍而言，無疑是一大考驗；於「地」，不管是在地理環境，抑或是水戰的熟悉程度上，曹軍遠不如東吳軍隊；於「將」，北軍並無熟諳水戰的將領，而蔡瑁、張允則為劉琮舊臣，其心未知；於「法」，在糧草運送、物資調派方面，冬日供給本就不易。

綜合上述所說，周瑜「主戰」並非是好強爭勝，更不是為了安撫孫權所提，而是綜觀整體局勢，從而做出精準的判斷，以「己之利」打擊「敵之弊」，如此依「勢」而為之的戰略眼光，無怪乎就連曹操如此大才，也會就此慘遭滑鐵盧，實在是輸得毫不冤枉啊！

相較於周瑜的預判能力，諸葛亮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

<sup>27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3-514。

<sup>277</sup> [周]孫武撰、[魏]魏武帝等注、[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頁。

他的千古一策—「隆中對」，便為其最好的例證。在前面第四章，已經詳加分析過諸葛亮的「隆中對」，故而我們可以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發現，他對整體局勢的前瞻眼光有多麼銳利，從一開始他勸劉備應避免與曹操、孫權爭鋒，然後再取二劉之地作為根據地，從而內修政理、外結盟友，最後再以後圖中原作為終極目標。如此的規劃，早已幫劉備將天下三分的態勢大多畫至底定，事實證明也是如此。這也正符合了《孫子兵法·軍爭篇》所說的一段話：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sup>278</sup>

善於用兵者，乃是以靜制動，方為上策，若能懂得「避其銳氣、以佚待勞」，那便可視其為更高明的謀略者。而在孔明的隆中對，不與曹操、孫權爭鋒便是「避其銳氣」的策略，挑閻弱二劉之地下手則是「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的作法，而劉備也就在諸葛亮算無遺漏的計策下，順利的取得蜀漢根據地，進而有了與曹操、孫權一爭天下的本錢，就這件事情來說，難道還能不佩服諸葛亮那洞燭機先的敏銳觀察力嗎？

除了隆中對之外，在《三國演義》真正能使讀者在諸葛亮與周瑜之間立判高下的，應該就屬三殺諸葛以及三氣周瑜的部分了。在三殺諸葛的部分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周瑜的計策一次次被諸葛亮所識破，從聚鐵山劫糧、草船借箭，甚至到最後派徐盛去祭壇殺掉諸葛亮，每一回周瑜都認為自己的謀畫相當完美，諸葛亮是必死無疑，結果卻每次皆早被諸葛亮所察覺，進而占盡優勢，化解危機。而在三氣周瑜的部分，從一開始的南郡之戰，一直到後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以及周瑜「假道伐虢」的戲碼，諸葛亮哪一次不是以佚待勞、後發制人？讓周瑜也只能無奈嘆服，抑鬱而終。而羅貫中這種「一山還有一山高」的寫作手法，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映襯效果，藉由周瑜精準銳利的戰略眼光，從而凸顯出諸葛亮的高人一等，無怪乎諸葛丞相那副「羽扇綸巾、神機妙算」的人物形象，過了百年之後，始終依然深植人心啊！

### 三、應用靈活的戰術策略

在變化多端的戰場上，善於用兵者，總是能從容地處在主動支配敵人的地位，並藉由混淆敵人的視聽，來達到敵人無法猜透己方虛實之功效。然而，究竟要如何才能將敵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呢？《孫子兵法·虛實篇》中提出了一段發人深省的看法：

<sup>278</sup> [周]孫武撰、[魏]魏武帝等注、[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40-142頁。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應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sup>279</sup>

根據上述所言，用兵就如水的流向，並沒有固定的準則、型態，一位軍師若是能做到依照敵情變化而改變戰術，將兵道發揮至如同五行變化、日月盈虧一般，從而避實擊虛、擊中敵方要害，那便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由此可見，戰場上的獲勝關鍵，除了兵強馬壯、糧草補給之外，軍師如何將戰術策略應用的靈活多變也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而在這一方面，周瑜與諸葛亮皆做得相當出色，並時常將戰場扭轉至有利於己方的局面。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裡，周瑜靈活的戰術運用表現在赤壁一戰當中，為何面對曹操如此強大且又老謀深算的敵人，東吳絲毫沒有落居下風，甚至以下克上，贏了軍隊人數比他們多出好幾十倍的曹軍呢？這與周瑜的戰略有非常大的關係，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五回至第四十九回的描述中，羅貫中將周瑜靈活的戰術表現的淋漓盡致，以下便逐一分析之：

#### (一) 用間

在赤壁之戰中，要想打敗詭計多端的曹操，便勢必要將計策弄得人不知鬼不覺，才有可能躲過曹操那雙銳利的眼睛。因此，在毛宗崗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會蔣幹中計〉的總評中，我們可以看到底下的一段話：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sup>280</sup>

面對剛剛在官渡之戰取得大勝的曹操，周瑜曉得必須先挫挫敵人的銳氣，方可提振己方的士氣，故他是為上述所說的「端之順見者」。在此之後，曹操也開始明白不可以小覷對方的實力，因此也才會有了蔣幹勸降周瑜一事。

然而，這卻正中周瑜的下懷，在前面第三章的部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周瑜反而將計就計的利用蔣幹，將假降書帶回曹營，成功除掉了對方最具威脅性的水軍將領—蔡瑁及張允，讓曹操在回過神後，也只能暗吃悶虧、自認倒楣。如此精彩的段落，無怪乎就連毛宗崗都覺得「周瑜假做極疎，卻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卻步步是呆。」<sup>281</sup>雖說史書上並無關於此事的記載，但透過羅貫中生動的

<sup>279</sup> [周]孫武撰、[魏]魏武帝等注、[清]孫星衍等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18頁。

<sup>280</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13頁。

<sup>281</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

描寫，卻讓後世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若蔣幹在九泉之下看到，也只能徒呼負負了吧！

在周瑜設計除去心頭大患之後，曹操也決定對東吳玩一回反間計，然而周瑜卻再次利用詐降的蔡中、蔡和，替自己傳遞假情報給曹操，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大玩諜對諜的遊戲。不僅如此，周瑜的反間計中，還有著其他將領(如甘寧、鬪澤)的參與，讓整體計畫更加得嚴實緊密、滴水不露，如此環環相扣的用間之道，實讓人不得不佩服周瑜在運用戰術上的縝密心思啊！

## (二) 詐降

僅僅讓曹操損失兩名水軍將領，並不足以讓東吳軍隊打贏赤壁之戰，於是周瑜便開始了他第二步的計畫，也就是先前亦在第三章曾經提過的「周瑜棒打黃蓋」一事。透過此事，周瑜成功替自己安插了火攻曹操大軍的執行者，然而，要騙過曹操，勢必就得騙過所有人，因此，毛宗崗在評點裡便曾提到：

黃蓋苦肉之計，偏要白日裡瞞眾人。蓋不瞞眾人，恐瞞不得曹操也。<sup>282</sup>

在正史記載中確有「黃蓋詐降<sup>283</sup>」一事，然而卻無「周瑜打黃蓋」的相關詳錄，因此，上述「苦肉計」應為羅貫中自行編撰，但這段杜撰的情節卻成了書裡其中的一段高潮，周瑜與黃蓋不僅僅聯手騙了敵方的軍隊，甚至就連己方的兵將對於此事都深信不疑，最後再加上鬪澤機智的反應，以及蔡和、蔡中的被騙的假消息適時送到，層層疊疊間將謊言編織得天衣無縫，狡詐多疑如曹操，在虛虛實實中竟也被耍得團團轉，從而在赤壁之戰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綜觀而言，周瑜在戰術的設計上不僅充滿巧思，更有著其多變性，光從反間計一事上來說，竟能讓狡詐的曹操重複受騙，再輔以苦肉計以及龐統的連環船，讓曹操最終是一敗塗地，這樣的成功絕不是僥倖，而是周瑜過人的智慧展現！

反觀諸葛亮，諸葛亮在戰術策略的應用上更是略勝一籌，在《三國演義》的敘述中，諸葛亮除了運用戰術攻城掠地、抵禦外侮之外，更將戰術的變化性提升到了另外一種境界。讓戰術除了在進攻中有所發揮，更運用在防守、退兵、割稻等各方面，分別舉例如下：

---

化事業公司，1994年，115頁。

<sup>282</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18頁。

<sup>283</sup> 裴松之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江表傳》道：「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見[西晉]陳壽著、楊家駱主編：《三國志》，頁1263。

## (一) 武侯彈琴退仲達

在先前第四章中，便已經有清楚提到有關於「空城計」的故事，兩軍對壘之際，「空城計」之所以能夠成功的原因，主要在由諸葛亮對其戰術上的設計進行了改變。之前魏延所提出的「子午谷計畫」被孔明所反駁，讓世人皆認為諸葛亮不可能會做冒險的事，司馬懿亦是如此認為。然而，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卻反其道而行，不僅跌破了大家的眼鏡，更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因此，毛宗崗對於空城計便有了以下的評論：

惟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為危計——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眾——是大膽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sup>284</sup>

「兵者，詭道也」，讓人猜不透、摸不著，才能將敵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在空城計一事中，諸葛亮便利用司馬懿疑神疑鬼的心理狀態，加上大家平日裡對他的既定印象，便不費一兵一卒的退了司馬懿的十五萬大軍。而這也讓人再次見識到身為一位好的軍事家，必不能循規蹈矩、墨守成規，而是要依循著天時、地利、人和，不斷地去更動自己的軍事策略，從而找出最好的方法克敵制勝！

## (二) 添竈減兵之法

除了進攻、防守之外，要如何安全無虞的從敵軍的看守下撤退，也是戰術策略中重要的一環。在《三國演義》第一百回中，聰明的司馬懿派遣屬下至成都散播謠言，使劉禪誤以為諸葛亮想要起兵反叛，從而急召諸葛亮班師回朝。正值得勝之際，諸葛亮無奈之下也只能率兵歸返，同時又怕司馬懿乘勢掩兵追殺，故心生一計：

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一千兵，卻掘二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後日掘四千灶；每日退軍，添灶而行。」楊儀曰：「昔孫臑擒龐涓，用添兵減灶之法而取勝；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灶；見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sup>285</sup>

<sup>284</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253頁。

<sup>285</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36。



在上述的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為了避免司馬懿的追殺，將昔日大名鼎鼎的孫臏所用的「添兵減灶之法」做了改變，變成了「添竈減兵之法」，讓多疑的司馬懿再次受騙上當，誤以為諸葛亮設有伏兵而不敢追擊，從而讓蜀軍全身而退。如此活用戰術兵法，讓後人再次拜服在諸葛亮的智慧之下，而毛宗崗也有著這樣的一段評論：

孫臏以減竈誘敵之迫，武侯又以增竈遏敵之迫；是得孫臏之意而變化之。可見讀古書者，讀此句必是此句，便是不能讀；用古事者，用此法便是此法，便是不能用。觀於武侯，可以悟矣。<sup>286</sup>

毛氏的這段話，不僅娓娓道出諸葛亮的用兵之道是從古法中加以轉換而來，更提醒讀者凡事皆不能一成不變，要將所學加以轉化、變通成自己的東西，方能用之。而從「變化中生出變化」也正是兵法中最為玄妙、有趣的地方，面對如此多變的戰術，讓司馬懿最後也只能長嘆：「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sup>287</sup>

### (三) 裝神弄鬼割隴麥

在諸葛亮的軍事戰術之中，不僅僅能在行軍布陣、攻防、擾亂對方軍心上達到一定的成效，甚至能夠在蜀軍缺糧之際，替蜀軍找到食物的來源，從而延長作戰的時限。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一回中，便有著底下精彩的段落：

當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伏在上圭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手執七星皂幡，在左右推車。三人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鐮刀、馱繩，伺候割麥。卻選二十四個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幡，步行於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sup>288</sup>

為什麼割麥就割麥，孔明卻要大費周章地用了一堆人披頭散髮、裝神弄鬼的呢？原來，司馬懿早料到諸葛亮要來此處收割小麥，以資軍糧，故派遣軍隊來此處加以駐守，嚴防蜀兵割麥。為此，諸葛亮運用了一招「聲東擊西」之計：

懿大驚曰：「方纔那個車上坐著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如何這裡又有孔明？怪哉！怪哉！」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

<sup>286</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267頁。

<sup>28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37。

<sup>28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41。

車上亦坐著個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擁車而來。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神兵也！」<sup>289</sup>

趁著司馬懿的注意力仍放在神兵、神將之際，諸葛亮將隴麥盡皆收歸囊中，甚至還嚇得司馬懿「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sup>290</sup>。閱讀至此，不僅讓人為之一笑，更讓人再次見識到了諸葛武侯多變的軍事手法，也正因為如此靈活的軍事調度，才能使得諸葛亮的兵法至今仍舊廣為傳頌！

綜觀此部份，不管是周瑜還是諸葛亮，我們皆可看到他們別出心裁的策略應用手法，這不僅是他們兩人的相似之處，更是他們兩位軍事家能夠在眾星雲集的三國時代中，可以各自獨領風騷的重要原因！

### 第三節 小結

根據明人高儒的觀點，羅貫中所創作出來的《三國演義》具有「據正史，證文辭，通好尚」<sup>291</sup>的特色，也因為作者保持著上述的寫作立場，故而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演義》與《三國志》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三國演義》畢竟是小說，因此其不管在情節上，抑或是人物形象的刻劃上，與正史還是有著一定的差距存在。所以，在《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的形象還是有著一定程度上的更易，對於這樣的情況，梁大新認為：

擁劉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場，也是全書的結構主線，東吳一方陷入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現、極力歌頌的漢家後裔，也不是作者反面表現、無情鞭撻的篡權臣子，可以說處於善惡、正邪、美醜兩面之間，游移不定。結果，東吳在作品裡失去三國鼎立局面中的支柱地位……這使東吳一方的人物一個個表現出難以理解的雙重或多重人格，行為有悖常理。<sup>292</sup>

呈上所述，周瑜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作者「擁劉反曹」下的犧牲品。為了達到作者原先所設定的創作路線，但卻又不想背離史實太多，因此在羅貫中的筆下，便呈現出面對其他人的周瑜，是英姿颯然；面對諸葛亮時，卻是窘態百出的矛盾形象，而在周瑜形象弱化的同時，諸葛亮的人物形象也就在反襯的手法下提升了！針對如此與歷史有所出入的寫法，梁現利也提出了他的觀點：

<sup>28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142。

<sup>290</sup> 同註294。

<sup>291</sup> [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志三·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2。

<sup>292</sup> 梁大新、韋海霞撰：〈人性的扭曲—論羅貫中筆下的周瑜〉，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頁78。

正統說引發的尊劉傾向導致了對諸葛亮的美化。……二人(諸葛亮與周瑜)有了交鋒，這樣又直接導致了貶損周瑜以美化孔明。……民間文化對周瑜正史形象的隔膜導致了民間文化對周瑜形象的藝術化虛構與加工。而其後的小說又吸收了民間文化中的周瑜形象，進一步推動了周瑜形象的演變。……因此，周瑜的形象就一跌再跌，不斷的受到貶損。文學本身的塑造要求，對周瑜形象的演變也有很大的影響。<sup>293</sup>

總歸來說，從上面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在《三國演義》的人物設定上，為了美化諸葛亮的人物形象，羅貫中只好貶損周瑜，使得周瑜便成了映襯的綠葉角色，而諸葛亮則一步步地神格化到一種無比尋常的地步。雖說這樣的做法不免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與歷史形象上有所差距，但卻也因此使得書中的人物，更加符合平民老百姓中的內心期待，為世人所熟知的周瑜與諸葛亮形象也因而成型，進而呈現出他們各自的形象風采！



---

<sup>293</sup> 梁現利撰：〈周瑜形象接受研究〉，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頁339、354。

## 第六章 結論

通篇《三國演義》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羅貫中以個人主觀意志融合了既有的歷史史實以及各方面的文學素材，並藉由沿用既有事實與自身的情節創新，使故事呈現出一種史料與俗文學交叉並進的創作形式，整部《三國演義》也更增添了其內容的豐富性以及架構的完整性。由此可知，《三國演義》的成書不單單只是取材於《三國志》的歷史事件，更吸收了大量的《三國志平話》以及民間傳說中的一些人物形象，最終再透過作者巧妙的藝術加工以及某些誇張的想像情境，從而構成一部膾炙人口的歷史鉅作。

因此，本論文呈現《三國演義》成書前後的周瑜與諸葛亮的形象演變，主要是以《三國志》為主，《三國志平話》為輔，再加上剖析小說中周瑜與諸葛亮的主要性格與形象，去比較出羅貫中所塑造的藝術典型與正史中究竟有何差異，以及其背後的創作思想與理念，從而能夠更全面的掌握及了解兩人從正史到小說的形象演變歷程。以下，將對本文的結論分成三小段，最後再說明未來之展望。

### 一、從正史《三國志》到《三國演義》兩人的形象演變

《三國演義》的膾炙人口，使得後世對其間人物的認識多受其影響，然而卻對歷史上他們真實的面目顯得模糊不清，從正史《三國志》演進到《三國演義》，不管是周瑜，抑或是諸葛亮，他們兩人的形象上皆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更易，為何會產生出這樣的現象呢？Manuel Komroff 曾說：

一部長篇小說的方向乃是故事進展所沿循的路線。這條特殊的路線，係由長篇小說作者選定，以便貫徹他的旨趣或目的。<sup>294</sup>

而在小說中，羅貫中所選定的故事路線便是「尊劉抑曹」，以蜀漢集團為全書的核心位置，並對其內部的人物多有褒揚讚頌，而在這樣的主軸之下，曹魏及東吳集團的人物自然也就較為落居下風，故而在書中的描寫上，諸葛亮自然就被擺在主角的位置，而周瑜就只能是陪襯的角色了！而羅貫中究竟在汲取正史、野史、說書、戲劇等龐大繁浩的材料之後，在周瑜及諸葛亮這兩個角色上，做了哪些與正史《三國志》不同的形象變化呢？以下將以兩小段，加以分敘之。

#### (一) 周瑜的形象演變

在陳壽的《三國志·周瑜傳》中，周瑜的一生戰功彪炳、謀略無數，不僅有

<sup>294</sup> Manuel Komroff 著，陳森譯：《長篇小說作法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13。

著「瑜長壯有姿貌<sup>295</sup>」的俊俏外型，更在未出道前就以「瑜恩信著盧江<sup>296</sup>」博得時人極高的評價。再加上不與將士計較的雍容大度以及「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sup>297</sup>」的音樂才能，周瑜在正史中的形象幾乎可說是無懈可擊、十項全能。然而，為什麼《三國志·周瑜傳》的描述會與先前第三章所提到的《三國演義》中周瑜人物形象有如此大的差異呢？王增學曾提出以下的觀點：

作者對周瑜無論是褒還是貶，目的都是為了突出和襯托孔明。……作者為了集中反應曹、劉、孫三集團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不得不改變了一些人物的性格，而對周瑜性格的刻畫，虛構大大多於實寫。這顯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鮮明地體現了作者尊劉反曹的政治傾向和以劉備集團為中心的整體藝術構思。<sup>298</sup>

因此，在羅貫中的敘寫之下，為了達到「尊劉反曹」以及「襯托孔明」等藝術創作目的，《三國演義》雖未完全扭曲周瑜在正史中的形象，但周瑜的歷史原貌在書中卻早已蕩然無存，從而凸顯作者創作的核心理念。接著，底下便從幾個部分加以探討、對照周瑜在兩書間的形象差異：

### 1. 冷靜沉穩與意氣用事

在陳壽《三國志》的描述中，周瑜不僅是東吳的大都督，更是赤壁一戰中穩定軍心的關鍵人物。尤其是當曹操率領八十三萬大軍南下時，張昭等一眾大臣皆不知所措，甚至主張議和，這時候周瑜便跳出來反對眾人的意見，並主張抗曹。然而，他並不是毫無計畫的抗曹，而是早已冷靜沉穩的分析出曹軍的劣勢與吳軍的優勢，從以下段落便可窺知一二：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sup>299</sup>

從上述段落，我們可以看到周瑜精闢的替孫權分析出曹操必敗的主因有四：江東

<sup>295</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59。

<sup>296</sup> 同註297，頁1260。

<sup>297</sup> 同註298。

<sup>298</sup> 王增學撰：〈談《三國演義》對周瑜的藝術改造〉，刑台高專師範學報綜合版，1997年，頁5。

<sup>299</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1-1262。

兵精將廣、曹操尚有北土後患、曹軍使用自己不習慣的作戰方式以及正值寒冬糧草運輸不易等因素，把孫權講得是心花怒放，決定宣戰抗曹。不僅如此，周瑜更從軍數上化解孫權的疑惑：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

300

身為主將的周瑜明白，大家之所以會懼怕全是因為曹軍人數的關係，因此便替孫權分析曹軍的內部情況，降軍加上疲病者，曹軍的戰鬥力實不足為懼，這席話再次替孫權打了一劑強心針，堅定其抗曹的決心。由上述兩段來看，周瑜早在大戰前洞悉了曹操所有不利的因素，這種臨陣不懼、沉穩冷靜的個性，實為將才中的表率。

然而，周瑜這樣的形象到了《三國演義》卻有很大的改變，在羅貫中的描述當中，周瑜就不似上述般沉穩冷靜，反倒是遇事容易爆衝、過於意氣用事。在第四十四回中，諸葛亮隨口說說，便搞得周瑜勃然大怒：

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sup>301</sup>

雖說周瑜早已有意抗曹，但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假意利用曹操欲得二喬，挑起周瑜嫉妒的心理，而這招激將法果然換得周瑜一句：「老賊欺吾太甚！」<sup>302</sup>從而讓周瑜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孫劉同盟一事，共同抵抗曹操大軍。除此之外，在聚鐵山斷糧一事中，周瑜意氣用事的個性表現地更加明顯：

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

<sup>300</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2。

<sup>30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1。

<sup>30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2。

聚鐵山斷操糧道。」<sup>303</sup>

從上述可知，原本周瑜是設計要陷害諸葛亮前去聚鐵山斷糧，假曹操之手殺諸葛亮滅口，但諸葛亮卻憑著他如簧般的巧舌，反倒差點激得周瑜自己去送死。閱讀此段，不僅令人莞爾一笑，而周瑜原先在正史中冷靜沉穩的形象，在《三國演義》中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反倒是現在為世人所熟知的衝動周瑜了！

## 2. 謙和恢弘與忌才妒能

在我們所熟知的周瑜形象中，周瑜是活生生的被諸葛亮氣死的，由此可見其度量之狹小，然而，在陳壽《三國志》的描述中，卻全然不是這麼回事，具正史的記載，周瑜是位受時人所讚譽的謙謙君子。在《三國志·周瑜傳》中便曾有以下敘述：

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sup>304</sup>

呈上所述，在正史中的周瑜形象，是位別人污辱他，他尚可以忍讓而不與之計較的人，最後連程普都不得不感佩，甚至認為跟周瑜相處就有如喝好酒般，醉了都不自知，由此可見周瑜的人品多麼的無暇可擊。除了上述外，在蔣幹勸降的段落中，周瑜的氣度同樣令蔣幹為之折服：

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聞。<sup>305</sup>

雖是短短一句話，卻言簡意賅的道出了周瑜令人敬佩的人品與氣度，就連敵軍陣營的蔣幹都自嘆弗如。因此，從上述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面對別人的當面羞辱，抑或是好友的勸降，周瑜皆能夠從容以對、曉以大義，足見周瑜寬闊的心胸與謙和。

相較於正史中的周瑜形象，《三國演義》中的周瑜就沒有如此寬闊的胸襟了，甚至周瑜嫉妒諸葛亮的小心眼，似乎已達到了深植人心的地步。在羅貫中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為了凸顯諸葛亮的雍容大度，周瑜便被作者改編為善忌善妒、見不得別人好的人物形象，從書中的四十四回開始，便有徵兆：

<sup>303</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22。

<sup>304</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5。

<sup>305</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5。。

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sup>306</sup>

在周瑜與諸葛亮商議如何對抗曹操的同時，周瑜發現自己面前這位「暫時」的盟友實非等閒之輩，自己的計畫又瞞不過他，便心生嫉妒、暗起殺機，並開啟了自己「三殺諸葛亮」的計畫。然而，不管是聚鐵山劫糧、草船借箭，抑或是派兵追殺在祭壇的孔明，周瑜皆不僅沒有成功，還次次讓諸葛亮化險為夷，從而開啟「三氣周瑜」的篇章，對此，毛宗崗也曾有所評論：

周郎赤壁一戰，未調破曹操之兵，而先調取孔明之兵；以水陸十二隊分取八十三萬人，而獨以兩隊當孔明一人。蓋以孔明一人為大敵，又在八十三萬人之上也。乃八十三萬人可勝，而孔明終不可勝。忌其不可勝而欲殺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勝而強欲殺之！吾以笑周郎之愚。<sup>307</sup>

由上可知，當周瑜了解自己無法在軍事計謀上贏過諸葛亮時，他的反應竟是先把幫他借東風盟友給殺了，而且在十四隊人馬中，殺孔明竟就調派了兩隊！如此容人不得的狹小氣量與優越感，在羅貫中三氣周瑜的情節鋪陳下，周瑜最後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悔恨與不甘，實為早可預見之結局啊！

### 3. 目光遠大與不識大體

在正史中的周瑜，不僅是位冷靜沉穩、謙和有禮的將軍，同時他更是位思慮周全、目光深遠的謀士，《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便有著以下幾段描述：

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sup>308</sup>

劉備在未得到諸葛亮相助之前，與關羽、張飛可說是落魄三兄弟，只能四處依附各方豪傑，積蓄實力、等待時機。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既沒有曹操眾多的猛將謀士，也沒有孫權雄厚的家族根基，周瑜卻仍然認為劉備並非池中物，只要有機會定能成為一方梟雄，從而成為吳國未來的隱憂。雖然後來孫權並沒有採納周瑜的意見，但事實證明周瑜是對的，劉備不僅沒有久屈人下，更奪取荊州、益州，成

<sup>306</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15。

<sup>307</sup>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26頁。

<sup>308</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4。



為三國鼎立的一方霸主，由此可知周瑜對於時局的判斷有多麼精準、敏銳！

除上述外，在入蜀一事上，周瑜也替孫權做了一番鞭闢入裡的分析：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孫權)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sup>309</sup>

從上述的分析，竟與諸葛亮的入蜀策略別無二致，在諸葛亮的隆中對當中，他替劉備設定的根據地便是益州蜀地，從而外結盟友、內修政理，後北方可圖。由此可見，瑜、亮二人英雄所見略同，在時局的洞悉程度上，其實周瑜與諸葛亮可說是不分軒輊的。

然而，到了《三國演義》，周瑜的形象卻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為了凸顯諸葛亮的神機妙算，周瑜也就變成諸葛孔明的陪襯犧牲品。在羅貫中的描述之下，原先那位目光精準、富有遠見的周瑜，卻變成了一位不識大體、只顧個人好惡的目光短淺之人。在赤壁一戰中，諸葛亮做了許多出乎周瑜意料的事情，像是草船借箭、借東風等等，因此在《三國演義》的描述中，周瑜竟不等與曹操的戰事結束，就急著殺諸葛亮的滅口：

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sup>310</sup>

當戰事緊湊之時，周瑜第一個念頭竟不是如何把握東風、對抗曹操，而竟是要先對付自己的當時盟友，如此打自家人的行為不僅有損周瑜東吳大都督的顏面，更會破壞孫劉聯盟之間的信任關係，實為不智之舉，要不是魯肅在旁建議：「且待破曹之後，卻在圖之。」<sup>311</sup>周瑜可能都要忘了自己還有抗曹的重責大任，由此可見周瑜的不識大體。而當曹操退敗後，周瑜欲取南郡、荊州、襄陽等處，卻被諸葛亮漁翁得利的奪了去，此時周瑜的形象更是完全幻滅：

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正議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主公現攻合肥不下。不爭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

<sup>309</sup> 同註 310。

<sup>310</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6。

<sup>31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7。

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sup>312</sup>

在上述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智清醒、顧全大局的人竟是魯肅，而周瑜已經被自身怨氣所淹沒，若不是魯肅在一旁阻擋，周瑜便可能犯下結果連他自己都無法料想的憾事，一位自顧著自己報仇而沒有想到將士與國家安危的人，其目光之短淺實是顯而易見。

從上述三點，我們可以發現到《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之間的周瑜形象相差甚大，甚至有的地方已經完全把周瑜給顛覆了。為何會出現如此怪現象呢？劉星紅認為：

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曾存在著兩個面目迥異的周瑜形象，兩者有著史家跟民間、真實和虛構、英雄和丑角的區別，形象的正反之中蘊含著思想理念與審美情趣的差異相互之間存在矛盾……作者難以割捨，想兼收並蓄，既從史書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間傳說，但他並沒有很好地將兩者有機融合在一起，並加以貼切地彌合……加之小說中周瑜又要做為陪襯人物出現，於是就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sup>313</sup>

因此，在《三國演義》中我們常能發現周瑜時常有著自相矛盾的性格以及行為出現，面對曹操以及其他的人，他是一位英姿颯颯、智勇雙全的東吳首席軍師；面對諸葛亮，卻立刻失去理智，甚至如身邊的魯肅都不如。如此巨大的形象差異，只能說是羅貫中為了綜合民間俗文學的大眾心理，同時要兼顧史書面貌所形成的結果，使得周瑜在書中產生了兩種不同性格的矛盾現象，而這樣的周瑜可說是融合了多種腳本後，所產生出來的特殊人物形象！

## (二) 諸葛亮的形象演變

在諸葛亮形象演變的過程中，不管是正史中，抑或是小說裡，皆顯現出高度的正面評價，甚至在唐代詩人杜甫的詩中，更曾經出現過「諸葛大名垂宇宙」的高度讚譽。然而在歷史形象與藝術形象上，諸葛亮人物的呈現還是有著些許的不同，因此，在《三國志演義縱論》中便曾提到：

藝術形象諸葛亮與歷史人物諸葛亮，兩者並不相同。前者發軔於歷史，但他主要是民間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按照自己的意願、需要和美學理想，不斷地進行藝術加工和虛構，最後到了古典作家手裡創造完成的。<sup>314</sup>

<sup>31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91。

<sup>313</sup> 劉星紅：〈三國演義中的雙面人—周瑜形象分析〉，文學語言學研究，2007年，頁73。

<sup>314</sup> 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頁208。

從上述可知，諸葛亮的形象在《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還是有著許多不同之處，而羅貫中究竟是怎樣將諸葛亮從歷史原型改動成現在的藝術典型呢？其差異又在何處呢？以下是羅貫中所採用的幾種寫作手法：

## 1. 區區數字與長篇故事

作為一本歷史性的長篇章回小說，若要將故事更加生動的呈現讀者，其中的一些情節必定是經由作者加油添醋而形成的，因此，「虛構手法」也就成了小說成型的重要因素。關於諸葛亮的部分，作為《三國演義》中最重要的人物，羅貫中對他的虛構成分自然也就不在話下，底下便舉幾個較為明顯的例子進行說明：

### (1) 三顧茅廬：

在陳壽的《三國志》中，我們可以看到三顧茅廬確有其事，然而在情節的描述上，卻只有「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sup>315</sup>的寥寥數筆。到了《三國演義》，羅貫中不僅為諸葛亮設置了一個華麗的登場，更藉由司馬徽與徐庶的推薦，進而營造出諸葛亮那種「人中龍鳳」之感。因此，從第三十六回的「元直走馬薦諸葛」開始，一直到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決策」為止，在這三回的五千八百多字敘述之中，除了名字之外，幾乎全為虛構的情節，也由此可見為了塑造諸葛亮無可匹敵的人物形象，羅貫中實是耗費了不少心力與時間！

### (2) 智算華容道：

在赤壁一戰中，當曹操敗逃時，《三國志》是如此描述的：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sup>316</sup>

其中陳壽以「曹公引歸」區區四字，簡單帶過曹操戰敗北走的畫面。但是到了《三國演義》，為了呈現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羅貫中便再次運用他絕佳的想像力，設計出了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的這個橋段，這樣不僅能夠再次凸顯諸葛亮「智絕」的人物形象，更能夠替關羽營造出其特有的「義氣」形象，如此一箭雙鵰的方式，也不得不讓人佩服羅貫中的寫作功力啊！

除了上述的三顧茅廬與智算華容道之外，諸葛亮虛構的部分尚有舌戰群儒、空城計、借東風等等，雖說以上的長篇故事均不符合史實，但卻也因為羅貫中的虛構功力深厚，反到使得這些情節比起正史而言，更加地深植人心、影響深遠！

## 2. 平鋪直敘與誇張描寫

除了上述的虛構成份居多外，為了凸顯出諸葛亮的與眾不同，我們在小說中

<sup>315</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912。

<sup>316</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878。

也會看到羅貫中多次採用誇飾的描寫方式來表現諸葛亮的敘事情節。例如在徐庶推薦諸葛亮的時候，《三國志》中並沒有額外加以描述，但《三國演義》卻是如此說道：

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sup>317</sup>

其間，我們可以看到徐庶用「經天緯地」、「天下一人」等誇張的用詞來讚美諸葛亮的才能，因此在羅貫中的筆下，我們多可看見作者常常透過別個角色的誇張口吻，為諸葛亮營造出其充滿智慧與才能的形象。

除了上述之外，羅貫中為了讓書中的第一男主角顯得更加獨特，他甚至透過誇飾的手法將諸葛亮加以「神化」，將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提升至另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舉例來說，在借東風以及七擒七縱孟獲的情節中，我們皆可以看到類似的敘述：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幡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sup>318</sup>

在借東風的情節中，羅貫中運用誇飾的手法來描繪諸葛亮，以一句「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將諸葛亮的地位再次哄抬，使他到達一個其他軍師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境界，同樣的用法我們可以在七擒七縱孟獲的過程中再次看到：

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蒂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沖倒無數。<sup>319</sup>

上述的諸葛亮，面對木鹿大王狂風猛獸，絲毫沒有半點畏懼之心，相反的，只見他輕搖羽扇，便可轉換風向、指揮假獸，如此怪誕荒異的情節，會讓讀者有一種在讀神魔小說的錯覺，彷彿自己在看一場神魔大戰。

總歸來說，我們從上述皆可看到，為了將諸葛亮包裝成一位超越其他人的軍

<sup>317</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28。

<sup>318</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65-566。

<sup>319</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17。

事全才，作者利用其他角色的讚賞與神化諸葛亮的方式，層層的將諸葛亮塑造成一位經天緯地、呼風喚雨的神奇角色，而這些段落也都是《三國志》所沒有的，雖說純為虛構，卻也正拜羅貫中這樣的手法所賜，諸葛亮神機妙算、仙風道骨的形象才能如此深入市井小民的心中！

### 3. 忠於史實與移花接木

在《三國演義》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一些虛構與誇張的成分之外，為了塑造出諸葛亮盡善盡美的英雄形象，羅貫中也擅長使用「移花接木」的方式，讓諸葛亮更加接近他原先所設定的「全才」形象。從以下幾段故事中，我們便可略窺一二：

#### (1) 火燒博望坡：

在正史《三國志》中，火燒博望坡是確有其事，然而，卻不是諸葛亮所做的：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sup>320</sup>

根據上述可知，火燒博望坡一計其實是由劉備所想出來的拒敵妙策，然而到了羅貫中的筆下，為了要讓初登場的諸葛亮有所表現，因此作者便將此計移到了諸葛亮身上，而劉備卻成了場邊的加油觀眾。而透過這樣的做法，不僅讓關、張二人說出：「孔明真英傑也！」<sup>321</sup>更讓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並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sup>322</sup>如此一來，諸葛亮神機妙算的軍師形象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 (2) 草船借箭：

在正史中的敘述，確實是有類似草船借箭的事件發生，然而其故事原型並不是諸葛孔明，在《三國志·吳書·魏略》中我們便可以看到：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覆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sup>323</sup>

從上述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草船借箭的始作俑者，是孫權。但到了《三國演義》裡面，竟然變成是諸葛亮豐碩戰績中的其中一項，更因此成為傳頌大街小巷的故事之一，實可看出羅貫中移花接木卻又不留痕跡的深厚寫作功力。

#### (3) 赤壁火攻：

關於赤壁火攻一事，更是與上述的借箭故事如出一轍，在陳壽的《三國志》

<sup>320</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876。

<sup>321</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464。

<sup>322</sup> 同註322。

<sup>323</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119。

中，並沒有關於周瑜與諸葛亮商討火攻曹軍的記載，相反的，卻是另有其人：

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sup>324</sup>

呈上所述，在正史中的火燒曹軍之計，是由周瑜跟黃蓋共同商議出來的計策，然而到了《三國演義》卻變成了周瑜與諸葛亮英雄所見略同的精彩戲碼。所以從上面的三段故事，我們可以發現到羅貫中為了要將諸葛亮智絕的形象塑造到淋漓盡致，因此即便不是諸葛亮的功勞，他也都會透過自己的妙筆巧手，把以上的功績都貼到諸葛亮的臉上，而諸葛亮那獨留宇宙、照耀千古的「軍師形象」也因而躍然紙上，並永留於平民老百姓的心中了！

綜合上述的說法，我們可以發現到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是好上加好。在陳壽筆下的孔明，是一位擁有「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sup>325</sup>能力的厲害人物，但他依然有著「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sup>326</sup>的缺點。然而，到了《三國演義》的故事中，羅貫中卻透過虛構、誇飾以及借用等各種手法，將諸葛亮幻化成一位在智謀、忠心，甚至道德上都完美無缺的「完人」，使其形象擁有濃厚的理想色彩，「諸葛亮」更因此成為智慧與完美的代名詞。如此的形象演變，不僅神化了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更藉此強調了作者對蜀漢集團內的「平民英雄」之高度讚揚，從而傳達了羅貫中自身的政治與社會價值觀。

## 二、周瑜形象的構築與矮化

從本論文上述的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史實中的周瑜與俗文學所呈現出的民間形象，有著不小的差距。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正史《三國志》中的周瑜，是一位重情重義，同時又有著瀟灑大度的人物形象，再加上其出類拔萃的軍事謀略能力，該有的才華他幾乎全包了，可說是令人為之稱羨的完美人物。

然而，這樣的完美形象到了《三國志平話》開始有了改變，雖然周瑜仍然是才高八斗、傲視江東的東吳第一人，但為了作為映襯諸葛亮的主要角色，他的人格方面不再是那樣地完美無缺，自大妄為、恃才傲物的人物形象便逐漸的浮現出來，甚至「今氣我牧牛村夫，故言欺我」<sup>327</sup>的狹小氣度更是從談吐當中表露無遺。而上述的周瑜形象，皆可說是民間俗文學的虛構產物，因為在歷史上的周瑜與諸葛亮，雖說年齡相差不大，但由於周瑜出道的時間較早，因此兩人發光發熱的時期幾乎沒有太多的重疊之處，因此在《三國志平話》中兩人的對決、較量，皆為後世加油添醋之作！

到了《三國演義》，羅貫中綜合了史書中與民間俗文學的周瑜形象，以《三

<sup>324</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2015年，頁1262。

<sup>325</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4。

<sup>326</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下》，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0。

<sup>327</sup>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50。

國志》做為參考資料，以《三國志平話》作為故事的基本架構，那位在赤壁之戰中大展軍事長才，卻又在與諸葛亮的對陣中次次敗北的周瑜形象，便從此躍然紙上、深入人心。而在羅貫中筆下的周瑜，不僅滿足了民間對於三國人物的想像，更呈現出作者自身的寫作立場與偏好，所以在小說中的周瑜形象，可說是《三國志平話》的形象延伸，其部分形象再次被扭曲、矮化，甚至出現了「既生瑜，何生亮？」的經典名句，而關於如此透過矮化周瑜，去凸顯諸葛亮的寫作手法，許麗芳是這樣認為的：

小說之特定書寫藝術超越事實情節之關注，而針對特定人士共同聚焦著墨，並加以評價分析，從而獲得情感與價值上之滿足。章回小說的寫作特質正彰顯此一現象，相對於史實或現實事件，此類現象反映小說之非現實性，於此一時空中，呈現作者與讀者抽離現實缺憾之浪漫抒懷情致。<sup>328</sup>

由此可見，章回小說在書寫上，是否符合史實並不是真正的重點，作者是否能夠抓住讀者的審美心理與心中之想望，才是寫作的關鍵。因此，在《三國演義》的描述當中，雖然周瑜仍然是一位形象色彩極為鮮明的要角人物，但為了滿足作者自身「尊劉抑曹」的寫作傾向，以及民間大眾對於千古軍師典範的想像，周瑜也自然就在不知不覺間被形塑成「心胸狹窄、氣量狹小」的人物形象，從而映襯諸葛亮的美好，而這樣的形象更動，讓真實的周瑜面貌於創造藝術典型的時候被犧牲了，也使他成了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受傷最深的人物！

### 三、諸葛亮形象的構築與神化

根據本論文前面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到諸葛亮不管是在民間俗文學中，抑或是正史《三國志》裡，皆有著相當突出的人物形象色彩。在陳壽筆下的諸葛亮，是一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sup>329</sup>」的內政型人物，他透過自身優異的治國能力，將勢力最為薄弱的蜀國治理的井井有條、吏治清明，堪稱是三國時代裡最為耀眼的政治家；但是，比起他的政治才幹，其排兵佈陣、軍事戰略上，卻顯得相形失色。由此可知，在正史《三國志》中，雖說是瑕不掩瑜，但諸葛亮仍是如同常人一般，有著缺點與不足之處。

到了《三國志平話》之後，諸葛亮的人物形象開始有了不同的發展，有別於史實中的人物面貌，民間文學中的孔明充滿了神仙色彩，不僅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sup>330</sup>」、「武侯撫琴，其江水自冷<sup>331</sup>」，甚至能夠驅使鬼神進入司馬懿的夢中，乖乖地聽從他的命令，而這樣的文字也使得諸葛亮充滿了「神性」

<sup>328</sup> 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79。

<sup>329</sup>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930。

<sup>330</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95。

<sup>331</sup> 《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頁110。

的形象色彩。然而，為了貼近市井小民的真實人性，在《三國志平話》的諸葛亮卻也有著性格粗豪、莽撞、做事不計後果的人物形象，如此的形象塑造，若以藝術角度觀之，可說是思想層次前後自相矛盾，性格刻劃的寫作手法也略顯粗糙、不夠細緻，較沒有文學上的藝術性，但卻提供了羅貫中一個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人物雛形！

因此，到了《三國演義》中，為了塑造「古今賢相第一奇人」的完美形象，羅貫中把《三國志》及《三國志平話》中諸葛亮的人物缺陷幾乎都給去除了，留下的是個具有經天緯地之能，以及安邦定國之才的全能宰相。在這樣的人物形象下，諸葛亮仍保留著《三國志平話》中的神仙色彩，如「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sup>332</sup>」的句子依舊可見。然而，缺陷角度方面，卻抹去了「將略不足」以及「性格粗豪、莽撞」等人物形象，一位擁有聖賢品格、睿智溫文的儒家理想典範也就此致臻成熟。透過這樣的形象塑造，羅貫中創造出一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物典範，而這也象徵著諸葛亮藝術典型的最終樣貌就此定形！

呈上所述，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相較於周瑜的形象演變，諸葛亮形象是越變越好，從一位仍然有著缺失的政治家逐漸轉變成一位無所不能的智者人物，而關於這樣的創作手法，葉太平認為：

中國古代作家的一種深層心態是「對完美人格的自覺追求」。意指作家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否出於作者自覺，都是作家理想的投射，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上，注重人格品質，強調人格意識。<sup>333</sup>

由此可知，《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不僅植基於當代文化環境，更投射出作者本身對於「完美人格」的理想追求，從而匯聚各時代階層以及自身的觀點、審美、情感以及想像，最終加工出來的藝術產物。

總歸來說，在眾多的三國人物中，唯獨諸葛亮受到羅貫中的青睞，集智慧與完美於一身，這不僅與當時創作的社會環境有關，更與作者自身的寫作立場大有關係，而們若是要能夠更全面地整握諸葛亮的人物形象，便要試著從歷史中去看小說，如此方能看到不同時代審美角度的演變歷程，以及時代背景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因素，也才能真正的發掘諸葛亮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蜀漢賢相，究竟是如何從史實中打進每位平民老百姓的心中，從而傳頌後世的遞進過程！

#### 四、未來展望

作為一部由許多歷史材料以及民間故事所衍化而成的文學鉅著，即便經過了百餘年，《三國演義》的魅力依然使許多人為之沉醉，更吸引許多作者、導演、漫畫家不斷地為其改編，創造新的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樣貌，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三

<sup>332</sup>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1017。

<sup>333</sup> 葉太平：《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36。



《三國演義》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是一本能夠令人再三玩味、沉浸其中的傑出小說。

然而，作為一位文學研究者，光看小說是不夠的，因此，本論文才會藉由比對《三國演義》、《三國志》以及《三國志平話》這三部作品，試圖去釐清並分析出周瑜與諸葛亮在歷史上以及文學上的形象差異，讓大家對於這兩位人物的人物形象有更全面的認識，並欣賞他們在不同文學作品中的風情面貌。因此，本次研究主要是針對《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與周瑜的人物形象進行探討，從而發現羅貫中創作這兩位故事主角的動機與用意。然而，關於《三國志》以及《三國志平話》的部分，筆者卻只有舉出實例，卻甚少探討創作者背後構建諸葛亮與周瑜人物形象的真正意涵與目的，希望日後有學者可以嘗試著朝這一方面邁進，並建構出更為全面及系統化的三國人物之形象研究，使三國人物的風貌與每位創作者的奇思妙想，能夠更完整呈現在世人面前。

本論文尚有許多值得探究與不足之處，希冀日後對於《三國演義》一樣有著研究熱情的先進後學，能夠不吝嗇地給予意見及指教。



# 參考書目

## 一、三國演義文獻（依版本先後順序排列）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

吳小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

許盤清、周文業整理：《三國演義》《三國志》對照本》，南京市：江蘇古籍，2002年。

[明]羅貫中著、[明]金聖嘆鑑定、[清]毛宗崗批：《精印三國演義》，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

## 二、古典文獻（依朝代排列，同朝代則按作者姓氏筆畫數排列）

[東周]孫武著、[東漢]曹操註、[清]孫星衍校：《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民〕楊家駱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

[魏]劉邵撰、〔北魏〕劉昉注：《人物志》，台北，中華書局，1966年。

[南朝梁]劉勰著：《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

[唐]房喬撰：《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

[唐]房玄齡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北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民〕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

[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北宋]蘇軾撰：《東坡樂府》，臺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

[南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98年。

[明]揭暄著、李炳彥、崔彧臣評：《兵經釋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

[清]王夫之撰：《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清]黃宗羲撰：《明夷待訪錄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 三、今人著作（依出版時間排序，同年則按作者姓氏筆畫數排列）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0年。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校：《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張立齋編：《文心雕龍》，臺北，正中書局，1968年。

李文齋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Manuel Komroff 著，陳森譯：《長篇小說作法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85年。

陳曦鐘、宋瑞祥、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彭定求等：《全唐詩（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王德毅編：《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2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丘振聲：《三國演義縱橫談》，臺北，曉園出版社，1991年。

周先慎：《古典小說鑑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葛楚英：《三國演義與人才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年。

葉太平：《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高瑞卿主編：《文學寫作概要》，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年。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辭典》，臺北，東華出版社，1997年。

陳其欣選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周積明主編、傅隆基著：《三國演義縱論》，臺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評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佛思特：《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

鄭鐵生：《三國演義的敘事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袁閻琨：《中國兵書十大名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

沈伯俊：《三國漫談—人物·情節·名段》，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年。

紀德君：《中國歷史小說的藝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2003年。

郭濟興、李世俊：《三國演義與經營謀略·序》，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陳翔華：《三國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局，2006年。

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

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郭瑞林：《三國演義的文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陳瑞秀：《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劉墉：《唐詩句典》，臺北，求真出版社，2010年。

羅吉甫：《諸葛亮領導兵法將苑菁華錄》，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

陳文德：《諸葛亮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年。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

#### 四、期刊論文（依出版時間排序）

徐士年：〈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集》，1991年。

劉上生：〈論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統及其民族文化意蘊〉，收在《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149-168。

王增學：〈談《三國演義》對周瑜的藝術改造〉，刑台高專師範學報綜合版，1997年。

陳偉軍、孫愛春：〈《三國演義》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傾向〉，《泰安師專學報》第11卷第2期，1998年6月，頁15-21。

葉松林：〈謀士與皇權——《三國演義》中謀士形象評析〉，黑龍江，黑龍江社會科學，1998年，頁72。

周遠成：〈三國周瑜論〉，船山學刊，2003年第二期，頁115-116。

胥惠民：〈從周瑜說起——略論《三國志演義》塑造典型的藝術辯證法〉，《新疆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9月。

梁大新、韋海霞：〈人性的扭曲——論羅貫中筆下的周瑜〉，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頁78。

申安：〈《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藝術〉，《河北建築科技學院學報》第22卷第3期，2005年9月。

梁大新：〈人性的扭曲——論羅貫中筆下的周瑜形象〉，《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12月。

魏月琴：〈《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形象分析〉，《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38-39。

劉星紅：〈三國演義中的雙面人——周瑜形象分析〉，瀋陽，文學語言學研究，2007年。

康韻梅：〈偏離史實的瑜亮情結——略談《三國演義》對赤壁之戰的摹寫〉，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08年。

滕朝軍：〈《赤壁》還原歷史中真實的周瑜〉，《蘭臺世界》，2010年。

梁現利：〈周瑜形象接受研究〉，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頁

## 五、學位論文（依發表時間排序）

洪淳孝：《三國演義研究》，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2年。

林素吟：《傳統小說中軍師類型之研究—以《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為代表》，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廖文麗：《古典小說虛實論研究—以《三國演義》為例》，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羅永裕：《三國演義人物形象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蕭佩瑩：《唐傳奇人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臺東，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黃俊凱：《三國演義之人物表現》，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黃光庭：《《三國演義》作者的價值意識—以謀士為中心的考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曾文男：《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